

# 梁启超

第一章天生俊杰才华横溢.....	3
一、青山秀水书香门第 .....	3
二、新会神童器宇不凡 .....	5
三、乡试中举风华正茂 .....	7
四、结识长素受业草堂 .....	9
第二章政治舞台崭露头角.....	12
一、百日维新救亡图存 .....	12
二、重办《万国公报》组织强学会 .....	14
三、《时务报》主笔言论界骄子 .....	16
四、汪梁之间起争执时务学堂展雄才 .....	18
第三章百日维新腥风血雨.....	22
一、组织保国学会保国保种保教 .....	22
二、戊戌百日竭心尽智 .....	24
三、较量宸中折戟沉沙 .....	26
四、流落他乡为异客断发胡服走扶桑 .....	28
第四章避难东瀛重谋大业.....	31
一、开启民智筹办报纸 .....	31
二、寻找新出路谋联孙逸仙 .....	33
三、庚子勤王谋再起英雄无奈空余恨 .....	35
四、羁泊非所叹其乐也无疆 .....	36
第五章岁月苦随公碌碌自东徂西广见闻.....	37
一、檀岛双遗恨绵绵无绝期 .....	37
二、游历澳洲载誉而归 .....	39
三、游历美洲眼界大开 .....	40
第六章曾经沧海难为水孙梁反目却成仇.....	42
一、召开保皇大会以改良为依归 .....	42

二、分道扬镳迟早事内蕴玄机早已知 .....	43
三、发表“开明专制论”一石激起千层浪 .....	44
四、偃旗息鼓休战交涉 .....	46
第七章立宪舵手推波助澜.....	47
一、联络达官显贵谋求解除党禁 .....	48
二、组建政党立宪中坚 .....	49
三、主笔《国风报》宪政的灵魂 .....	52
四、关注财政问题力求有所创拓 .....	53
第八章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54
一、武装立宪保皇室来去匆匆情何堪 .....	54
二、倡导虚君共和不改立宪初衷 .....	55
三、海归宪政功臣与袁握手言和 .....	56
四、进步党党魁谴责宋案元凶 .....	57
五、一流内阁人才济济 .....	60
第九章力挽乾坤反袁护国.....	64
一、帝制闹剧丧家国冷眼旁观洞时事 .....	64
二、雄文一篇烁古今魑魅魍魉胆魂惊 .....	65
三、密谋讨袁详细策划 .....	67
四、护国军师精心筹划 .....	69
五、入桂从军再造共和 .....	71
六、军务院抚军非去袁不可 .....	72
七、再造共和功臣痛悼蔡松坡 .....	74
第十章再战复辟逆流出任段阁财长.....	75
一、组成研究系力战商榷系 .....	75
二、调和府院对德宣战 .....	76
三、反对张勋复辟再次捍卫共和 .....	77
四、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 .....	78
五、再度入阁掌理财权 .....	79
六、爱国至诚终不改巴黎和会显神通 .....	80
第十一章卓越的学者慈爱的父亲.....	81
一、筹办教育培德育才 .....	81
二、潜心著述成就非凡 .....	84

三、言传身教抚育栋梁 .....	85
四、斯人已乘黄鹤去却留美名在人间 .....	87

# 第一章天生俊杰才华横溢

## 一、青山秀水书香门第

自古以来，广东就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滚滚的东江水、西江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近代中国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四个先进人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除严复外都诞生在这里。南国的广东又以其悠久的历史、中国开放最早的地区、近代中国人民最早掀起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地方而闻名于世。在广东的西南部，有一个新会县。出新会县城南行，经名胜“小鸟天堂”，可直奔西江与潭江汇合处的凤山。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代伟人梁启超就出生在凤山之麓的茶坑村。这里蕉林与葵树交相成行，橙橘遍野，稻米飘香，三冬无雪，四季常花，是典型的物产丰富、景色迷人的南国风光。

茶坑村有 100 多户人家，500 余人。村前一清澈见底的小河缓缓流过，时有风行的帆船飞驰，村后一布满松柏竹林的小山拔地而起，游人清脆的歌声此起彼伏。山上有一建于明代的凌云塔，雄伟壮观。立于塔旁，珠江三角洲的秀丽景色，尽收眼底，南海潮的冲天巨浪，隐约可见。可以想像，青少年时期的梁启超常绕塔漫步，思潮起伏，叹人生之艰辛，思祖国之兴衰，念天地之悠悠的情境了。

新会属亚热带气候，花开四季，严冬无雪。但时有台风侵扰，人祸、天灾亦不断袭来，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社会环境往往左右着人们的生活习性。因此，抗拒灾难，善于应变，便成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造就的新会茶坑人的性格。从晚清的各种文献来看，长期生活在茶坑一带的乡民具有顽强的生活能力，善于应付各种突发事变，勤劳俭朴、务实求新、自强爱乡。又因为世居小岛，为外面的世界所吸引，好读书，尚学问，不善商贾，便也成了茶坑世风。古朴之气荡漾乡间。当时尚无电报、电话和轮船，交通及信息都相当不便，十分闭塞。

1873 年 2 月 23 日，当梁启超第一声啼哭时，给他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古朴、典雅、封闭而又缺少生机的小乡村的生活环境。幼年的梁启超生活在这种环境里，耳濡目染，深受影响。梁启超出生的那个时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也是创造英雄业绩的时代。1840 年，英国人

用坚船利炮强行敲开了中国的南大门，然后一路长驱直入，耀武扬威。酣睡的中国从枪炮声中惊醒过来，睡眼惺忪，还未明白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被迫签下了城下之盟，紧接着法、美、德、俄等国接踵而至。中国陷入了深渊，岭南陷入了深渊。有苦难便有抗争，林则徐虎门销烟，关天培血战疆场，三元里乡民也发出了怒吼。岭南，又是一片充满爱国主义传统的土地。当时，太平天国惨遭失败，洋务新政和早期创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浪潮正在席卷南国的这片土地。故乡的山山水水养育了日后的斗士和学者，也在梁启超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一年，孙中山 8 岁，康有为 16 岁，张之洞 37 岁，李鸿章 51 岁。

梁启超的先世乃福州人，北宋末年遭亡国之祸乱，由福州迁至南雄，明末以同样的缘故，由南雄迁往新会，从此定居。数百年来，祖祖辈辈，且耕且读，过着与世无争的清贫生活，到了他的祖父才稍有起色。其祖父名维清，字镜泉，是梁氏家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秀才，曾做过一县的教谕。为人恬淡，看不惯官场的腐败，为官不久便辞职回乡间执教鞭，成了茶坑村的一位乡绅。据传，梁维清生前乐善好施，尤致力于本村的公益事业。他见村中道路失修，便率先把节俭出来的钱捐给村里修路。他还谙熟医理，常替乡人诊病，而从不计较诊金。他本人也因此得到村民的爱戴，成为茶坑村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梁维清十分重视对子孙的教育，除了教他们读书识字外，平常尤其注意引导儿孙树立忠孝观念。每月的第一日，他必率儿孙瞻仰祠堂，拜祭祖先，年年如此，坚持不懈。此外，梁维清每年还总要带领全家乘舟赴崖门祭扫高祖毅轩之墓，沿途目睹南宋亡国时舟师覆灭的古战场，总情不自禁地向儿孙讲述他们早已熟悉的南宋故事，并高声朗诵起陈独麓“山木潇潇”的诗句，当朗诵至“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时，不禁面露悲壮之情，表现的颇重民族气节。这种活动，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里悄然埋下了忠君爱国的种子。

作为一家之主，梁维清对幼年时代的梁启超影响很大。在他生前所见的八个孙子中，他对梁启超最为钟爱，训导最严。白天，他给梁启超讲英雄豪杰的故事和崇高德行，讲亡宋亡明的国难痛史。讲到动情处，常常唏嘘不已。到了晚上，就将他收在膝下授读《四书》、《诗经》，直到梁启超实在顶不住倦意了，才让他与自己同睡一榻。

梁启超的父亲名宝瑛，字莲润。梁维清对宝瑛要求极严，千方百计让他刻苦攻读，希望能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但梁宝瑛仕途接连失败，只落一个教书先生出入茶坑村的私塾之中。梁宝瑛一生勤奋，为人厚道，品行方正，他对梁启超除了教读书作文外，尤其注意品德的培养。把自己无法实现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一再告诫梁启超要自少立志，做一个不平常的人。平时对启超要求甚严，督课之外，还命其从事田间劳作，言语举动稍不检点，便大声呵斥。梁宝瑛关心公益事业，善于排解是非、调和乡里而远近闻名。梁启超受其父言传身教，自然也十分灵活善变，富于调和精神。他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其价值观念介于中西之间，政治立场介乎保守派与革命派之间，也许正是感受了其父的影响。

梁启超的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能诗能文，贤惠聪慧，勤劳干练，在茶坑村以贤孝闻名乡里。赵太夫人是一位十分称格的母亲。她除了生活上给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外，还做了孩子们最好的启蒙教师，教他们读书识字，引导他们做正派人。在《我之为童子时》一文里，梁启超回忆小时候母亲对他的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那是6岁的时候，他因某事说谎，平日里和蔼可亲，终日含笑的母亲，第一次动怒。她令梁启超跪下，力鞭十数，鞭打之后，她教梁启超说：你若再说谎，将来就会成为盗贼，成为乞丐。人为什么说谎？或者是因为不应该做的事情，而自己做了，害怕别人责备不应该做，便谎言自己没有做；或者有必须做、应该做的事，而自己不愿做，但又害怕别人责备自己应做而不做，便谎言自己已经做了。这对说谎的人来说，明知它的过错而故意犯之，不仅是明知故犯，而且自欺欺人，以为有什么好处。这种行为与盗贼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可是，欺骗了别人，最终都会被人知道，将来人人都会指着他说，这是个爱说谎的人。从此，再也没有人去相信他了。既然没有人相信，这样的人，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梁启超：《我之为童子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20页【HT】

母亲的这一番教导，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及至过了30多年之后，还认为这是千古名言。梁启超后来毕生仁厚，也以忠厚仁慈教育自己的儿女。有些亲友的孩子寄居在他家时，梁启超夫妇也视为如同己出，非常仁慈地关怀爱护他们。梁启超15岁时，赵太夫人因难产而逝。当时梁启超正就读于广州学海堂，梁家派专人驰保，梁启超遂星夜兼程，还乡奔丧，然仍未赶上殓丧，是为终身之恨。赵太夫人生过4个儿子，2个女儿，【JP2】长子便是梁启超。梁启超的家庭在贫穷落后的茶坑村算得上是士绅家庭，在他的气质中，既有士绅遗风，又不乏平民气息，这同他的家庭影响有关。

## 二、新会神童器宇不凡

历史上成名的大人物，有的是少年得志，有的则是大器晚成。梁启超属于前者，他的童年是在神童的一片赞誉声中度过的。梁启超才华早露，童年时就常表现出惊人的学识。他的启蒙教育主要由父母和祖父来完成。在祖父、父母的悉心指导下，从7岁起，梁启超学习写文章，进步很快。到了8岁，已能写出洋洋千言、文理通顺的文章来。至9岁，更是诗才敏捷。下面二三事例可见一斑。一日，启超在家中玩耍，忽然爬到梯上去，他的祖父怕他失足跌下，便站在梯旁防护，启超不但不以为意，反而得意地说：“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又有一天，有客到访宝瑛，启超上前奉茶，客人欲试一试他的聪明如何，就出了一句“饮茶龙上水”，命他对，启超不假思索，应声答道：“写字狗扒田”。上联是新会俗语，下联对的也是新会俗语。小小年纪能这样敏捷应对，客人大为称赞。接着又出了一句“东篱客赏陶潜菊”，让启超对，梁启超稍作思考，脱口而出“南国人思怀伯棠”，在座者齐声喝采。还有一次，梁启超住在他父亲的朋友

李兆镜家中，李以“推车过小陌”，叫他对，梁启超马上以“策马入长安”相答。其对句之工，气魄之大，真可谓语惊四座。

少年时期的梁启超，就很爱思考问题。茶坑村的东面有一座不很高的熊子山(又称凤山)，山上有一座明朝万历年间始建的凌云塔(此塔建在熊子山上，有时又称熊子塔)，梁启超在少年时期，经常登上此塔游玩和远眺。11岁时，曾以此塔为题，写了一首《登凌云塔诗》：

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

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

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

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

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

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

搔首独徘徊，此理终难得。

他的祖父在看到这首诗之后，曾为他在诗中对天、对孔子的大不敬而生气。因为当时的读书人，绝大多数对天、对孔子达到迷信的程度，很少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质疑。而梁启超从小就勤于思考，善于提出问题，碰到问题，总要寻找答案。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1882年4月，梁启超9岁时，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到省城广州去应童子试。在清代，童子试是士子初阶之试，科举仕途的必由之路。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童试取中者为府、县学的生员，俗称秀才。新会县距广州百里之遥，乘舟走水路需3天。同行的人多是和他父亲一辈的老童生，只有梁启超是个风华正茂的少年。一天，大家在船上一边吃饭，一边吟诗作赋，比试才学。有人突然指着盘中的咸鱼，要梁启超以此为题作诗。他稍停片刻，便当众朗诵：“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在座的人听了，都拍手叫好，称赞他说得十分切题，叹为“神童”。从此，舟中吟诗的故事不胫而走，梁启超“神童”的美名传遍乡里。梁启超10岁时阅读了张之洞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輶轩语》是讲治学方法、科举时文和有关程式的书。《书目答问》是为学习经、史、词章、考据诸学指示门径的一本目录书。这两本书对他影响很大，使他从此才知道天底下什么叫做学问；11岁进一步阅读《唐诗》、《史记》、《汉书》等。根据后来梁启超自己所说，《史记》一书，他能背诵十之八九，几乎过目不忘，熟记唐诗、宋词，更不在话下。

这次考试，梁启超虽然没有考上，但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繁华热闹的省会，看到了广州与茶坑村乡土社会迥然不同的都市社会风貌，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两年之后，即1884年，梁启超第二次去广州参加府试，终于如愿以偿，考中秀才，补了博士弟子员。在他11岁的年龄，就达到了他祖父的功名，实现了他父亲一生都没能实现的愿望。11岁的童子成秀才，这在中国

科举史上是不多见的。主考的广东省学政叶大焯惊喜交加，特地找梁启超等几位年龄较小的秀才，试以文艺，独梁的对答条理清楚，极少差错，叶大焯叹服之情不觉溢于言表。善于察言观色的梁启超灵机一动，乘机跪倒在地，请学政大人为其祖父梁维清作七十寿言，身为三品大员的叶学政或为其勇气所动，或为其孝情和聪慧所动，竟破例应其请求，当即为其祖父写了一篇祝寿文。叶大焯认为茶坑村居熊子山下，风水极佳，梁氏家法甚严，教子有方，梁启超的才华足以同古代神童吴祐、任延、祖莹、刘敞等人相媲美，前途无量。他告诫梁启超说：“子如有志奉庭训以承祖武乎，当如韩退之赠张童子，宜暂息夫其已学者，而勤夫其未学者，务臻于远大，当不仅如乐安、任嘏之幼而多慧已也。”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页

学政的鼓励与教诲，使少年梁启超深受鼓舞。他后来没有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而是树立起更加远大的目标，此番教诲无疑起了重要的鞭策作用。

### 三、乡试中举风华正茂

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跨进了名噪一时的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由前两广总督阮元所设，旨在给秀才们提供一个深造的场所。阮元其人，乾隆进士，曾官至侍郎、巡抚等，但无论做什么官都脱不了读书人的癖好，总是注重开设学堂，教化风气，其本人对经学、史学、天文学均有研究，在两广地区，官声不错。该校先生称山长，一般有8人，必须人品好，学问深，在学界有一定地位，督抚到广州赴任亦前往拜谒。学海堂分专科生和附课生两种，承继的是“汉学”传统。“汉学”又称“朴学”、“训诂学”，一般指清代乾隆、嘉靖年间出现的推崇汉代儒家，致力于训诂、辨伪的乾嘉学派之别称。讲究治学严谨，从文字学及训诂入手研究经典，长于考证、辨伪。每月初一，山长和学生共餐，相互交流感情。学堂还设有奖学金，奖励学业成绩优异者，梁启超经常得奖，用以购书，每当寒暑假回家，总是背一大捆书。几年下来，他先后买了《皇清经解》、《四库提要》、《四史》、《二十二子》、《百子全书》、《粤雅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等，昼夜研读，眼界为之大开。

和学海堂并立的还有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号称广东五大书院。各书院虽然风格不一，但皆以汉学为主要教学内容。1888年，15岁的梁启超成为学海堂的正班生，同时又是菊坡、粤秀、粤华书院的院外生。先后教过梁的先生有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等，从他们那里，梁启超系统地接受了有关词章训诂和典章制度方面的知识，对汉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后来承认自己这一时期的学问大多是从这些老师身上得来的。如果说梁启超中秀才之前主要是在祖父、父母的教导下钻研八股文，那么，进入学海堂之后则转向了汉学。这种视角的转移，扩大了视野，对科举考试也有一定的好处，更重要的是为梁启超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学

术功底。梁启超晚年离开政界后的学术研究，就是赖于广州五年苦学打下的基础。

1889年，16岁的梁启超神态潇洒，踌躇满志。这年9月，广东举行乡试，梁启超胜券在握，欣然应考。考试共分三场，每场考三天。头场考八股文三篇，试帖诗一首；第二场考五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策问五道。他都得心应手，一挥而就，结果一举中的，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是个思想开明的维新派，看到神童梁启超的试卷，非常欣赏他的才华、见识，不禁拍案叫好，并把试卷递给副考官王可庄过目。王可庄接过试卷，为文章的精彩而惊讶，深感人才难得，立即想到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而李端棻早有所思，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年轻的堂妹，正待字闺中，不如乘此机会，缀合这门婚事，并打定主意请副考官王可庄从中作媒。当李端棻提出请他做媒人的时候，王可庄目瞪口呆。由于李先提出，王可庄内心有说不出的惋惜，半晌说不出话来，两人最后只好相视而笑。李端棻见此情况，便借与考生面谈的机会，直接向梁启超讲了自己的想法。梁启超在主考官面前，无法拒绝，也无意拒绝这门婚事，只能深深感谢主考官的厚意和栽培。梁启超的父亲知道这件事之后，很为不安，因为自己家世代耕读，而李家则世代为官，难以高攀，因而婉言谢绝。李端棻则表示：我也知道启超出自寒门，但他前途无量，不久即可青云直上。我家物色的是人才，而不是依贫富来考虑，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堂妹深明大义，我才敢于为她主持这门婚事，请不必推却。这门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这真是书中自有颜如玉。

李端棻是梁启超的科场恩人，又是梁启超的大舅子，是他慧眼识英才，成就了梁启超的科名，也成就了梁启超的婚姻，梁李从此成为忘年之交。戊戌时期李端棻官至尚书，积极支持维新运动。梁启超每次入京，必与他促膝交谈，甚为投机。戊戌政变时，他不肯变节而自投入狱，以68岁高龄充军新疆。光绪二十七年放归，主讲贵阳书院，不久去世，终年75岁。

两年后，梁启超在父亲陪同下，前往北京与名门闺秀李蕙仙完婚。从此，梁启超不仅有了生活的伴侣，而且又多了一位事业的同路人。李蕙仙出身官宦之家，教养甚好。婚后，她相夫教子，孝敬老人，操持家务，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不仅如此，她还能在事业上支持自己的丈夫。梁启超一生忙碌奔波，戊戌政变后，在海外度过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对妻子及其家庭拖累甚重，但李蕙仙从未怨言。柴米油盐，迎来送往，养儿育女，所有的重任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梁启超是广东人，地方口音太重，影响了他与异乡人的交往，李蕙仙便悉心教他说北京官话，帮他克服交际中的语言障碍。梁启超在后来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梁启超对李蕙仙也关怀备至。李蕙仙携儿带女避居澳门时，环境恶劣，心境凄苦。梁启超在几个月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静表现，鼓励她坚强地生活下去，并告诉她读书之法、解闷之方，满纸都是浓情蜜意。其中，有一封信写道：南海师来，得详问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

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范明强：《烂漫天才—梁启超别传》，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溘然而逝。梁启超悲痛万分，即撰《悼启》一文，历数李蕙仙的温厚贤良。次年，在李蕙仙去世周年之际，梁启超抚今追昔，悲痛交加，写了一篇《祭梁夫人文》，字字含情，句句蓄泪。梁启超平生最讲乐观，最讲趣味。维新失败流亡海外，他没有绝望过；数十年侧身官场几起几伏，他没有消沉过；而这一次，他却再也挺不住了。从此，梁启超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便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几年后，他也奄然而逝。

## 四、结识长素受业草堂

梁启超中举以后，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而是继续努力学习。次年春，17岁的他要赴京参加全国举人的会试。会试是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最高层次，会试中第者称为进士，封建举子们一旦金榜题名，便是跻身于宦途了。由于他实际上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要出远门，祖父不放心，结果由父亲陪他一同北上。到京后，父子俩住在新会会馆。这次考试未中，他们便经由上海回广东。在上海时，他们逛书店，发现徐继畲编著的《瀛环志略》一书，十分欢喜，买了回来。这是一本关于世界地理的书籍，其中辑录了各国史地沿革、社会变迁及风土人情，读后大开眼界，从此才知道世界五大洲各国。〔JP2〕他还在书店看到许多上海制造局洋务派主持翻译的西洋各国的书籍，也很想买下来，但因手中无钱，只好作罢。

回到广州后，梁启超与老同学梁伯隽、麦孟华等人相聚一堂，期望名师指点。顺德人麦孟华年少机灵，才识过人，当得知梁启超期望名师指点时，立即对他说：“陈千秋最近拜康有为为师，此人颇有学问。”梁启超迅速找到陈千秋，了解康有为的情况。学海堂的同学陈千秋介绍说：南海康先生，号长素，上书请变法，未成，刚从京师回来，我前往拜见他，他的学问是我与你所想像不到的，我们现在找到一位好老师了。接着，陈千秋向梁启超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还指出康氏有许多异议和奇怪的论说。陈千秋的介绍大大地震动了求知欲极为旺盛的梁启超，梁请陈引见康氏。

当时梁启超以青年举人自居，又对当时流行的八股及训诂词章颇有研究，不免沾沾自喜。梁启超《三十自述》具体生动地记述了这一过程：“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辞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毁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页。

当康有为得知梁启超仅能背诵一些中国古典经文和会做八股文后，对这个年轻人不怎么瞧得起。康有为以长者的身份，系统地向梁启超介绍了他的学术及政治观点。他讲到古文经学为刘歆所伪造，八股文束缚人们的思想；谈到中国民族危机、清政府腐败以及变法自强的必要性。他说，孔子是个改革家，今日应该学习孔子进行改革等等。梁启超仔细聆听康氏的讲话，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决然舍弃旧学，退出学海堂，以举人的身份拜倒在当时还没有举人头衔的康有为门下。康有为见神童颇有诚意，亦觉光荣，决定接受梁启超为学生。梁启超在乡试中举后，并没有能连科等第，金榜题名。或许正是科场的失意，才使他结识了康有为。陈、梁二人共同请求康氏开学馆，于是便在广州长兴里成立了“万木草堂”。当时梁星海先生有诗：“牛女星文夜放光，樵山云气郁青苍。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深深一草堂。但有群伦尊北海，更无三顾起南阳。”将康有为比为南阳诸葛亮，等待着刘备三顾茅庐的邀请。梁启超从此便结束了在学海堂的学习，师从康有为受业于万木草堂，攻读公羊，涉猎经史。麦孟华、徐勤等也慕名前来求学。

#### 早年梁启超

万木草堂的教学，内容与形式都与当时的广州五大书院不同。课程设置重视采纳西学，注意德智体全面发展。康有为学问渊博，思想新颖，思路开阔，讲起课来，联系古今中外，一讲就是二、三个小时，忘记疲倦。而听的学生，也不觉得疲倦，感到有所收获，课后回忆起来，仍是津津有味。尤其是每当讲到国家局势、民不聊生、列强仗势侵略时，总是慷慨激昂，呼吸急促，甚至哭泣流涕。从而给学生以极大的感染。梁启超后来在《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一文中说：我们受他的教导，感到震动，恐惧而又警惕，深深懂得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暴自弃、游手好闲。每当我们离开万木草堂，总是把所听到的告诉亲戚朋友，并不怕厌烦地反复这样做。市俗之人惊讶地称我们为“康党”，我们也当之而不疑惧。这说明康有为的讲学，很能引人入胜，给学生以深刻的印象，并受到他们由衷的欢迎。因此，来听他讲课的学生日益增多。康有为的教学，除课堂讲授外，还有体育和音乐。

万木草堂还设有图书馆，康有为将自己家几代所积累的藏书都放进去供学生阅读。学生大多数是十五六岁至十八九岁之间的青少年，同学之间相爱如兄弟，康有为也视之如同自己的子侄，很是爱护。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康氏对此感到是人生一件极大的乐事。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学习了4年，为他一生的事业和学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康有为所著的《长兴学记》，是一本讲治学、修养，同时主张平等的书，梁启超研读之后，受影响很深，成为他日后立身治事的准则。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又帮助校勘与编辑康有为所编著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这两本书，动摇了清代学术正统派的立足点，并使一切古书都须重新检查估计。所以，梁启超评价说：“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强调这两本书影响力之巨大。

梁启超在进入万木草堂之前，除了训诂词章，尚不知道世间还有别的学问，但是师从康有

为后，他的眼前却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4年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注重学习方法，反对读死书，主张在理解书本要旨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思想见解。在学习中注重专精与涉猎的关系，做到博约结合。在草堂期间，梁启超读了《公羊传》、《春秋繁露》等今文经学的经典，读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宋元明儒学案》、《文献通考》以及先秦诸子，还读了生光化电、西方史地律例等西学课程，眼界为之大开。几年期间，梁启超的学业大为长进，在传统的中国学术方面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并学到了一些外国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知识。梁启超后来曾回忆道：“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这并非是他的夸大之词，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其学术思想确实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教育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这4年的学习使他树立了参与政治、改造中国的伟大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康有为对梁启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康有为主张“行仁”，行仁就必须合群。他认为：孤独，乃鬼神之道，非人道也。即使是佛教主张空寂，也提出若不普渡众生，誓不成佛的说法，“未有以自了为美者”。所以他曾大力促进合群，只有联合更多的志同道合者，才能担负起维新救国的责任。这些思想都深深影响了梁启超，在康有为维新思想的陶冶下，他逐渐走上了变法维新的道路，谱写了其一生颇富激情的一章。

康有为的教学显然已达到了目的。万木草堂虽然没有培养出几个高中进士的科场得意之士，但却造就了一大批矢志报国的维新人才，不少人都成为后来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麦孟华在北京参加公车上书，编辑《万国公报》，在上海创立不缠足会，为《时务报》撰文，后来又列名保国会。韩文举、徐勤、王觉仁都为澳门《知新报》撰述，徐勤在《时务报》也发表了《中国除害议》。后来，时务学堂的分教习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也都成为康有为的弟子。上海《强学报》的主笔也是徐勤、何树龄。至于梁启超，则更是亦步亦趋地追随康有为，积极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毫不夸张地说，是康有为和万木草堂造就了梁启超这颗政治新星，从此，康梁师徒携手，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晚清政治改革的大风大浪。有张元济的诗为证：

南洲讲学新开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

范明强：《烂漫天才——梁启超别传》，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 第二章政治舞台崭露头角

### 一、百日维新救亡图存

1894年是梁启超涉足政治的起点。这年3月，为准备来年的会试，他与夫人李蕙仙客居北京时间较长，对清朝政治的腐败和混乱有较深切的观察。当时中日两国交涉日紧，战争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又逢慈禧太后60大寿，北京城里，大兴土木，设点布置，忙于祝寿。这一切深深地刺伤了青年梁启超的心，他对清政府的腐败感到极度的失望，也感到极大的愤慨，再也按捺不住满腔的激愤，作诗消愁，抒发自己的一腔孤愤和远大抱负。他写给好友夏曾佑的一首诗中表达了自己哀民生多难、恨当道昏庸的悲愤心情：

怅饮且浩歌，血泪忽盈臆。

哀哉衣冠俦，涂炭将何极。

道丧廉耻沦，学敝聪明塞。

竖子安足道，贤士困束轭。

海上一尘飞，万马齐惕息。

江山似旧时，风月惨无色。

帝阍呼不闻，高谭复何益。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页。

这年8月中日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10月，日军攻旅顺、大连，占辽东半岛，清廷的所谓“龙兴之地”即将失守，北京城里舆论大哗。悲愤已极的梁启超感到时局危险，11月返回广东，寻求对策。

1895年3月，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一道，再度北上进京，参加会试。这次会试，康有为中进士第8名，梁启超则名落孙山。据一些野史轶文透露，当时的主考官为守旧分子徐桐，副考官是李文田、唐景崇、启秀。徐桐承业师倭仁的衣钵，讲求宋儒之学，以封建卫道士自居，反对引进西学，尤其痛恨那些喜谈变法维新的人。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三次请谒徐桐之门，恳其代奏，徐桐始终拒而不见。6年之后，狭路相逢，徐桐对康有为的反感依然如故，发誓决不让这位狂生在自己手中金榜题名。他通知各考官在阅广东举人考卷中，如遇有才气，牵引古义者皆不录。而梁启超在两场的经义考试中，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综论宏议，充分发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徐桐和李文田阅后，误以为是康有为的答卷，便抑而不录。李文田

还在卷末题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既寓讽刺，又含惋惜。梁启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做了老师的替死鬼。徐桐哭笑不得，自己精心布局，最终还是让康有为脱网而出了。按照惯例，放榜后考中者要拜见主考官，以感谢栽培之恩。康有为中进士，徐桐大为气恼，声称：“此人我决不与之谋面。”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试逗留北京，梁启超同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建立了联系，并担任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通过与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接触，梁启超的西学知识大为长进。李提摩太是英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翻译机构广学会的总干事。广学会自 1884 年创立以来。即以“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为宗旨，编译了不少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并发行《万国公报》等报刊，在宣传基督教的同时，介绍西学并鼓吹中国实施改良。通过与李提摩太的交往，梁启超很快成为广学会译著及《万国公报》的热心读者。对于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时事新论》、《文学兴国策》等书，他都极力向读者推荐。在后来的维新运动中，梁启超一直同李提摩太等传教士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在变法的过程中吸收了传教士的某些思想主张。例如，由梁启超参与撰写的万言上书便与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宣扬的改良主张有很多相似之处。

考试落榜，梁启超并未有太大的不快，他的心思已主要用在变法维新上。1895 年 4 月中旬，《马关条约》已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在京应试的举人议论纷纷，决心抗争。康有为觉得士气可用，立即令梁启超四处活动。梁启超连夜到各省会馆去讲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鼓动各省举人上书都察院，反对割让台湾，反对签订和约。梁启超首先联合广东举人百余人，湖南举人数十人，上书都察院，请代奏皇帝，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给日本。在梁启超等人的鼓动下，湖南、四川、贵州、江苏等 15 省分别上书。一时人山人海，衣冠塞途，奏章如雪片飞入，尤其是台湾举人最为气愤。但是各省上书后，朝廷均不予答复，举人们更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士气高昂。康有为、梁启超便决定把大家团结起来，联名上书。康有为在一昼夜间，挥笔疾书，草就洋洋洒洒万余言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举人们在松筠庵集会，讨论和通过上书的内容，到会者数百人。梁启超血气方刚，昂首走上讲坛，严肃、沉痛、高声地宣读万言书。与会举人听完万言书的内容后，无不奋臂扼腕，热血沸腾，争先恐后，纷纷在万言书上签字。京城有数百读书人集会，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可以说这是后来学生运动的先导。但主和派派人到各省会馆，向举人们进行恐吓，要他们撤销签名，有些胆小怕事的举人，在威逼之下，便照着办，但仍有 603 人不愿屈服而保留签名。

公车上书的核心内容，亦即是康梁的政治主张，为下诏、迁都、拒和、变法。“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下诏者，是要求光绪皇帝下罪己诏，承认失误，激励天下，以雪国耻。下惩罚诏，严惩甲午之役中屡失战机的大臣、将领及贪官污吏。下求贤诏，广求人才，破格任用。所谓“变法”内容更广泛，变成法而求富国、养民、

教民、废科举、办学校等。康梁还要求改革封建官僚体制，精简机构，广招人才，派员出洋学习，设立皇帝顾问处等。

由于历史上将赴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称作“公车”，意即由公家车马包送入京，因此，人们称这次举人的上书运动为“公车上书”。“公车上书”开启了文人学子集会上书、参与政事、呼唤变革的新格局。实际上是多年来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潮，发展为爱国运动的起点。书虽没有上达，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回响。光绪帝也赞成变法维新，对甲午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也感到很不舒服。他曾责问李鸿章：“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维新志士谭嗣同悲愤地喊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话语，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沉痛心情。

## 二、重办《万国公报》组织强学会

“公车上书”以后，举子们陆续离京，轰轰烈烈之后复归于沉寂。这种沉寂使康梁陷入了更深沉的思考之中。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一天，康梁又聚在了一起，照例是谈古论今，分析局势。康有为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一个维新的群体，为此要创办一个团体。在创办团体之前，先办一份报纸，介绍西方的概况，广播自己的观点。梁启超根据康有为办报馆、开学会的构想，积极进行筹备。于是，在设学会之前，先行办报制造舆论，成为康梁维新事业的先导。从此以后，梁启超就把办报作为自己事业的第一职志。梁启超主编的《万国公报》，1895年8月17日创于北京，每双日出版，刊印1000余份，委托送《京报》者代递，报名与英、美传教士的上海广学会所编的《万国公报》相同，以利于推广。

《万国公报》除转录广学会及其他报刊文章外，常由梁启超、麦孟华撰写百余字论文，介绍西方各国商务、矿务、铁路、农学、兵学等，着重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如《地球万国说》、《地球万国兵制》、《农器说略》、《铸银说》等。初发行时，王公大臣们颇觉惊骇。在北京官绅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起初的每期1,000份，不久即增至3,000份左右，对开通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创办《万国公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在王公大臣中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获得了一部分清朝官员的同情与支持。《万国公报》是维新派的第一块宣传阵地，它的创刊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强学会的筹组进程。

鉴于维新派人士一直处于分散活动，势单力薄的状况，康有为提出了建立统一的社团组织，以便把拥护变法的人士团结在一起，共谋大计的提议。这一建议得到了梁启超、麦孟华、沈曾植、陈炽等人的热烈响应，一些高官和学者也纷纷表示加入。1895年11月初，强学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的后孙公园，即《万国公报》的所在地。主要联络一些维新爱国志士和比较开明的清廷官员。以聚众讲学的方式，共求维新救国之道和中国自强之学。强学会是

中国人办的第一个学会，是维新派建立的一种松散的、学术性兼政治性的团体。它的建立，曾团结和影响了一大批爱国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强学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不仅参与强学会，还同意每年从户部拨款数千两银子作为各项活动经费。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也参加了进来。还有地方上的督抚张之洞、刘坤一也自称要维新，各捐了五千两银子作为会费。英、美公使听到消息，表示愿意赠送图书和印刷机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也进行活动打进强学会，企图控制这个组织。连李鸿章也想捐两千两银子入会，只是由于他的名声太坏，遭到拒绝。

强学会的活动，主要有四项：一是定期集会，宣传维新变法，每10日集会一次。届时由康有为等人发表演说。二是购置图书，设图书室，主要购置了一批欧美史地、风情、人文、道德和科技知识新书，以广



强学会会址

见识。当时购买这些图书很不容易。梁启超曾说过为买一张世界地图，在北京跑了两个月都没有买到，后托人在上海才购了一幅。三是译书，强学会中懂外文的人极少，但他们对译书十分重视，一有可能即请人翻译。四是办报。

在强学会的创办过程中，梁启超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及宣传作用，他不仅负责起草了强学会的组织章程，而且还担任了书记员之职。在《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后，梁启超又担任了该报的主笔。在梁启超等人的主持下，《中外纪闻》不仅在内容上较《万国公报》更为丰富，而且将从前附《京报》赠送王公大臣的做法，改为在京内外公开发行，任何人愿意订阅，均可与该报联系，这就扩大了读者范围，大大增强了报纸作为舆论宣传工具的效力。

综合来看，强学会的活动主要集中于精神文化方面，政治举动较少，但仍为守旧官僚所不

容，为清廷专制统治者所仇视。当时，顽固守旧势力不能容忍强学会的影响扩大，徐桐便奏请慈禧太后严惩康有为。李鸿章担心强学会的组织壮大之后对自己不利，便在暗中唆使他的亲家御史杨崇伊进行弹劾，说康有为私立会党，《中外纪闻》鼓吹西学，背叛圣教，请求严禁。康有为见风声不好，便离京前往上海，又在上海设立强学分会，并创办《强学报》。江浙一带的著名人士，如张謇、章太炎、汪康年、黄遵宪等都纷纷加入强学分会。而北京强学会的事务，就全部交给梁启超处理。1896年1月20日，慈禧太后逼光绪下令封闭了在北京设立只4个多月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张之洞见风转舵，也查封了开办仅1个多月的上海强学分会和《强学报》。梁启超不避危难，与强学会内一些维新派的同情者王鹏运、沈曾植等部分帝党官僚，据理力争。但他在强学会内毕竟势单力薄，他的行动招来投机分子的嫉恨，不但被彻底踢出局外，甚至连个人的服具、书籍也被没收。在北京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到4月春暖花开的时候，梁启超离开北京，前往上海。

### 三、《时务报》主笔言论界骄子

在1895年的维新运动中，梁启超虽然有办报的经历，并表现出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但作为一个天才的宣传家享誉全国，则是在主撰《时务报》的日子里。1896年就在北京的维新运动转趋沉寂时，维新运动的中心开始转移到开放城市上海。上海是19世纪末中国最为西化的一个通商口岸，维新运动在这里不但没有因强学会被解散而缓和下去，反而更蓬勃地发展起来。原上海强学会会员黄遵宪、汪康年在强学会的基础上，筹议另创新报，重振维新事业。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后，遂于1896年4月2日，给汪康年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共同办报的愿望。不久，梁启超即应汪康年、黄遵宪之邀去上海，积极参与筹办《时务报》。该报于1896年8月9日创刊，报馆设在上海四马路，汪康年和梁启超分任经理和主笔。

《时务报》为旬刊，十日一册，每册约20余页，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刚开办时，由于人手紧，梁启超在文字方面作了六七个人的工作，除撰写论说外，举凡报刊文章的润色、编排、复核，均由他一人负责。《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在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他认为，国家的强弱与信息学术及道路交通密切相关，通则强，塞则弱，报纸乃是一个国家的耳目喉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报务发达，故能做到上下相通，君臣一气，国家因此而日益强盛。中国因政治体制异于外邦，当政者对国家大事讳莫如深，政府的举动，老百姓真相不知，对于外国的情势更是了解甚少。

针对这种情况，梁启超提出了在中国办报应采取的四条措施：（一）“广译五洲近事”，使阅者知世界形势，明各国强盛衰亡的原因，避免夜郎自大。（二）“详录各省新政”，使读者认识到新法有利于国家，以减少维新运动的阻力。（三）“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因此而“奋励新

学，思洗前耻”。（四）“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渐知一切实学之源流、为学门径及发展趋势，不再抱残守缺，死守“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梁启超认为，按照这种方法办报，假以岁月，必将“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上，人才渐出”，十年之后，报馆的规模将臻于完备。

杨天宏主编《新民之梦—梁启超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页

该报内容新颖，文笔流畅，反映民众呼声，敢于抨击时政，一时风靡全国，成为和天津《国闻报》并驾齐驱，在戊戌维新时期影响最大的报纸。

《时务报》创办不久，梁启超开始独立地大显身手，成为言论界骄子。他利用这一宣传阵地较全面、系统地宣传他的变法主张、文化追求、改革内容和具体思路。《时务报》共出69期，无梁启超文章的仅17期，尤其在前期，几乎每期都有梁的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变法通议》一文。在这篇长文中，梁启超系统地阐述了变法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变法所应循的途径。他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化为例，说明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果抗拒这个规律，当变不变，最后将被迫导致破坏性的变化。梁主张变法宜从废科举、兴学校、培养人才做起。《变法通议》谈的最多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在梁启超看来，改革科举制度有以下几种方法可供选择。或在科举考试科目中增加有关中外史学和声光化电方面的内容，或在传统考试科目之外，增开一些新的实用科目，如兵法科、技艺科、明医科等，而最上之策是彻底废除科举制，建立全国性的学校制度。

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梁启超创造出一种适合于报刊的政论文体。他在《时务报》上所写的文章，力求通俗易懂，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框框界限，文笔生动，笔锋常带感情，平易畅达，说理透彻，别有一种魔力，令人耳目一新，满足了国难当头，广大人民关心世界及国家大事，要求图强，渴望新知的迫切愿望。在梁任主笔期间，《时务报》获得巨大成功，发行量扶摇直上，半年后即突破最初定下的4000份目标，增加至7000份，一年后达到13000份，最多时高达17万份，遍布全国70个县市，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矿泉。订阅《时务报》的人士不仅有开明士绅，而且有地方上支持维新运动的官员，湖南巡抚陈宝箴、杭州知府林启等，都曾通令所属官员士子踊跃订报。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教员也鼓励学生读《时务报》，并将该报的某些文章选作教材，让学生学习。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名声鹊起，成了官僚和士绅阶级中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

1897年初，梁启超前往武昌拜见张之洞，张此时是洋务派的实际首领，坐镇武昌，握有一方军队和数个近代化工厂企业，还办有军事、科技、文化各类学堂，在清廷官僚中是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大人物。但一听梁启超来拜谒，极为兴奋，破例开武昌城中门来迎梁，还问下属可否鸣炮？当下属告知梁为一小小举人，接见钦差和督抚时才可开中门并鸣炮之后，张之洞才不提鸣炮，以厚礼迎入城。拜见张之洞的那天，恰值张的侄儿结婚，客来客往，应接不暇，但张之洞丢下宾客，和梁长谈，至二更才散。张之洞请梁启超出任两湖时务院长，月薪千二百金。梁

启超这时一心扑在《时务报》上，婉言谢绝，但他对张之洞的礼贤下士非常感激，引为知己。应当承认，张之洞对《时务报》，对维新派是出过力，有过贡献的。当上海强学会成立时，张之洞首先捐款；当《时务报》发行不久，张又首购 288 份，分给属下，并誉为我国第一有益报。可是他毕竟是清廷大员，一切都是为了其自身的统治利益服务。后来，梁启超与汪康年关系恶化以至分裂，不知汪氏后台正是张之洞，这是后话。

1897 年 7 月，梁启超在《时务报》工作期间，又与吴樵、麦孟华、汪康年、谭嗣同、康广仁等，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当时，梁启超和上述的吴、麦、汪、谭、康，以及邹凌瀚、张通典、龙泽厚、赖振环、张寿波等，均为不缠足会的董事。这个会是因为是由《时务报》首先发起，不久，要求入会的人很多，又在其他地方设立分会。梁启超还为发展组织，草拟了《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此简明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凡入会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凡入会人所生女子，其已经缠足者，如在 8 岁以下，须一律放解，如在 9 岁以上，不能放解者，须于会籍报明，方准其与会中人婚娶。”在当时的中国，提倡不缠足是有很困难的，因为缠足已形成一种风气，不仅上层社会的女子要缠足，就是下层社会的女子也要缠足，否则就没有男人娶她，嫁不出去。梁启超等提倡不缠足，是从追求妇女解放、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着眼，这和他提倡设立女学堂的目的是一致的。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女学》一文中，就阐述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他说：女子受了教育，就可以使人口的半数由“分利之人”变为“生利之人”，可以使女子由见识狭窄变为视野宽阔，也有利于教育下一代，有利于保种强国。他在《戒缠足会叙》一文中也指出：过去的女子，被封闭在家庭里，虽然“贤哲如鲫，政教如海”，却没有一言一事是为女子着想的。以往对待女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为男人服役，豢养如同犬马；二是作为男人的玩物，饰之如同花鸟。这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虐待，缠足只不过是受虐待的一种具体表现，使妇女成为残缺不全的人。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还指出缠足给妇女带来精神和骨肉上的痛苦。梁启超不仅在道理上这么讲，在文章中这么写，在行动上也是带头实践的。例如，他带头不给自己的女儿梁思顺(令娴)缠足，还经常劝导妻子李蕙仙放足。他流亡日本后，于 1900 年，仍给在澳门的妻子写信说：“卿已放缠足否？宜速为之，勿令人笑维新党首领之夫人尚有此恶习也。”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252 页。

## 四、汪梁之间起争执时务学堂展雄才

如前所述，《时务报》最早是由黄遵宪、汪康年筹议创办的。梁启超于当年的 4 月底到沪参加办报。入报馆后，从一开始，便在报馆的宣传和管理上与汪康年有意见分歧。在商议办报宗旨时，汪康年主张报刊的言论应持谨慎态度，而梁启超态度激进，主张自由抒发言论；在报

馆的管理上，梁启超主张设立董事会，由总董拟定办事章程，然后交馆中人员执行，但汪康年不愿意接受这一建议，要以总理的身份独掌大权，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尽管存在这些矛盾，但在办报这一共同目标之下，汪梁都将分歧放在一边，没有妨碍彼此的合作。梁启超在第一年内，不但没有发表过于激进的文章，而且还答应不在报上宣传老师康有为的学说。他们两人矛盾的激化是在1897年的2、3月间，即在梁启超返回广东省亲归沪以后，梁启超受康有为的影响，在言论上改变前一年的承诺，转而热衷于宣传师说，所发文章，多言《春秋》“三世”、《礼记》“大同”之说。总之，《时务报》创立初期，汪梁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

汪康年不让梁启超在报刊上宣传师说，一部分是出于洋务派的压力，一部分是基于学术观点的不同，再则也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以免《时务报》招来洋务派和守旧之徒的攻击，重蹈《强学报》的覆辙。为此，梁启超深感苦恼，他告诉汪康年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未能征引，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闻南海而恶之，亦不过无识之人耳。即如去年强学之举，京师、上海应者如响自，顷在桂林开学，全省响应，可知公理固在人心也。……为销报计，则今日之《时务报》谁敢不阅？谓因此一语，而阅报者即知裹足，虽五尺之童，知其不然矣。公何虑焉？”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于学问和人格都是掷地有声的，也是梁启超不妥协的宣示，其实，何止是维护师门，对清朝官僚腐败的抨击，也已是摧枯拉朽，动人心魄，为有清以来所未见。在张之洞的授意下，汪康年牵制梁启超，干涉其言论的步子迈得更大了，乘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任职之时，延用私人修改他的文稿。例如，在《时务报》第43册，他将梁启超《变法通议》中“金银涨落”一节擅改数处，而不告知梁本人，使梁启超甚为不满。徐勤文章被腰斩，就连康广仁要登载大同译书局的广告，也因其有《孔子改制考》的书名而见却。

1897年2月，梁启超南下澳门，在那里创办了一份报纸《知新报》，由康广仁、何延光任总理，徐勤、何树龄任主笔，自己则兼任撰述。不久，梁启超回到上海，尽管作了极大努力，但仍然没有缓解与汪康年的紧张关系。这年夏天，汪梁分歧更为严重，梁启超凭其一腔热血，一支铁笔，自不甘受制于他人，更不会就此沉寂。他愤然离去，以求畅所欲言，再展宏图大志。恰好黄遵宪调任湖南按察使，谭嗣同等人要办时务学堂，黄遵宪便向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等推荐聘梁启超担任总教习。1897年9月初，黄遵宪等即致信梁启超请出任中文总教习。11月，梁启超由沪奔湘，离开了《时务报》，离开了这个由他造就也造就了他的蜚声海内的报纸。《时务报》馆小楼上的洋蜡烛熄灭了，维新之光升起来了。

长沙三面环水：西为湘江，东北为浏阳河，北为捞刀河。作为屈原、贾谊的伤心故乡，其文化也带有悲壮、忧郁的色彩，而近年来湘军崛起，战功显赫，虚骄之气日生。又因其壤地偏

僻，固步自封，对新事物新思想一概排斥，一时竟成全国最为守旧之地。当其时，陈宝箴为湖南巡抚，以开化湖南为己任，黄遵宪为按察使，江标为学政，熊希龄亦鼎力相助，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来长沙与大家一起创办新政，一时维新人物大集。就是在这样的气候下，梁启超前来加盟。

梁启超赶到长沙时，时务学堂已从 2000 名青年中招收了 40 名学生，建立了图书资料室，购买了一些科学仪器，以崭新的面貌立于湘江之畔了。西文总教习李维格及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黄遵宪等人都极热心于各项工作。这种如火如荼的热烈场面，使易于动情的梁启超不能自持，迅速投入教学之中。他立刻亲手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一曰立志，要求学生要以天下为己任，为救亡而献身；二曰养心，即明确做人的目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三曰治身，忠信笃敬；四曰读书，要上下千古，纵横中外之学；五曰穷理，注意思考和观察；六曰学文；七曰乐群，以文会友，联系群众；八曰摄生，锻炼身体；九曰经世，寻找图强之道；十曰传教，宣扬孔子精神。这十条学则总目标是学以致用，全面发展，服务于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此时梁启超刚 24 岁，风华正茂，他每天上 4 小时课，还要批改 40 多名学生的作业，有的批语上千言，他总是熬夜，每每总是夜已深沉到寂寥或者已是黎明。

这些青年学生一个个精神焕发，胸怀一腔救国热血，往往问题成堆，妙不可言。梁启超经常被他们包围，回答各种问题。教学之余，梁启超还和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等维新志士谈吐志向，议论时政，诗歌互答，享受知己者难得的快慰。在时务学堂这块自由天地里，梁启超如鱼得水，尽情施展其所能，气贯长虹，一揽江山。梁启超的讲话，内容新颖、丰富，说理透彻，听者莫不称赞，“神童”、“奇才”果然名不虚传。青年学生更为时务学堂有一位杰出的老师而欢呼雀跃。

在时务学堂，梁启超讲学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封建专制，大讲民权论，提出废君等激烈言论，大量翻印一些反清的小册子，鼓动湖南维新改革及实行地方自治等等，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教学，可说竭尽全力，他在课堂上讲课，一站就是 4 个小时，精心讲解，耐心答疑，神情昂扬，滔滔不绝。他不仅高谈民权、平等，更大谈种族问题。他还向学生指出：中国历史上的 24 个朝代，统治者没有一个称得上孔子所说“以仁义治天下”的王者，除了几个凭借武力、刑法、权势进行统治的霸者之外，其余都是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民贼。他向学生分析，当今之世，不变法就没有生路。他号召学生首先废除跪拜的礼仪和改变清朝的衣服式样。跪拜之礼，常为外国人讪笑。衣服虽是小事，但切于人身最近，要变法就得先变衣服。衣服能变，则没有不可变的。他甚至在批改学生的作业时，明白指出：清室入关时，扬州十日的屠城，乃惨无人道的民贼所为，令人发指。

梁启超还告诉学生，中国“君统太长”，应走向君民共主或民主。他在讲课中，要求学生弃绝清朝的禄位，养成坚苦的志趣，不为衣食所累。在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民权学说的教

诲与引导下，学生们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培养出一批追求新思想、放眼世界、通晓事务的有用人才，如蔡锷、林圭、李炳环等。他们在树立新的信仰后，又努力向外宣传，因而对社会影响很大。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不少时务学堂学生也亡命海外，继续追随梁启超从事维新事业。

在时务学堂授课的同时，梁启超积极支持“南学会”、《湘报》，为它们召开讲演会和提供稿件。南学会成立以后，主要活动是讲演，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轮日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行政学等，大力宣传设立学会的必要性。南学会的活动在当时影响十分广泛，它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湖南新政的蓬勃发展。由于南学会变法维新宣传的影响，湖南各府州县都陆续施行了新政。南学会对湖南社会风气的转变，知识分子思想的解放，也起了促进作用。梁启超还参与了《湘报》的创办，并担任董事和撰述。在湖南参与创办《湘报》是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期做的最后一件事。《湘报》刊行以后，影响很大。湖南巡抚陈宝箴每月拨给湘报馆二百两公款作为津贴，由于有陈宝箴的支持，《湘报》销行畅达，很快就成为湘中一大报。《湘报》在湖南变法维新舆论宣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又与谭嗣同展开反政府活动，将《扬州十日记》印刷了几万份，并加上按语，秘密散发。经过几个月的大力而广泛的宣传鼓动，使湖南的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的私立学校纷纷设立，几乎人人都能讲一套政治道理，以爱国相勉励，以救亡为己任，“英俊之才，遍地皆是”。在20至30岁之间的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的青年爱国者，为数甚众，难以计算。

梁启超还同时做上层的思想工作，想说服陈宝箴，使湖南自立，企图以湖南作为维新及救亡图存运动的根据地。1897年12月14日，他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处今列强环伺的形势，不变法将无以图存。但是，如果把希望寄托于朝廷，则南山可移，东海可涸，而法终不可变。“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他规劝陈宝箴效西汉末年窦融据河西一地自立及郑成功据台湾以存明正朔的故事，实施湖南自治。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募款修筑连接两湖至广东的粤汉铁路，企图建立以湖南为中心，以广东、湖北为奥援的种族革命及维新事业的基地。

杨天宏主编《新民之梦—梁启超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梁启超等宣传开民智、伸民权的活动，造就并影响了一大批爱国人士，当然也引起了顽固守旧分子的多方攻击。以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为首的守旧派，纠集一伙，策划打击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被迫辞退了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集甲。而梁启超于1898年初春大病，亦离开长沙回到上海治病。

# 第三章百日维新腥风血雨

## 一、组织保国学会保国保种保教

1897年11月，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起点，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灾难。康有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898年1月写就的《上清帝第五书》向光绪帝提出了不变法就要亡国的警告，此书虽未能及时上达，但最终还是递到了光绪皇帝手中。光绪皇帝看后深受感动，他指着上书中“长安布衣”一段对人说，如果上书之人不是出于至诚大忠，岂能如此直言不讳，立即传谕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询问有关事宜。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在召见康有为后，极力向光绪皇帝推荐，且有“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之语。光绪帝想亲自召见康有为，因奕訢反对未能遂愿，乃下令以后康有为如有条陈，须即日呈上，不许阻隔。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吁请光绪皇帝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厉行变法。其具体办法有三：（一）“大誓群臣以定国事”，即皇帝召集群臣在天坛或太庙宣誓，以维新变法为基本国策。（二）在午门设所，准许人民自由上书，有称旨者，量才录用。（三）开制度局以定宪法，即在内廷设一专门机构，下设12局，分管法律、度支、学校，以及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海军等具体事务。接着，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纪》和《上清帝第七书》等相继转送到光绪皇帝的手里，他的变法主张终于得到年轻的光绪皇帝的重视。



### 胶洲湾事件时德国在胶洲湾的兵营

是年3月，正因病在沪疗养的梁启超接到康有为的来信，命他即刻赴京。梁启超拖着尚未痊愈的病身，一路由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照护，北上进京，参与变法活动。当时北京正是三年一度的大考日子，各省举人云集。在康有为的直接指导下，梁启超接连发动三次公车上书，为变法大造声势。第一次上书是反对俄国强租旅顺、大连；第二次上书是抗议德国兵毁坏山东即墨县文庙内的孔孟塑像；第三次上书是请改科举制度，是三次上书中最具挑战性的一次。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参与了保国会的组织活动。康梁认为成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组织，时机已经成熟，即行策划准备。正好御史李盛铎也有会合在京应试举人开会的主张，便与李一道共谋发起。

1898年4月17日，康梁等二、三百官僚士子在北京南横街粤东会馆成立了保国会。康有为先作演讲，曰国之现状，曰如何报国，曰报国为谁等等，声泪俱下，几乎没有经过讨论便通过保国会章程30条，择其要者如下：（一）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二）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为保国家之政权土地。（四）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五）为保圣教之不失。（六）为讲内治变法之宜。（七）为讲外交之故。（八）为抑体朝旨，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九）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议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两个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保国会具有政党性质，也可视为康梁第一次试图组党之举，是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集中体现。因为保国会的推波助澜，维新的步伐加快了。

是年4月21日，保国会在崧云草堂举行第二次集会。面对情绪激昂的爱国志士，梁启超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呜呼，今日中国之士大夫，其心力其议论，与三岁以前则大异。启超甲午、乙未间游京师，时东警初起，和议继就，窃不自揣，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则信者十一，疑者十九……及至今岁，胶、旅、大、威相继割弃，受胁失权之事，一月二十见。启超复游京师，与士大夫接，则忧瓜分惧为奴之言，洋溢乎吾耳也。及求其所以振而救之之道，则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谈及时局，则曰一无可言。语以办事，则曰缓不济急。千臆一念，千喙一声，举国戢戢，坐待割割。……使吾四万万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1—112页。

他先是直陈民族危亡已经燃眉，中国已经被瓜分，眼下还在被瓜分，几千年生生不息的炎黄之地已由列强宰割争抢，而成为各自的势力范围。而更为痛心者，是有一些士大夫的“中国不可救药论”，他呼吁人们立即行动起来，投入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梁启超的演讲动于情，拨之

理，博得了满堂掌声。在国破家亡临近之时，民族感情是最易调动人们的爱国热情。久冻之后的复苏是缓慢的，却是不能阻挡的。

康有为下榻的南海会馆从白天到深夜，总是高朋满座，名流云集，康梁师徒激情满怀，高谈阔论，宣传他们的变法主张。在保国会的影响下，保川会、保浙会、保滇会相继成立，保国会的东风大有吹遍全国之势。然而，这惹恼了某些把握实权的守旧官僚们，吏部主事洪嘉与即授意浙江人孙灏写了一篇《驳保国会章程》，兵部尚书荣禄亦极力攻击保国会，军机大臣刚毅更是做好了查封保国会的准备，只是因为光绪皇帝亲自出面保护，保国会才免遭查禁。但会中不少人却出于避祸的考虑，退出了保国会，致使保国会会员骤减，名存实亡，仅开了三次会后便停止了活动。〔JP2〕但是，多年的磨难，使康梁完全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而且，保国会对激扬民气，团结维新志士，宣传救亡图存和维新变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为光绪帝新政的颁布奠定了基础。康梁从中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当 1898 年北京春夏交接的时候，梁启超变法的热情极其旺盛。

## 二、戊戌百日竭心尽智

经过整整一个春天紧锣密鼓的活动，到初夏时节，康梁终于迎来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日子。年轻的光绪皇帝在他们的影响和翁同龢等一批帝党官僚的支持下，同时也为了改变自己无权的状况，决定行动了。1898 年 6 月 11 日，发布“定国是”诏书。以皇上九五之尊宣布变法，倡言维新；尤其以上谕的形式要求博采西学，抨击守旧官僚，其社会影响和现实意义不可谓不大。诏曰：“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摒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挹坚甲利兵乎？……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异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光绪政要》第 34 卷，第 12 页

宣布从即日起实行变法，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正式开始。

先是光绪帝力排众议，6 月 16 日，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随后即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折奏事。从此，康有为多年思考的变法主张，通过一道道奏折，飞进皇宫，成为光绪帝变法的重要参考资料。7 月 3 日，光绪召见梁启超，命梁上《变法通议》，光

光绪帝读后大加叹赏，谓左右：“梁文章写得好，可就是他那广东话太难听。”传说梁启超北京话说得太差，光绪听得十分吃力仍不明白，便让他办理译书局去了。语言的障碍使梁启超失去了大胆建言的可能，这确令他抱恨终身。后来，梁启超请夫人教他学习“官话”，大概与此事有极



密切的关系。

维新志士严复，他对梁启超思想有很大影响

8月间，严复、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等人也先后被光绪帝召见，变法的声浪与日俱增。对光绪帝而言，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国家、民族在危难关头时，皇帝突然发现那些王公、大臣、铁帽子王，竟是如此昏庸，光绪只能面对这些年轻的陌生面孔，这是一批有真才实学者。在昏庸无能而又为了既得利益拼死抱残守缺者，与那些为家国民族敢于直言献身者之间，光绪选择了后者，此一选择意味着，光绪帝不得不把国家的命运、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帮书生。

维新伊始，诏令之多，实创下了清王朝的新纪录，每天由大内发出的上谕达一至二件。梁启超自豪地说：“新政来源，真可谓尽出我辈。”康梁几年来办报、办学、上书所讲的，现在大体上已成了光绪诏令的基本内容，康有为关于军事和教育的建议几乎全部被采纳。经济改革方面，除废漕运及废厘金制之外也得到了重视，惟独关于颁布宪法，立议院等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光绪帝小心翼翼地避开了。

梁启超在百日维新期间的活动，大致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代人捉笔，进行幕后活动。他曾替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各草一折，促使光绪帝颁发定国是上谕。后又替御史宋伯鲁代草一折，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各省生童均改试策论，停废八股。还曾

应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之请，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为京师大学堂草定规则 80 条；二是在办理译书局上，托人定译书局章程 10 条，另上书光绪帝，吁请增拨开办费、常经费和每月经费，使译书局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稍后，梁启超提出的设立编译学堂，毕业生徒准予学生出身，书籍报纸概行免税的建议，也得到了上谕允准。

耿云志、崔云海：《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83 - 84 页。

百日维新中，梁启超虽未担任重要职务，但他并没有游离在激烈的斗争之外，这一点，封建守旧势力看得最清楚，戊戌政变后，康梁一起成为清王朝通缉的要犯就是明证。

自 6 月 11 日至 9 月 21 日的 103 天，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高潮期，也是维新派最活跃的日子。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发布的新政命令达 100 多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等各个方面，概括起来，主要是：（一）改革官制，裁撤通政司、光禄寺、詹事府、太仆寺、大理寺等无用衙门，裁掉广东、云南、湖北的巡抚及东河总督，淘汰各衙门冗员，〔JP+2〕删订各部院办事则例；（二）废除八股，改革科举考试制度，讲求实学；（三）取消各地书院、祠庙，改做学堂，广译西方图书，准许民间创办学会、报馆；（四）准许平民上书言事，官吏不得阻碍；（五）改革财政制度和国家预算；（六）开办邮局，推进通讯事业；（七）鼓励开矿和修铁路；（八）振兴农工商业，中央设农工商部，地方设分局，鼓励私人兴办实业，设立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九）仿效西方，训练近代化的军队；（十）取消旗人特权，许其自谋生计。

### 三、较量宸中折戟沉沙

“诏定国是”是光绪帝孤注一掷自上而下的强行举动，但在维新的一开始就已经阴影重重了。“诏定国是”前，光绪已先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奏请恩准，慈禧不动声色，静以观变。“先让皇上变着瞧吧”，她有她的办法，她不相信光绪会跳出自己的手心。

在新会会馆，李端棻看着兴奋的梁启超摇摇头。“只是一纸而已，乐极生悲，祸生不测”，“诏令之下，岂有不尊。”梁启超问得很天真。“此一时彼一时也，彼时之皇上非今之皇上，彼时之太后非今之太后。”梁启超不语，若有所思。

慈禧并不是老糊涂了，她之所以在变法初采取克制和容忍的态度，是〔JP2〕因为《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民族危机太严重，不满清廷的情绪增大。若她马上出来制止新政，势必会激起众怒，这样一来一定是火上加油。他要让矛头转移，让光绪的变法引得众人怨声载道之时，再来收拾残局，但是要及早布置。

6 月 15 日，慈禧就胁迫皇帝连下三道上谕：一是将帝党官僚首领、军机大臣翁同龢开缺回籍。翁同龢是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光绪从童年到青年一直受他教诲，情同手足，光绪的新政也得到他全力支持，靠他在背后出谋划策，慈禧罢他而去，是对光绪的一个警告。光绪一见此

谕，战栗变色，无可奈何，内心的悲痛不可用言语来形容。翁一去，等于拆了他变法的顶梁柱，于是才演出了光绪帝挥泪送师傅，依依惜别，情断肝肠的动人一幕。第二道上谕是宣布今后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都要到慈禧太后面前谢恩，从而将高级官吏的任免权从光绪手里夺过来。第三是任命西太后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等北洋三军，把最重要的武装力量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西太后的这一招，实际为后来的政变做了充分准备。

6月16日，当光绪皇帝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时，西太后即于同日任命他的亲信崇礼署步军统领，严密控制了北京的卫戍部队，并把她的另一亲信裕禄放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探听消息，监视维新派的活动。6月24日，再任命怀塔布管理颐和园八旗、包衣、三旗官兵及鸟枪营事务，任命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进一步加强自己的防卫。

光绪皇帝已没有回头路可走，但他的权力实在有限，且处处受制于西太后。维新伊始，光绪帝几乎每天都要发布一两道上谕、圣旨，而裁撤机构、延用新人等措施，却总是被总理衙门、军机处拖延搁置。在中央，各部大臣敷衍塞责，耿耿于怀，不肯为新政效力。在地方，除湖南陈宝箴努力支持外，几乎没有第二个。随着变法的深入，阻力越来越大，火药味越来越浓。尽管如此，光绪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反击。6月20日，维新官僚宋伯鲁、杨深秀弹劾总理衙门大臣许应骙，得到了光绪帝的首肯。9月4日，光绪帝发布上谕革去怀塔布、许应骙等吏部六堂官，这就是轰动京师、震惊慈禧的光绪革礼部六堂官事件。这件事，是当时变法运动中一件很重大的事。因为一方面可以看出光绪皇帝变法的决心；一方面也是促成守旧派积极发动政变的一大原因。革罢礼部六堂官，光绪即又破例任命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为军机章京，直接参与朝政，审议变法事宜。

慈禧已经有点不耐烦了。9月初，慈禧迫使光绪发布上谕，秋季往天津阅兵，天津是荣禄的天下，在此废立再方便不过了。光绪帝预感大祸临头，自知力量单薄，于是令杨锐带出密诏，赐康有为，命其设法相救。事已至此，康梁一筹莫展。梁启超等人本是一介书生，既无权柄，又无政治斗争经验，只是想靠着皇帝的力量得以一展抱负的。皇帝自身难保，维新派自然遭杀身之祸。败象虽露，维新志士仍要作最后的努力。康有为认为，袁世凯掌握兵权，且有变法自强思想，在光绪遇有危难的情况下，也许愿意出力相救。9月18日晚，谭嗣同亲自到袁世凯的住所法华寺，对袁进行说服工作。关于这次密访，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中作了详述。其中的对话是：谭嗣同：“你认为皇上是怎样一个人呢？”袁世凯：“是旷世圣主。”谭嗣同：“荣禄他们想借天津阅兵的机会，废除皇上的皇位，这一阴谋，你知道吗？”袁世凯：“是的，曾听说过。”谭嗣同：“今天可以救皇上，只有你了。你若愿意救皇上，你就设法救吧。【JP2】……如果你不愿意救皇上，请到颐和园去告诉西太后，杀了我的头，去换取荣华富贵吧。”袁世凯正色厉声说道：“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所共事之主，我与你同受皇上非常的待遇，救

皇上之责，非独是你，我也有责任的。你若有什么指教，我很愿意听。”接着，谭嗣同又向袁世凯说明，荣禄是一个颇像三国时曹操、汉朝时王莽那样的奸雄人物，对付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立即表示：“若皇上在我营，则诛荣禄如同杀一条狗罢了。”他们两人就一起研究了救皇上的具体计划。之后，袁对谭说：“现在事情很急，我必须马上归营，更选将官，贮备弹药，请多加保重。”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08页。

谁料谭嗣同与袁世凯告别后，狡猾的袁世凯便立即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乘专车从天津赶到北京，直奔颐和园，向西太后报告了维新派的计划。9月21日，西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并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告由她出来“训政”。前后经过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运动，至此以失败了结。

## 四、流落他乡为异客断发胡服走扶桑

对这场守旧与维新之间的斗争，梁启超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维新派是敌不过反动的保守势力的。百日维新开始后，梁启超并没有对形势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相反，他处处感到保守势力的压迫，他对变法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清醒地认识到，在权力还掌握在西太后手里的时候，依靠光绪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十分危险的，他一心想着早日离开北京。但尽管如此，梁启超还是忠于维新事业，没有因此退却、躲避，一直与维新同志坚持到最后，并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积极奔走。

9月中旬，当得知慈禧太后将发动政变的消息时，梁启超与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康广仁等一道筹商对策，他力劝康有为赶快离京南下，主张由他和康广仁等人留下来谋救皇上。9月21日，就在政变发生的当天，梁启超正在南海会馆和谭嗣同对坐在床上，高谈阔论，策划袁世凯杀荣禄后，他们将如何行动。不料传来了清军查抄南海会馆和康广仁被捕的消息，接着火车停开，侦探密布，他们知道大势不好。梁启超劝谭嗣同逃跑，为留得青山着想，谭嗣同拒绝了，却要梁启超立即离开他，去日本使馆，求见伊藤博文看能否于皇上及康有为有所帮助。

午后2时，在一片恐怖气氛中，梁启超来到日本使馆，按照谭嗣同的嘱托，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提出援救光绪帝和康有为的请求。梁启超到日本使馆去游说一事，日本公使林权助留下了详细的记载。当时是午后2时，林权助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吃完饭正在谈话。林权助到另一房间去和梁启超会面，见梁启超脸色苍白，面容漂浮着悲壮之气。梁启超直截了当地说：“请给我纸”，他便马上写出以下的文句：“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梁启超接着补充说：“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志士都被逮捕，其首领是康有为，想也快要被捕杀头。皇帝不用说已被幽闭。西太后一派为袁世凯和军机大臣荣禄。如果我也被捕，最迟在三天内也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

可惜。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

林权助回答：“可以。君说的二事，我的确承担。”又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试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



戊戌政变后营救梁启超出险的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

梁启超听了林权助的话后，暗暗落泪，同时仓皇而去。林权助在回忆录中还谈到：“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指梁启超)飞快地跑了进来。那么这个问题便搁在我们身上了。我无论如何，把梁放进一个屋子里。没有办法，所以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伊藤公(按：指伊藤博文，曾任日本首相，当时来中国游览)。伊藤公说：‘这是做了件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当时门房报告，门前不安，好像是捕手觉着康(指康有为)或是谁逃进公使馆似的。所以，决定在麻烦还没发生前，急速让梁出发。”

正当日本使馆准备让梁启超迅速出走之时，日本领事郑永昌刚从天津到北京办事，林权助便让郑永昌和梁启超化装成猎人的样子，悄悄离开北京。但当他们二人到了天津车站时，在月台上被人发现了，报告清朝的捕手。在这危急的关头，梁启超和郑永昌赶紧躲避到人多的地方去，在混乱中跑向河边，见一艘帆船停在那里，他们立即跳上船，帆船直向白河上游的日本军舰驶去，并摇着白手帕作信号。日本军舰的舰长事先已接到北京使馆拍来的电报，作好了接应的准备。电报说：“如有这样的男子二人去，请立即收容，送到日本。”当舰长看见白手帕的信

号时，便迅速放下一艘小艇，把梁启超和郑永昌拉上军舰。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5—157页。

这时，清朝的捕手也乘坐小蒸汽船追赶，但没有向白河上游驶去，而是向白河下游直奔，并停泊在日本商船的舷侧等候。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梁启超在日本军舰的护送下，出逃到日本。

9月的初秋，在天津和日本的航线上，一艘军舰犁开浪花，平稳地行驶在北太平洋上。风和日丽，几个日本水兵正在甲板上，兴致勃勃地聊着什么，就在船尾站着一个人清瘦的年轻人，一袭长衫，宽宽的前额，睿智的眼神，清秀卓灵的面貌。但是他的眼神里隐藏着忧伤，他就是梁启超。望这渐渐远去的大陆，他心中思绪翻腾，尽管他躲过了那次腥风血雨的屠杀，对于祖国的忧虑和牺牲朋友的哀悼，他的心灵负荷又有几人能够明了啊！

面对广阔大海，壮观落日，碧波翻滚，忆及家人、事业、国家，不禁诗情大发，挥笔写了著名的《去国行》，表达了他离乡别井、前途渺茫的惆怅和伤感：“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尤幸非宋聋。……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阴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吁嗟呼！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声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第2页。

这首古乐府，诗情洋溢，思潮澎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梁启超当时的思想感情。他与康有为一样，不愿意象谭嗣同那样慷慨激昂地走向刑场，而是悄然逃走，留得青山，等待时机，从此开始了14年的海外流亡生活。经过这次血雨腥风的洗礼，梁启超对政治开始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初步意识到了流血斗争对于改造传统中国社会的必要，他的政治实践活动也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致在一段时间内成为革命派。

# 第四章避难东瀛重谋大业

## 一、开启民智筹办报纸

就在去日本的途中，梁启超用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日语的基本规律，已经粗通日文，当时传说梁启超一夜之间学会日语，成为当时海外华人中广泛流传的一段佳话。到达日本后，梁启超眼界大开，思想为之一变，他在给妻子李蕙仙的信中，这样说道：“在东京住了一年，稍微懂些日文以后，我的思想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深切感受到，“近代西方国家的文明真是日新月异，和过去数千年相比，真是开辟了一派新天地。”他认为促成这一历史巨变的根本因素，是新思想传播的力量，“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出版的自由，这三种自由是其他一切文明之母。”反观中国，他认为要改变国家的落后和社会的污浊，输入新思想是首要的关键。于是梁启超认定办报纸是继续从事宣传，改造国民的最重要的手段。

1898年11月，梁启超与冯镜如在日本的横滨创办《清议报》，该报为旬刊，成为当时最为名目张胆攻击政府的报纸。在《清议报》上，梁启超已开始用“饮冰室主人”为笔名。该报先后刊登了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和《少年中国说》等当时颇有影响的著作。该报出版100册后停刊。关于停刊的原因，众说纷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梁启超等人身在海外，大胆攻击清政府和慈禧的专制，深为当局所愤恨，在第39册上的《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把矛头指向西太后：“西太后对于祖宗的法律，利于自己独裁就遵守，阻碍自己的就会改变。我不得不感叹其用心之悍，而操术之狡也。然而，西后对于变法，又岂止此一事而已。祖宗之法，不许母后临朝，而西后却连续三次垂帘听政，妄图谋朝篡政；祖宗之法，不许外戚柄国，而西后却宠幸荣禄，使他身兼将相，权倾朝野；祖宗之法，不许宦官预政，而西后乃昵李连英，黷乱宫闱，卖官鬻爵；祖宗之法，不许扰民聚敛，而西后乃兴颐和园，剥尽脂膏，供己欢娱；天下勇于变法的，没有超过西后的呀！彼以变法之故，而自戕其身，自覆其家，自绝其族，自作自受，这倒没有什么可怜的。然而遗憾的是我二十一省膏腴之壤，四百兆衣冠之伦，何罪何辜，而一并断送于其手也。”梁启超：《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载《清议报》第39册第1页，中华书局影印版。

慈禧派专人到日本想刺杀康有为和梁启超，阴谋未果，因而一怒之下，放火焚烧了清议报馆。再就是由于报纸的经费不足，因为《清议报》的反政府性质，清政府严禁该报的入口，由于读者群的限制，不仅使该报的影响力较弱，也使该报得不到应有的经费周转，不得不停办。

梁启超在称赞《清议报》时说：“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新民丛报》创办时，靠借译书局的几千元作经费。后来大家议论，由梁启超和其他几位维新派的同志入股经营。梁启超占二股，冯紫珊（《新民丛报》的发行人）、黄为之、邓荫南、陈侣笙等各占一股。冯、黄等为维新派的事业，曾赔垫了不少钱，在译书局工作，未受一文薪水，全是义务性质。

是年五月，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曾提到此事：“《新民丛报》今年就可以全部还清借款，明年以后若能坚持，就能够给我们提供足够的资金。……现销场之旺，真不可思议，每月增加一千，现已五千矣。似比以前的《时务》尚有过之而无不及。紫珊、为之等商议将此报分为六股，以二归弟子，而紫珊、为之、荫南、侣笙各占其一。……亦颇为合情合理。但此数人皆如骨肉之交，他日若报款有赢，可以作为调济公费的一条途径。”梁启超在这里说改为股份办报“颇为合情合理”，是因为这几位同志以往为了办好报纸，都是鞠躬尽瘁，不取分文，为了报答他们，梁启超决定将报纸办为股份制，以便分以红利。

梁启超是该报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该报为半月刊，梁启超在谈到《新民丛报》的宗旨和章程的时候说：“1，本报纸取《大学》中新民的主义，因为要想维新振兴国家，当先维新我们的国民。2，本报以教育为主，以政论为附。3，本报为祖国前途起见，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求公平，不偏于某一党派，因为中国败坏至此，不是一个人的过错。”梁启超：《本告白》《新民丛报》第1号。

1902年，梁启超在该报发表的文章，以《新民说》和《新民议》两篇为主。在《新民说》中，他写了：“新民为中国今日第一急务”、“就优胜劣败之理来论证新民的結果，从而论所应改革的良法”、“论公德”、“论权利思想”、“论自治”、“论合群”等十五个方面的内容，对他所理解和希望的中国未来的民众，提出了一套全面的看法和要求。这种“新民”在他的笔下，自然是完美的，是代表了世界发展方向的。有了这种新民，不用说，一定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他希望能够通过教育等手段，来造就这种新民。

自从逃亡到日本以后，梁启超几乎是天天写文章，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也几乎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发表。开办《新民丛报》后，梁启超就更忙了，非常劳累。他每天大概要写5000字的文章，忙得不亦乐乎，致使各方面亲友的来信，都没有时间回复。梁启超写文章常常通宵达旦，有时甚至几天不睡。一次他写完一本书交给正在聊天的弟子说：“你们在休息玩耍的时候，我已经写完了一本书了，我也该去睡觉了。”

他在这两个刊物上，先后发表了100余篇文章和一些专著。其中除政治论著外，还有人物传记、游记、诗歌、小说以及对经济、历史等的研究。由于他满怀爱国、救国的热情，运用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的说理，使读者容易理解接受，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02年5月黄遵宪在给他的信中，说他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铁石

心肠的人也会感动。从古至今文字感染力没有超过梁公的。”

后来他的学生吴其昌在论述他的书中说：“梁启超的文章才是‘雷鸣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撼心魄，……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完有时怒发冲冠，有时热泪盈眶。’在 1896 年至 1910 年的 14 年间，‘任公实在是舆论界的骄子，上天宠幸的文豪啊！’大家也公认他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

《新民丛报》的创办，是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中最得意的时期。他一生创办和协办过 29 种报刊，但以《新民丛报》时期最为意气风发，精力充沛，文如泉涌，对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知识界影响也是最大的。郭沫若回忆他年轻时的情况时就说：“那时的青少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人。”“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毛泽东早期在湖南活动时所建立的“新民学会”，也是由于受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新民说》的影响而提出来的。胡适也曾深有感触地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胡适：《四十自述》，海南出版社，1997 年 3 月，第 457—458 页由此可以想见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何其之大。

## 二、寻找新出路谋联孙逸仙

在创办报刊，宣传维新思想的过程中，梁启超的思想日趋激烈，他在《新民丛报》中就曾提倡破坏主义，倡导变革、革命的思想，进行反清斗争。再加上清政府对革命派和维新派的封锁，两派的生存空间都相对狭小，也正因为此，双方都产生了合作的欲望。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初，孙中山与革命党人陈少白，见康有为、梁启超因变法失败，被西太后那拉氏通缉，逃亡到日本，曾想去访问康、梁，以表示慰问。孙中山和陈少白便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及平山周向康有为暗通款洽。但康有为却以身奉清朝皇帝的“密诏”，圣命在身，不便与革命党人来往为由，托故不见，拒人于千里之外。孙中山又转托犬养毅代为传达。犬养毅也是革命党人的朋友，同情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于是，他便约孙中山、陈少白、康有为、梁启超四人，到他的寓所会谈。当时，康有为并没有出席，而是派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面谈。在会见中，他们谈得很投机，兴致勃勃，乃至通宵达旦。

他们这次谈论的内容，主要是革命派与维新派双方的合作问题。他们对于合作的方法，讨论得颇为详尽。但虽有初步方案，而未有结果。因梁启超不敢做主，要回去向康有为请示报告，最后由康有为决定。这是梁启超与孙中山及陈少白的第一次会见。

过了一段时间，孙中山再次派陈少白去拜访康有为。这次是日本友人平山周和陈少白同往。当他们到达康有为的住所时，却被康有为的徒弟徐勤挡架。徐勤以康有为有病在身不便见客为

由加以阻拒。陈少白见此情况，只得说：“罢了，我来并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是来回访而已。”于是，陈少白同平山周正要转身往回走，恰好梁启超从屋里面走出来，见是陈少白，马上说：“原来是陈先生，请进来罢。”陈少白说：“刚才徐勤说，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我们只好回去了。”梁启超说：“并无其事，请进来罢。”于是梁启超招呼陈少白和平山周进入客厅，同时进去请康有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也不得不出来应酬。

陈少白面对康有为，痛陈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非推翻它无以挽救中国，并表示愿与康、梁合作，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可是，康有为有他另外一套看法和想法，与陈少白所说的，难以取得一致的结论。虽然经过3个小时的反复辩论，最后仍是不欢而散。这是梁启超和陈少白的第二次会见。

就在这一年的3月，清政府照会日本政府不得居留康有为，日本政府出于邦交的考虑，不得不通知康有为离开日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康有为去了加拿大，然后转赴东南亚，发展保皇党的组织。康有为走了以后，梁启超在这段时间里和孙中山的交往更加密切，政见日趋合流。在给孙中山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的：“我自认为我以前的政见太狭隘了，幸好还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至于办事宗旨，这些年来倒是没有多大的变动，只求国家的独立而已。至于方略，则随时可以变通。只要可以救国救民的，都会加以贯彻。与君虽相见数次，还是没有能互吐衷肠，谋定大计。这次约会，实在是太好了。我现在的家中很小，室中前后左右都是学生，不便畅谈。如您愿意，下礼拜三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谈为盼。”《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1-182页。

在这种情况下，两党产生了合并的意向，并开始筹拟章程。当时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深受儒家传统尊师教育的梁启超当时很不高兴，他说：“那把我老师置于何地？”孙中山说：“学生是副会长，老师不是更尊贵吗？”这样梁启超才勉强接受了。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96页。

但是康有为的另外两个学生徐勤和麦孟华不同意两党合并，并暗中通知康有为：“卓如进了他们设下的圈套了，非您不能设法解救。”康有为得书大怒，立即派叶觉迈到日本，勒令梁启超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迟延，梁启超不得已遵命赴檀，合作暂告中断。但是梁启超并没有完全放弃。梁启超在离开日本之前，曾约孙中山共商国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并请孙中山写介绍信，给他带往檀香山，以便认识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同时认识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同志，便于他开展工作。孙中山也同意了梁启超的请求，写信向其兄及诸友人作介绍，还相约今后共同为挽救中国危亡而继续奋斗。

梁启超在1900年1月11日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信中说：“这件事我向来无权办理，但是您应该谅解我所处的境遇，不要怪我。总之我们既然已经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虑此事，您再等一段时间，我一定有调停的好办法。”后来，梁启超虽然从檀香

山一再写信给孙中山，说明他接受康有为老师的任务，在檀香山组织保皇会是出于不得已。在檀香山，梁启超曾经对华侨说：他要组织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当时有的人及后人对梁启超的这句话，非常反感，批评他“挂羊头，卖狗肉”，说他欺骗了当地的华侨，也欺骗了孙中山。其实，按照当时的环境考虑，梁启超的策略还是可行的，这样不仅可以团结更多的人，也会给自己更大的回旋余地。但梁启超与孙中山分居两地，一个在檀香山，一个在日本，正是远隔重洋，交通又不便，两人很难及时交换意见。加上梁启超一直未找到“调停之善法”，彼此的隔阂便逐渐加深。

### 三、庚子勤王谋再起英雄无奈空余恨

在注重海外发展的同时，康梁并没有放弃国内的活动。比较重要的就是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

唐才常字轶丞，湖南浏阳人。唐才常和梁启超都是维新运动的著名人物。在创办湖南时务学堂时，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而唐才常是中文分教习。两个人又合力创办《湘报》，关系非同一般。戊戌政变失败后，唐才常也辗转到过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唐才常来到日本，开始与康梁筹划武装勤王。1899年秋，唐才常再次来到日本，双方共同商定了发动武装勤王的计划，由唐才常在国内负责军事，康梁负责海外筹款和调度。这年冬天，唐才常创办正气会，开始着手准备工作。就在这时，清政府发生了废立事件。慈禧以光绪重病缠身为由，准备废掉光绪，立醇亲王之子大阿哥溥俊为皇储，国内舆论哗然，维新派也是大加痛斥。这个事件也加速了维新派准备武装勤王的步伐。

庚子年（1900）春，义和团运动崛起于北方，维新派认为机不可失，加紧行动。不久唐才常将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接着以“保种救国”为名改为“国会”，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自任总干事。实际上上海“国会”是带有资产阶级议会性质的割据政权。同时唐才常又秘密赴汉口，组建自立军，到6、7月间，自立军已达到10万余人，并决定在7月以武汉为中心起义勤王。在整个过程中，梁启超和唐才常书信往来频繁，商讨行动的各个细节。梁启超在1899年就到了檀香山，由于瘟疫问题，他滞留檀香山达半年之久。梁启超便以此为基地，开始了筹集钱款，联络人员和组织筹划的工作。通过梁启超的积极活动和宣传，他在广大华侨中募集到了10余万巨款，有力地支持了国内的运动。在此期间，他还打破门界之限，广泛联络各界人士。他说：“如果有豪杰的才能超过我，而且心术纯正，我一定投到他的门下，为他奔走，不能以门第限制了我们的发展。”因此在檀香山，梁启超还加入了当地的三合会，被推为“智多星”。并且在梁启超的努力下，许多革命党人应孙中山之命也参加和支持了武装勤王的运动。

对于武装勤王的发动，梁启超一直主张要慎重，认为事关国家的安危，“不可轻于一掷”，“天

下大事岂同儿戏”。由于梁启超的策划支持和唐才常的努力，很快自立军的组织就达到了十万之众。在注重两湖的经营的同时，梁启超没有放弃两广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革命派在两广的发展刺激了他。虽然力量薄弱，梁启超还是决定加紧两广的组织发展，“趁人心激奋，只要有五六成力量，就可以做十成使用。”“我不早图，必落他人之手。”和革命派的竞争已经开始了。

梁启超在武装勤王的过程中，竭尽全力，大到款项筹划、用兵方略，小到布告旗号无不涉及。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给予相应的酬劳。武装勤王运动在张之洞的严密监视下，过早流产，唐才常也牺牲了。这件事对梁启超打击很大，一时间几乎不能振作。

## 四、羈泊非所叹其乐也无疆

1899年梁启超接家属到日本，李蕙仙带着长女思顺坐船来到长崎，后移住东京。1901年，梁启超游历澳洲半年后回到日本，在日本流亡的14年中梁启超有5个子女诞生：梁思成（1901年）、梁思永（1904年）、梁思忠（1907年）、梁思庄（1908年）、梁思达（1912年）。全家初到日本时，生活费主要由日本政府提供，但是生活仍然比较艰苦，后来主要依靠梁启超的办报收入维持生活。

1906年梁启超全家迁到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一幢别墅“怡和山庄”，这是一位华侨赠给他们的。因为这里依山傍水，可以听见海涛和后山上一大片松林的涛声，所以梁启超将它改名为“双涛园”。当时家中孩子很多，除了自己的几个子女外，还有几个亲戚的孩子，在一起非常热闹，梁启超高兴地称呼他们为“双涛园群童”。

“双涛园群童”从小都是穿日本的和服，也都会讲日语。稍大一点儿以后，都到神户华侨办的同文学校进行学习，每天孩子们都带着饭团到火车站赶火车，一群孩子排着队伍，很是有意思。后来小火车站的乘警都认识这群孩子了，有时候，孩子们迟到，他会等孩子们到齐后再放行。

梁启超每天忙于他的宣传和写作，和孩子们一起的时间很少。但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天南地北地给孩子们讲故事，尤其是在吃完晚饭以后，梁启超一边喝酒，一边向孩子们渗透民族英雄的爱国情结。什么南宋的岳飞、陆秀夫、文天祥等都给孩子们一一讲解。这些民族英雄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孩子们，是他们日后都成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的重要原因。

双涛园的樱花也是成林的，开花时节非常好看。因此他们也经常去爬山看樱花。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是传统大家族培养出来的大家闺秀，曾经缠过足，尽管后来放开了，还是和正常人的脚有些差别，因此在爬山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困难，往往落后。但是李蕙仙一点儿也没有大小姐的娇气，上山下山从不要人帮忙。梁氏夫妇的这种倔强的性格深深影响了孩子们的发展，他们从小就不相信眼泪，尤其是男孩子们认为哭是没有出息的行为，每逢遇到困难时，他们都

大声叫喊为自己壮胆鼓劲，颇有一点日本的武士精神。

在双涛园时，梁启超曾经写了《双涛园读书》6首，其中第6首生动地道出了他近年的感想和急于为国出力的心情：

回风吹海水，轩然起层澜。

吾生良有涯，忧患亦以繁。

生才为世用，岂得长自闲。

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

强学可终身，羁泊非所叹。

## 第五章 岁月苦随公碌碌 自东徂西广见闻

### 一、檀岛双遗恨 绵绵无绝期

在康有为的催促下，梁启超在1899年离开日本去檀香山，临行前日本友人柏原、东庙等人为梁启超饯行，梁启超赋诗一首表达了“壮哉此别”的心情：“丈夫有壮别，不做儿女颜。风尘故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11月29日，梁启超乘船抵达檀香山，准备转赴美洲大陆。在赴檀途中梁启超真正领略了太平洋的浩瀚与雄奇，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在短短几天内成诗30余首。其中《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抒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和豪迈气概：“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壶四方志，未取久恋蓬莱乡。誓将适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

这首太平洋歌很长，2,000多言，涉及梁的生世、心态、历史进化、文明演变、世界局势、进化理论等，是梁启超政治追求和复杂感情的集中抒发。当时正值午夜星空，借酒浇愁，欲睡不能，直到黎明，正是“酒罢、歌罢，但见寥天一鸟鸣朝阳。”

梁启超到达檀香山以后，由于当地瘟疫流行，美洲大陆禁止当地人前往，再加上清政府从中作梗，梁启超转赴美洲的计划落空。梁启超在檀香山滞留的半年间，受到了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除了为唐才常的自立军奔波以外，就是集会、演讲，宣传他的救国改良主张，考察当地的风土民情，办理保皇会事务，扩展保皇会组织，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在檀香山期间还有一件事情是梁启超难以忘怀的，那就是何惠珍小姐。尽管当时他才 28 岁，却已是驰名世界的维新人物和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到檀岛后受到热烈的欢迎。在一位何姓华侨举行的宴会上，梁启超即席演讲，因邀请了美国不少知名人士，便由这位华侨的女儿何惠珍担任翻译。讲演者慷慨激昂，翻译者流利准确，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何小姐正当妙龄，风度翩翩，慨然有丈夫气。她非常钦佩梁启超的才华，席散后便表示了纯真的爱慕之情：“我万分敬爱先生，但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等到来生。但望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了。”

梁启超惘然不知所措，很快便到外地讲演去了。由于缺少翻译，常给活动带来很大困难，不由得便想起何惠珍来。这时清政府以十万两银子捉拿梁启超，当地一家英文报纸也对他进行攻击，梁启超虽然长于论战，不会英文有话难言。但这时，忽有数篇同一署名文章起而驳之，梁启超不知作者何人。待回到檀岛后才知是何小姐所为，心里不由得暗暗敬佩。几位要好的朋友，都希望他与何小姐结合，认为这样梁既有了翻译，还有了英文老师。梁启超说我对何小姐为人非常钦佩，有机会要面致谢意。但我与谭嗣同在中国创立了第一个一夫一妻世界会，违背这个道义对不起死去的先烈。况且我流亡在外，头颅即值十万，随时有生命危险，一个结发妻子尚且离多合少，哪能再连累人家。不久何惠珍的老师又宴请梁启超。席间何小姐尽情畅谈，从中国的女学，说到妇女解放，从儿童的智力，谈到造切音新字的想法，滔滔不绝，几乎使梁启超难以应付。他完全忘记了坐在自己面前的是位年轻女子。

晚上回到寓所，梁启超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他是一个心地坦诚的人，便提笔给在日本的妻子写信。信上谈了与何小姐相识的经过后说：“近年以来，风云气多，儿女情长，然见其事，闻其言，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其人，不知何故也……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下，自顾二十八年，未有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提起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蕙仙，不知蕙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

梁夫人收到信后，便想禀告公公成就此事，因为在那个时代，三妻六妾者比比皆是。但梁启超以自己的理智战胜了情感，他将小像赠与何小姐，表示自己女儿长大条件允许，一定让她来教导。何惠珍回赠一把亲手织成的小扇，作为深情的留念。梁启超舍不得用，寄回家去请夫人代为珍藏，同时在信中表示，我靠蕙仙的帮助学会了官话，在全国讲演，也很想得到惠珍的帮助，驰骋于世界，但理智、人情、现实的条件都万万不能。为什么呢？以后梁启超有《纪事诗二十四首》，记录了生命海洋里掀起的这次独有的浪花，这样写道：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感情上的创伤未尝不含有痛苦，但与民族存亡，国家危难相比，毕竟是小事，所以最后跃然纸上的已是忧国忧民之情！

“猛忆中原事可哀，

苍黄大地入蒿莱；

何心更做喁喁语，

起趁鸡声舞一回。”【HT】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

此间，梁启超为了支持唐才常的起义回到上海，但是由于自立军很快就失败了，梁启超也不得不匆匆离开自己日思夜想的祖国，回到檀岛。此时正值澳大利亚保皇会组织邀请梁启超到澳洲访问，梁启超遂取道印度，风尘仆仆来到澳洲。

## 二、游历澳洲载誉而归

梁启超在澳大利亚呆了 8 个月，大部分时间住在悉尼。他每日不是交友，就是演讲，或者组织策划发展壮大澳洲的保皇会组织，或者向大亨筹集款项，每天的工作安排得很紧凑，十分忙碌。许多华侨，尤其是年轻人都把梁启超看作自己的偶像，也因此梁启超的名声更大了。梁启超的 29 岁生日是在澳大利亚度过的，当时澳大利亚的《东华日报》专门发了一则消息刊出了梁启超的大幅照片庆祝梁启超的生日，并且附有《像赞》说：“天生俊杰，拔萃超长；学问渊深，才德圭璋。君国筹救，民权扩张；志杰耿介，文彩飞扬。莘莘名世，誉播万方；经纶雷雨，应运斯臧。仰瞻颜色，邦家之光；猗欤休哉，同胞不忘。”面对这些赞誉，梁启超信心百倍，决心大展宏图。他在给吴济川的赠诗中说：“年来志气尚峥嵘，欲契民权朝玉京。君看欧罗今世史，几回铁血买文明。”《新大陆游记及其他》，《走向世界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630 页。

在这里梁启超表现了对清政府铁血镇压的大无畏精神。但是现实却辜负了梁启超的殷切希望，尽管雄心万丈，但是在筹款问题上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在澳大利亚居住的半年多里，梁启超主要从事筹款活动，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了筹款之难的情况：“已经筹了五六次了，人们已经开始厌倦了。”有的地方虽然写的捐了很多，但是大多没有落实。

这还不算，甚至有的地方的保皇会组织都已经无法活动，连会都开不起来了，“即使开会也没有款可以筹集了”。海外各地的保皇会经费又频频告急，而筹款恰恰是维持保皇会活动的根基。为了这个事情，梁启超的足迹几乎遍布澳洲各地，但是仍然效果微弱。不得不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离开澳大利亚回到日本。但是这段游历对于梁启超开阔眼界，锻炼组织策划的能力还是大有好处的，回到日本以后他的思想也越发深刻了。

### 三、游历美洲眼界大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2月20日，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组织的邀请，由日本横滨启航，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美洲大陆之旅。在赴美途中，梁启超度过了他的31岁生日，对于自己这些年的奔波劳碌，无限感伤，苦叹岁月之不饶人，时间之流逝如斯：“十年十处度初度，颇感劳生未有涯，岁月苦随公碌碌，人天容得某栖栖。”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

2月26日，梁启超的王后号轮船到达加拿大的渥太华，受到了保皇会的热烈欢迎。此时的梁启超，已经不是两年前去檀香山和澳大利亚的梁启超了，他已经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名流，执舆论之牛耳的人，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他的到来使加拿大保皇组织人心振奋，梁启超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同志邀请的宴会，连绵不绝。”从2月到4月，他在加拿大居住的两个半月间，一方面联络同志发展北美的保皇会组织；另一方面扩大北美译书局的业务，招股集资，并用股款开办商业公司，争取利用创办实业的办法，增加保皇会的活动经费，应该说这种方法较之单纯的筹集募款来说具有更大的主动权。

在此期间，梁启超和康有为还就改良与革命的问题有分歧，书信往还进行辩论，尽管康有为屡次责难，梁启超还是没有彻底回归。在参加保皇会活动的同时，梁启超还调查了当地华侨的状况。通过调查了解到，华人在加拿大约有2万人，普遍受到歧视，一是限制华人入境，二是设特别法律对待。华人在加拿大很难找到工作，但进入加拿大的华人仍是络绎不绝，原因是美国比加拿大略为好些，想由此偷渡美加边境进入美国。而华商之中却有人专门从事帮人偷渡为业。进入美国需华银7、8百元，其中交给带领偷渡的人2百元，入境时用以行贿的4、5百元，而其余船费和车费不过100余元。梁启超感叹地说：“祖国数万里膏腴之地，竟然使我国民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乃至投如许重金来国外谋生以求糊口，从而接受他族牛马一样的奴役，又是谁的过错呢！”梁启超：《新大陆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

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加拿大保守党领袖褒尔先生带领他参观构造精美的国会大厦，大厦以红白大理石相间，堪为建筑的精品。而梁氏最为感兴趣的是藏书30多万册的国会图书馆，体现了一个文化巨子终生不渝的治学情怀。在以前没有中国维新会的城市，梁氏来过之后也开始设立。这说明梁氏此行在发展组织方面贡献不小。

4月3日，梁启超离开渥太华，前往纽约。当梁启超于4月16日到达纽约时，到车站迎接的维新会同人和各界华侨有数百之多，还有一些仰慕梁启超的西方人。为表谢意梁启超即往华侨开办的戏院演说片刻。座中还有不少西方人，他用英语感谢他们的欢迎。从4月到10月他离开美国的7个多月时间里，梁启超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与保皇会组织相关的活动中，参加集

会、演说，接见华侨和记者，参加一些宴会，并且广泛接触西方各层政要和名流，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意见，还广泛地进行社会调查，在纽约期间，他甚至利用晚上的时间走访一些当地的市民，充分了解社会状况。在此期间，梁启超的足迹遍布大半个美国，先后到过纽约、哈佛、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巴尔的摩、匹兹堡等几十个城市。

梁启超回到日本后，将日记加工整理，编辑为《新大陆游记》，他综合提炼自己的见闻，对美国的社会状况提出了自己看法，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详细考察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流露出无限的崇敬和向往之情。梁启超的政治追求就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次有机会亲临考察，自己感到无限的欣慰。在这些记述中涉及政治的论述占一半以上，关于美国的总统、政府、社会、移民、历史、政党都有详细的记载。为了了解美国的政治状况，梁启超曾经亲自旁听了美国的议会辩论，还走访各类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平民，从多个角度加以了解。他注重政治的同时，还收集了美国的财政、社会分配、学校、军队、民间团体等各方面的资料，现在看来仍然有很高的价值。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梁启超对美国的无限崇敬与向往：“从内地来到香港和上海以后，眼界大开，内地太落伍了，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到日本以后，眼界又大开，香港和上海落伍了，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来到太平洋沿岸的一些城市，眼界又一变，日本落伍了，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渡过太平洋，来到美国的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的城市落伍了，没有可以称道的。”

梁启超在华盛顿期间，最为闲静，因为此地华人甚少，且无维新会，除访问罗斯福和约翰海，并遍游其兵房、库房、铸银局、博物院、植物园之外，不必会见其他客人。梁启超还参观了国会大厦，对如此华丽建筑赞不绝口，对其图书馆更认为是世界上最为美丽的图书馆，不仅藏书特别多，且几千年来世界上著名学者均有造像，其阅览室“常千数百人，而悄然无声，若在空谷”。而总统官邸白宫，则不过是渺小两层的歪白之室，还不如寻常富豪家的私第。让梁启超甚是羡慕，他还赋诗一首表达激动的心情：“琼楼高处寒如许，俯瞰鸿蒙是帝乡。十里歌声春锦绣，百年史迹血玄黄。华严国土天龙静，金碧山川草木香。独有行人少颜色，抚阑天末望斜阳。”类似这样的文字在《新大陆游记》中随处可见。在梁启超的笔下，美国是繁荣富强、民主自由、蒸蒸日上的天堂。梁启超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海外留学热潮的转向，在 19 世纪末，曾掀起一次留学日本的热潮，到了 20 世纪，由于美国的发展，中国的青年人又都希望到美国寻求救国的良方，留美热潮之所以经久不衰，和梁启超的描述有直接的联系，从而也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考察了解华人社会。为了在美洲发展维新社团，梁启超对华侨、留学生和旅美华人的生活状况非常关注。他拜访过容闳，接见了不少华人团体的代表，对于华人的政治地位、经济收入、税收状况、衣食住行、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都进行了深入地了解。梁启超非常重视华人社团的情况，对诸如中华会馆、三邑会馆、肇庆会馆、恩开会馆等地方团体，各类慈善团体，

如广东南海的福荫堂、东莞的昌后堂等和一些秘密社团都进行了接触和研究。在旧金山，华人的各种团体最多。对于这种各自为政，山头林立，互搞内讧的团体，梁启超特别反感，认为这是中国人素质低下的一个重要表征。梁启超认为这些中国人缺乏社会公德、民族意识，想加以改造都很难。通过对华人社会的广泛了解，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有四大缺点：“一是中国人有民族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是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是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四是没有高尚的目的。”《新大陆游记及其他》，《走向世界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52—562页。

这些评论有一定的合理性，梁启超已经看到了改造国民性的艰巨性。也正因为此，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和康有为多次争论没有结果，经过这次考察以后，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素质太差，不能行共和，只能实行开明专制，从而发出了“共和，共和，我与汝永别矣”的哀叹。尽管很憧憬美国的民主制度，他认为由于条件所限，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思想发生了回归，重新和康有为取得了一致。

9月10日，梁启超来到洛杉矶，当他到达时，当地华侨为他举行了最盛大的欢迎会，洛杉矶市长还调兵马一队、军乐一队，到车站迎接。之后梁氏在市长陪同下，乘车绕市一周，沿途西方人来观者为数众多，都对他挥手致意。维新会临时在街心搭一彩楼，供梁氏作演讲之用。13日，洛杉矶市又举行市民欢迎大会，市会堂张灯结彩，全市的著名绅商都来参加。在欢迎大会上，梁启超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会后又赴茶会。由于归期已到，不能久留，遂离洛杉矶北上，经旧金山前往加拿大的温哥华。

10月12日，乘“中国皇后”号轮船返亚洲，12月11日到达日本横滨。离开温哥华那天，收到各地发来送行电报96件，午后登上轮船时，到码头送行的有100多人，爆竹声声，连绵不断，持续一个多小时。梁启超极为感动地诵诗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 第六章曾经沧海难为水孙梁反目却成仇

### 一、召开保皇大会以改良为依归

如果说1903年以前，梁启超还在改良与立宪之间徘徊不定的话，那么游历美洲大陆回来以后，梁启超最终放弃了革命建立共和的主张，义无反顾地回归了改良。早在游历未归时，梁启超已经对革命党人表示了不满，他说：“中国之亡，不是亡于顽固派，而是亡于革命党。”返回

日本后，梁启超先后发表了《敬告我国民》、《中国历史上之革命研究》等论文，旁征博引论述中国国民素质太低，不能享受共和，只能实行开明专制等思想。梁启超认为如果没有了政府等压力与控制，中国的国民都没有能力组建一个完备的国家。并且他从历史上论说了中国“只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只有野心家的革命，没有自卫的革命”，“只有复杂革命，没有单纯革命”等思想，认为一经革命，中国就会各路蜂起，动荡不安，乃至亡国，认为革命的危害极大，明白无误地向革命提出了挑战。从此也更加积极地从事保皇会的事业。

早在光绪二十五年初，康有为、梁启超就已经开始了筹建保皇会的活动。建立之初，梁启超曾主张将该会建为秘密组织，没有得到康有为的同意，结果有很多同志遭到清政府的通缉，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了严重的迫害，组织损失很大。对此梁启超做了很大的努力，将会员的家属尽量安置在租界内，才逐渐解决了这一困难，也有了更大的发展。此后康梁又各自奔波于东南亚和北美等地，联系渐为疏远，也产生了很多误解，梁启超也经常遭到康有为的斥责，后来两人看到这样不利于保皇会组织的发展，产生了弥合的愿望，于是就有了第一次保皇大会的召开。

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香港召开了保皇大会。参加这次保皇大会的除了康有为、梁启超以外，还有各地的保皇会代表。该次大会研究了保皇会日后行动的各项计划与规章，该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维新派在海外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康梁之间的矛盾和误解。两人携起手来共同开始了和革命派的论战。

## 二、分道扬镳迟早事内蕴玄机早已知

梁启超在革命和改良中抉择，最终选择回归改良是有原因的。当然游美观感是一方面，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其一，对于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梁启超产生了忧虑。当时由于留学生人数剧增，民族意识也相应抬头，爱国的情思使得大多数学生不能安心学习，而投入到更为广阔的社会，谋求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因而革命党的阵营不断壮大，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革命党现在在东京有很大的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真腹心大患，决不能轻视……今之我党与政府死战还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才是第一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3页。

在谈到青年学生参加革命党一事时，梁启超说：“……其后见留学生界及内地学校，因为革命思想的传播，频闹风潮，特别担忧。我认为学生求学是为将来建设国家而用的，不曾想破坏的学说，却深入了学生的头脑。而且，毫无限制的自由，势必产生无穷的流弊。我甚是担忧，现在我们的国民素质很低，一旦革命蜂起，恐怕会暴民踵兴……加以现在国家财政、国民生计如此之凋零，恐怕事机一发，会给外国人制造机会导致亡国。其二，就是师友的影响。梁启超是深受传统教育的优等生，深明中国教育的重要一条就是“尊师重教”，对自己的老师要言听计从，事之以父礼。梁启超从很早就投入到康有为门下，对于康他始终敬若天人，不敢有丝毫的

违抗。虽然逃往海外以后，师徒产生了矛盾和分歧，但是还没有达到梁启超自己所说的：“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的地步，两个人只是就某些问题的处理方式有分别而已。在同辈学友中梁启超最为敬重的是黄遵宪，而黄遵宪是最早倡导改良的先驱之一，他和梁启超的关系也很密切。在梁启超流亡海外的6、7年间，两人书信往来还频繁，充分交流思想。黄遵宪对于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和破坏主义很不以为意，他认为中国的民众缺乏国家和政治思想，不够实行共和的能力，黄遵宪曾说：“倡导破坏主义和民权就好像把一把利刃交给一个八九岁的儿童，不伤害到自己才是怪事。”并且有可能会给民贼提供口实，以致无法收拾。黄的论调无疑对梁启超有巨大的影响。

因此梁启超在游美归来后，就开始在各个领域与革命党为敌。面对保皇派的进攻，孙中山和革命派开始了反攻，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表《敬告同乡书》，旗帜鲜明地指出：“革命与保皇誓不两立。”革命派和保皇派开始了激烈的论战。

### 三、发表“开明专制论”一石激起千层浪

维新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首先发难。1906年1月至3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开明专制论》一文，说什么中国今日不仅不能实行共和立宪制，而且由于“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故“尚未能行君主立宪制”，而只能实行开明专制。他的结论是：“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他在解释“开明专制”时说：“什么是专制，就是指一国中有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统治者完全立于被统治者之外，规定国家机关的各项行动。国家如果以正规良好的形式行使其权力，就是开明专制。”接着梁启超引经据典将开明专制的历史源流、世界大势一一陈述，断言开明专制是中国改革的唯一方向。梁启超列举了六方面的原因：（一）中国民智未开，不宜行共和；（二）革命后很可能形成军人专权；（三）革命必然引起大乱，混战不已，贻害无穷；（四）孙中山所倡导的“土地国有论”不能实现；（五）主权分立的议会政治会导致国家机构的分离；（六）革命会导致流血，国无宁日。

除发表开明专制论以外，梁启超还阐发了关于“政治革命”的论点。梁启超说“所谓政治革命，就是革专制而成立宪，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都是政治革命。”“如果在这种情形下实行共和立宪，就要革命，革命后会导致专制，达不到政治革命的目的。”因此梁启超主张的政治革命仍然是君主立宪。他认为“政治革命”是达到立宪的唯一手段，那政治革命如何进行呢？梁启超认为第一就是“要求”，也就是从不同的层面进行要求，采取和平改革的方式取得立宪的成功。也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解除清政府最高层对君主立宪的误解，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第二就是要加大宣传的力度，使广大人民明了政治革命的宗旨和意义。这样就会使大多数人都能盼望立宪，支持立宪，为改革争取到最广大群众的支持。也因此，梁启超把人民“政治革命”的素质看得很重，认为这是实现政治革命和立宪的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注意到梁启超是将政治革命

的重点放在人民要求上的，声称“人民之求立宪，实是实现立宪的最高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梁启超是一个典型的国家主义者，终其一生，他爱国之志丝毫没有改变过，尽管政见发生了很多次变化，那只是为国家为民族的独立和发展采取的不同策略而已。他呼吁全国统一共同抵御外国的侵略，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渐进。这是梁启超思想中尤其占有重要地位的。由于文笔和理论的系统，梁启超成为此次论战的维新派主帅，康有为则未起太大的作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也加大了组织反击的力度，同年创办的《民报》成为革命派论战的阵地。同时革命保皇两派在香港、檀香山、旧金山、广州等地的20多家报刊机构也参与了论战，论战中与梁启超对阵的革命派将领是孙中山和章太炎。

两派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就两大问题展开了论战：革命还是改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

梁启超综合开明专制和政治革命的论点提出了“不能革命”、“不忍革命”、“不必革命”和“不可革命”等主张，认为革命定会导致专制、暴乱迭兴、外国干涉、生灵涂炭，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革命派则认为：“革命是救济社会 and 人民大众的灵丹妙药，如果不革命，中国将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而且他们认为可以控制革命的秩序，及时收束，避免暴乱迭兴的局面。革命派还看到：“然不革命杀人流血之祸可免乎？”

两派在实行改良还是革命等问题上争论不休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民族问题”。革命派在其政治纲领中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民族革命为旗帜，利用民族主义相号召，认为中国的正统统治应该是汉人的，清朝入关，正统的统治就灭亡了。甚至有人主张将满人赶回长白山去。梁启超则认为，满族入关已经200多年了，在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上早已经被汉人同化，早已经不再是异族，并且现在是“满汉一家”、“满汉同体”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民族矛盾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相反应该满汉携手同心，抵御外侮，共同对付西方列强的侵略，指责革命派的民族革命是“排满主义”，是“煽动民族仇恨”，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应该说梁启超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

第二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要不要兴民权，是建立共和制还是建立君主立宪制。梁启超的论点在《开明专制论》中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坚决支持君主立宪制。革命派则认为，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对封建统治不会有丝毫的触动，不仅不能提高国民的素质，相反会给封建专制提供喘息之机，等他们再次强大的时候，专制还会加强。只有“推翻专制，使广大老百姓都取得平等的地位。”才会提高国民的素质，为顺利实行共和立宪，还政于民做准备。他们批评开明专制才是“亡国灭种的主义，谁提倡这个主义，谁就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革命派还对梁启超的政治革命提出了质疑，认为所谓“要求”就是向反动政府“乞求”立宪，这对于清政府来说无异于对牛弹琴。

两派还在土地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梁启超认为孙中山的“土地国有”是社会主义的政策，目前中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发达，更不用说社会主义了。在目前情况下实行土地国有就好

像是掠夺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打击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革命派则回击梁启超的质疑说:“中国社会的百端弊病,最主要就表现在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也正因为此才造成了“民众之穷没有超过现在的中国”这一情况。双方都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一方面加速了民主宪政思想的传播,有利于开启民智。但是另一方面,代表中国发展方向的两股力量的分歧产生了太多的内耗,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利于中国近代化的良性发展。

## 四、偃旗息鼓休战交涉

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争从20世纪初年开始,此次论争持续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论战问题之广都是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史上空前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随着梁启超和立宪派将运动的重心转移到国内的立宪运动之中,维新派由于精力所限不得不停办《新民丛报》,此后两派的论战也就逐渐停止了。

由于革命派在论战中持论激进,赢得了广大热血青年的支持与拥护。许多人开始支持维新派的都转而支持革命派,“原来与《新民丛报》关系密切的很多人,都转而倒戈投到了革命派的旗下。”《民报》第5号。

维新派在海外的影响越来越小,这是梁启超始料不及的,他自己也不得不说:“保皇会的名字太狭隘而且缺乏号召力。”并且成为“革命党指责批评的口实,很难扩展生存的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早在1906年11月梁启超就通过同党朋友徐佛苏向革命党人传递了停止论战的意向,声称:“以前和《民报》辩论的很多事情也是出于无奈。如果可以调和的话,我也不愿意如此。……能否和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徐佛苏名应奎,字以行,湖南长沙人。他曾经和黄兴等人一起在国内策划起义,是革命党的一员。流亡海外后,在日本徐结识了梁启超,并深为佩服梁启超,因而转而投到梁的旗下。梁启超早在国内时就很欣赏徐佛苏的才识,在给徐的一封信中梁启超说:“您的大文我诵读一遍,真是心悦诚服。”

梁启超之所以请徐出面,是因为徐曾经在革命党内部有一些关系,希望能借助徐佛苏的影响迅速停止双方的论争。于是徐佛苏以“佛公”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将梁启超的停战意图大加发挥,提议双方停战。并且徐还和革命党的重要人物宋教仁接触,传达了梁启超的意思。宋教仁遂将此事告诉了孙中山等人,而孙中山等人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要彻底根除保皇派的影响,就不能停止论战,要坚持到底:“一驳不胜则再驳,再驳不胜则三驳,至于十驳,至于千驳。”《民报》第10号。

因此革命派此后仍不断在报纸上发文攻击。不得已,梁启超单方面关闭了《新民丛报》停止论战。

就在这年冬天,梁启超隐居到横滨,回想自己逃亡海外这么多年,仍然一无所成,又刚刚

经历惨痛的失败，怎不叫人黯然神伤，感慨无限啊！梁启超为了抒发自己凄楚悲凉的心境提笔赋诗一首：“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独无兄弟将谁慰，长负君亲只自怜。天远一身成老大，酒醒满目是山川。伤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

就在梁启超还沉浸在失败的阴影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国内的立宪运动悄然兴起，这又给梁启超燃起了希望的火光。

## 第七章立宪舵手推波助澜

1905年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幕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立宪运动。为了抵御国内外日益严重的革命形势，清政府开始考虑仿行立宪，以求将革命消弭于无形。这时，西方列强为了进一步控制清政府，也要求清政府做相应的改革。一些地方的封疆大吏例如两湖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等也先后上奏请求实行立宪。1905年7月清政府正式派出以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与此相伴，清政府设立了“考察政治馆”。1906年8月五大臣考察归来，他们此行似乎领略了立宪等一些要领与好处。载泽在给慈禧的奏折中说了立宪的三大好处：一是立宪君主神圣不可侵犯，首相随时都可以换，而君主万世一系；二是一旦改行宪政，以前鄙视我们的西方国家，也会转而尊敬我们，改变侵略的政策，变为平等的和平邦交；三是实行宪政是现在的世界潮流，符合公平文明的世界形势。如果我们实行的话，国内外的反对舆论自然就会平息，即使有人想造谣言倡乱，也不会有人附从，不用缉捕搜拿，自会解决。这样就达到了“内乱可弭”的目的。

于是清政府终于在1906年颁布了“预备仿行立宪”的谕旨。谕旨宣布，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的基础”。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就这样开始了。尽管这只是一种预备政策，也不论清政府究竟是不是真立宪，有一条是值得肯定，那就是清政府已经承认了专制制度是不完美的，是必须要改动的，已经将立宪政策确立为国策。这对于实行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中国来说，应该也是难能可贵的。此项政策一经宣示，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而且“庶政公诸舆论”也为立宪派参与政治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他们已经通过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官制、参加咨议局和资政院等活动，广泛地参与进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梁启超真诚地欢呼此法令为：“伟哉此举。”梁启超也从论战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积极参加立宪运动，成为此次运动的中坚和灵魂。

## 一、联络达官显贵谋求解除党禁

与革命派不同，保皇派这次对于清政府的这次立宪运动表示极大的欢迎，由于清政府颁诏立宪，梁启超决定暂时放弃自己极力宣传的开明专制，转而积极要求清政府立即实行立宪，实现君主立宪制度。在给将智由的信中梁启超表达了这一思想的转变：“今天看到号外，知道已经颁发了立宪名诏，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以告一段落了。”这与梁启超历年来主张的和平改革是分不开的，梁启超始终对革命持反对态度，他曾经说过：“我始终相信破坏后再建设就很难了，对于革命的前途我甚为担心。”为了推行君主立宪制，梁启超极力宣扬君主立宪的各种好处。认为只有“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此外梁启超还试图通过联络达官显贵，一方面参与立宪，推动立宪的发展，一方面求得解除党禁。

他曾与清政府派遣出国“考察宪政”的大臣端方等秘密联络，暗中代为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达 20 余万言，希望通过端方这样的地方大员以求得清政府对于维新党人的解禁。这年 8 月 13 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同意于京师设立资政院。一个月后，清政府又发布上谕，同意各省设立咨议局。对于清政府的这种“立宪”活动，梁启超不但没有看出它的欺骗性，反而感到甚为高兴。其实，所谓“资政院”与“咨议局”，只不过是咨询性质的，是预备立宪的一种装饰品。它与立宪国家的议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几个月以后，颁布了官制改革方案，新的中央官制与清政府的旧官制相比，除了几个部的名称有变化外，其余部门的职能和名称依旧，没有改变，这种有名无实的官制改革让立宪派大为失望，徐佛苏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无限感慨地说：“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到现在仍然是老样子，换汤不换药。对现在的政府不要再报以太大的期望了，您的一腔热血空撒云天，真是令人伤心已极。”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1906 年 10 月。

然而，梁启超并没有因此而失望，他在与同志们论述此次立宪运动的时候说：“此次改革的力度和深度，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与希望，这是不用说的了……但是我们想以微薄的劳动就获得丰厚的收获……故而苛求这次改革能有很大的效果与成绩，实在是没有必要，如果因为这次改革效果不大，就灰心失望也完全没有必要。”相反梁启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立宪党人活动不力造成的，因此梁启超决定将活动的重点转移到国内。同年，清政府派遣资政院总裁贝子溥伦访问日本，梁启超趁此机会向溥伦呈递了《论资政院组织权限说帖》，该篇论述详备，鞭辟入里，堪为现代资本主义议院的蓝本，但是文章交给溥伦以后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除了联络这些达官显贵以外，梁启超还与国内的各种立宪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以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人就联合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立宪派组建了“预备立宪公会”，这时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广东的丘逢甲等也相继成立立宪公会。

这些人有的是官商，有的是绅界名流，都与清政府上层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还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可以说会一呼百应，连清政府也要顾忌他们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梁启超同他们进行广泛的交流，这样一来，促成了国内外两股立宪力量的合流，也有助于从国内外两方面鼓吹推动立宪运动的发展。

面对国内迅速变动的局势，梁启超认为要想解除党禁，还要从自身上下功夫，因此他开始考虑改组保皇会，组建新的政党。为了更名问题，他与保皇会的重要成员熊希龄、杨度、蒋观云等进行了周密的研究与策划，费时竟达三天三夜之久，认为旧的保皇会组织已经不能够适应现在局势的发展，应该立即变更改组。按照康有为的意图，认为应该改名为“国民宪政会”，而梁启超认为“帝国宪政会”更适合现在的发展，也有助于披上合法的外衣。对于未来的干事长，梁启超向康有为推荐了杨度，他认为：“他的国学功底很深，对于佛理有很深的造诣，也颇为通晓近代的政治法律。以前做留学生会馆的总干事的时候，留学生中有学识的人都很敬重他”，“以我看 he 可以和谭嗣同的才干相提并论。”但是由于双方的政见所致，合作在以后并没有成功。

保皇会的更名标志着维新派以海外为基地进行宣传的活动告一段落。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国内，帝国宪政会明确提出宗旨就是“尊崇皇室，扩张民权，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的政府，奖励民业，巩固国防”。尊崇皇室就是希望清政府能够解除党禁，有利于他们合法地活动。为了求得合法的地位，梁启超加紧了同清政府最高层的联络，醇亲王载沣、度支大臣载泽等人都同梁启超有着联系。梁启超还想亲自到上海和张謇等人会晤，谋求国内外两股力量的彻底合流与合作。他的这一努力取得了效果，立宪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也为日后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 二、组建政党立宪中坚

虽然在梁启超的努力下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但是由于立宪派内部的争端，最终该会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就告流产。其原因在于尽管梁启超希望和国内立宪派携手共同推动立宪，但是双方毕竟还存在一定的矛盾。早在 1906 年 12 月，张謇等人就已经利用预备立宪公会将国内的立宪力量集中到自己的旗下。1907 年梁启超又和杨度发生了矛盾，双方因为领导权问题最终决裂。梁启超后来谈到此事时说：“某君（指杨度）想通过他所支配的一部分人，左右整个组织，而我们将成为旁观者，甚至要支配我们。我并不是不能礼贤下士，如果真的有一个可以救国的党魁，我自甘投到他的旗下，做他的马前卒，为其驱使。但某君果真是这样的人吗？决不能因为他而阻碍我党扩张势力。”《致蒋观运书》1907 年，《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391 页。

双方在无法弥合的情况下，最终分道扬镳。

1907 年 4 月，杨度单独组建“宪政研究会”。梁启超也加紧了筹备新党的步伐。6 月初，梁

启超等人开始组建政闻社，梁启超奔走于上海、东京、神户之间，在他的努力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数百人加入了政闻社。9月11日政闻社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日本政界的重要人物犬养毅、矢野文雄、大隈重信等人也亲临会场。会上就各项规章制度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并推举了国内的立宪名人马良，即马相伯担任总务员，梁启超只是主持政闻社喉舌《政论》的工作，但主编却由蒋观云担任。

参加大会的有中国留学生约1,500人(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约2,000人)。在这1500中国留学生中，除政闻社社员200余人坐在前面外，还有不请自来的以张继、陶成章等为首的革命派阵营的400余人参加，他们是准备来轰闹一场的。此外，还有日本友人犬养毅等10多人参加。在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说达二个多小时，当他讲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时，张继便在台下捣乱，以日语厉声斥曰：“马鹿”（没有的事）。接着，张继站起来，高呼“打！”于是革命派的人员击掌欢呼，一齐踊向前去。当时，约有20多人冲上讲台，其中有一人将草鞋掷向梁启超，打中了梁启超的面颊。梁则从容退入后台。会场已被打散。在场维持秩序的日本警察出面加以劝阻，要求反对派的人士离开会场。张继本想批驳立宪派的言论，但在急躁之下，以至动武，使会场大乱，结果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等到部分人退场，会场稍为安静下来，张继便对日本人犬养毅说：“我是不应该参与政闻社的事，但我不能不诘问犬养毅，你以前曾在早稻田大学对中国学生说过，‘中国当速行革命’，这是我亲自听你说的，如今你为什么又附会立宪？猥鄙至此？！”犬养毅低头表示谢谢他的指出，并登台说明他参加这个大会，只不过是对立宪派友人的一种应酬而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在中国问题上的真实态度，他们不过是想利用两派的矛盾，从中渔利而已。

1907年10月7日，作为政闻社的喉舌《政论》出版，梁启超在《政论》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政闻社宣言书》一文，在这篇长达数千言的宣言书中，梁启超开宗名义地指出了政闻社的宗旨和政纲共四条：（一）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19页。

梁启超的初衷仍然是“尊崇皇室”，支持保存现在的清政府，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取得清政府的信任，获得合法的通行证，但是没过多久清政府就封禁了政闻社，实在是出乎梁启超的意料。

政闻社成立后，立即就把活动的重点放到了国内，广泛联络华侨、士绅和学生，再次掀起了立宪运动的高潮。11月马良来到日本，受到了政闻社广大同志的热烈欢迎。梁启超之所以虚社长一位以待之，是因为康梁都是清政府通缉的对象，不利于将来回国领导立宪运动，因此梁启超邀请国内外都很有威望的马良担任总务员，负责社务。马良，字相伯，早年留学法国，博学多才，对于西方的法律、政治颇有心得，是当时国内立宪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马良到达日本后，梁启超立即安排他到各地进行演讲，并且要求所有政闻社同志积极配合，大造声势。梁启

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一方面扩张政闻社在国内外的影响，壮大力量；一方面显示他与国内立宪党人的密切关系，为政闻社总部迁回上海做舆论的准备。同年，清政府的政治编查馆也改为宪政编查馆，加紧研究宪政的各项措施。1908年正月，政闻社总部迁往上海，进一步加强了在国内的活动。采取公开与秘密同时进行的办法开展活动。政闻社的主要活动是吸收社员，壮大组织，以及派遣社员“劝告”清政府从速颁布宪法。经过多方努力政闻社与国内立宪派的联系以及和王公大臣的联络活动都有了很大的进展，南北各省的政闻社组织也得以长足地发展，成为国内立宪运动的中坚，梁启超也自然成为运动的当然领导者。

在国内的另一重大举动就是请开国会。政闻社联合国内各立宪团体共同组成了“国会期成会”，派遣大批社员分头前往国内各地活动，“劝导”各省咨议局联合起来呈请清政府限期召开国会。还有些社员深入基层，发动各界人士签名，向清政府请愿，要求迅速颁布宪法和召开国会。由于政闻社的积极活动，它已经成为清政府的心腹大患。

1908年5月，张謇等人联合国内各种立宪团体，相约齐集北京，发起国会请愿运动。与此相呼应，是年6月初，政闻社以全体社员的名义致电清政府的宪政编查馆，请求3年内召开国会。这时，任法部主事的政闻社社员陈景仁也奏请清政府在3年内召开国会，并罢撤二次电请暂缓立宪的大臣于式枚(该大臣曾往德国考察宪政)。

清政府对于政闻社的这种又是劝告，又是请愿，又是要求罢撤大臣等行动，很为恼火，清政府认为“于式枚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岂是陈景仁这样的主事小官得以任意参劾的。”“况且立宪预备期限，朝廷已经有了计划，权衡利弊，岂是你们这些人所能臆断的。”《申报》，光绪三十四年6月28日。

至6月27日，便革除了陈景仁的职务。

这时杨度由于依附于袁世凯，所以在南京和武昌等地散布谣言，说政闻社的宗旨仍然是为了“保皇”，有意排挤张之洞和袁世凯这样的地方大员，刺激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和有影响的地方督抚。因此(8月13日)又以“政闻社”“阴谋煽乱，扰害治安”，“内多悖逆要犯”等罪名，令各省予以查禁，严拿社员。这里所指的“悖逆要犯”，当然是指梁启超等人。清政府之所以要查禁政闻社，只不过是籍制国民的喉舌。在清廷的满洲守旧官吏看来，立宪政体只有利于汉人，而满人既得之利益将因立宪而尽失，因此，他们的内心是不愿立宪的。他们说是同意预备立宪，只不过是在民众革命情绪高涨的压力下所玩弄的一种缓和手法，一种骗局而已。

封禁政闻社毕竟还是引起了国内外舆论大谴责，这时又恰值国会请愿运动兴起，为了平息舆论，清政府也不得不做一定的退让，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以九年为期，召开国会。但是该法案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皇权，因而法案一出，就招致了一片反对之声，不但没有缓和立宪运动，反而使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正当立宪运动风潮激烈之时，慈禧和光绪先后在这一年的11月死去，溥仪继位，改元宣统，

醇亲王载沣成为摄政王。载沣监国的第一件事就是罢斥袁世凯。梁启超也参与了这次“倒袁”活动，梁启超给载沣建议是：“以明诏宣示他的罪状，使天下各国都知道他的奸诈，就可以避免死灰复燃的后患。”梁启超：《致肃王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册。

但是载沣没有采纳，结果导致后来的覆亡。梁启超还希望新政府能够“广拔贤才，申明政纲，以息浮言，而系天下之望。”可是载沣却采取了更为不得人心的手法，他不但没有解除党禁，反而利用皇族内阁，实行皇族统治。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对他触动不大，因此立宪运动也走入了死胡同，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 三、主笔《国风报》宪政的灵魂

早在与革命派论战之时，梁启超就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宪政思想，开启了清末资产阶级宪政运动的序幕，也为该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政治制度史上，梁启超也是彪炳千秋的理论巨子。

《新民丛报》停刊以后，为了继续宣传自己的思想，梁启超又曾经主笔过《政论》杂志，但是政闻社被封禁以后，《政论》也被迫停刊。有鉴于此，梁启超开始筹办一份新的报纸，以作为指导立宪运动的舆论阵地。宣统元年（1909年）10月，《国风报》正式创刊于上海，发行工作交由何国祯办理，梁启超为总撰稿人。从此以后《国风报》成为继《新民丛报》以后，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刊物。梁启超亲自为该刊撰写《叙例》，阐述了《国风报》的体例和宗旨。梁启超指出该报的宗旨就是运用舆论的力量，来推进立宪运动，自称“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职志。并且提出了创办《国风报》的“五本八德”思想，对如何开启中国的民智制定了详细的纲领和步骤。梁启超说：“国内如果多数报馆能够谨遵这五本和八德，就会造成全国整体健全的舆论。使全国上下都能得到指导和帮助，这样以来立宪政府就有希望了。”

梁启超在《国风报》上连续发表了很多文章，极力宣传速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对于推动立宪运动向纵深两个方向的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宣统二年5月和9月，各省咨议局国会请愿代表上京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但仍未获准。9月，资政院开会。至10月初3日，清政府应资政院、咨议局和各省督抚之请，略为作了一些让步，谕令宣统五年（即至1913年）召开国会。请愿代表不满意，仍要求“立开国会”。清政府乃勒令各地代表离开北京，返回原地。1911年，对国会请愿运动日益失望的各省咨议局代表在北京成立了“宪友会”，徐佛苏被选为总干事之一，继续呼吁清政府速开国会，开放党禁。立宪党人对于这一组织给予了厚望。所以从该组织的酝酿、成立到活动，徐佛苏等人无不向梁启超请示策略，而梁启超也“始终与闻其事”，不仅起草了该会的宣言，还帮助组织审定各种文稿，热忱支持着该组织的发展。

作为这场运动的灵魂，不仅精心指导了运动发展的各个环节，而且着意阐发了一系列的宪政理论。1910年，他一共发表了66篇文章，其中直接谈宪政的就有20多篇；1911年又连续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阐发宪政的理论，例如《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书》《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责任内阁释义》《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等都是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的文章。他参照欧美的政治制度，融合中国的实际，为中国设计了一副完美的宪政蓝图。在梁启超的笔下，国会的职权受到高度重视，并且主张采用英国的两院式议会。像这样的思想在他的文章中不一而足。应该说梁启超关于中国未来宪政思想的设计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政治宝典，标志着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成熟。

尽管梁启超为宪政运动绞尽脑汁，竭尽全力，费尽了心血，但是清政府却不买账。立宪运动也没有像梁启超想像的那样顺利发展。清政府对于立宪请愿运动采取越来越严重的禁止和镇压措施。一些立宪派分子也转向了革命。梁启超悲愤地说：“如果政府还这样一意孤行下去的话，那么全国的兵变与民变，必然会在这一两年间发生。这决不是革命党煽动所能达到的，是政府迫使人民必须这样。”他断言：“中国要想有国会，就必须在宣统四五年以前举办，如若不然，则中国永远都不会有国会了。”《国风报》1910年第17期。

梁启超面对皇族内阁的倒行逆施，深切感到不消灭清政府中的顽固派，自己的政治理想就无法实现。于是他和康有为商定，决定利用满洲亲贵中的互相倾轧，发动宫廷政变，除掉载沣等人。于是康有为来到日本与梁启超共同策划宫廷政变的实行。正当他们大体布置就绪之时，武昌城头响起了辛亥革命的枪声。

## 四、关注财政问题力求有所创拓

为了配合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的几年里还撰写了大量的关于财政学和清末财政问题的文章和论著，数量之大，内容之精是其他人无法望其项背的。早在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就开始大量地接触到欧美传播到日本的许多有关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知识，并且由于梁启超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好学，思想发生了质变，他之所以在历次论战中都理论系统，无懈可击，为人所折服，和这有很大的关系。

就在宣统二年前后，他先后写了几十篇文章，论述财政问题，其中的很多真知灼见仍然可资借鉴。这一时期，梁启超针对清朝经济衰败，财政危机和债台高筑的情况，提出了有关币制改革和财政设计的许多意见，诸如《币制条议》、《中国改革财政私案》、《外债评议》等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篇章，也倾注了梁启超大量的心血，奠定了他资产阶级财政学的开创人地位。

他认为财政问题是国家大政方针所依赖的基础，因此必须由国会掌握财政权，这样才能更为合理地进行财政预算和核算，保证国家财政的良性运行。他提出的财政改革方案包括四方面

的内容：一是整顿赋税。他认为中国旧式的量入为出的财政管理体制过于混乱，因而导致了在赋税征收上没有合理的规划，也经常导致地方官吏从中牟取私利，即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也不能起到增加税收的作用。他还为清政府进行田税、房税、盐税的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二是整顿币制，建立新的货币制度。他认为清政府在进行货物流通过程中使用的货币过于凌乱和复杂，什么银元、银两、铜元、铜钱都在市场上流通，奸商趁机操纵，害工害农。要建立新政治，首先要执行新的货币制度，统一币制。三是节省财政费用。他认为清政府在进行财政使用过程中造成了巨大浪费，财政腐败到了极点，也给贪官污吏造成了可乘之机。四是举办和利用公债。公债思想是梁启超财政思想中非常突出的方面。他看到了公债是国家财政伸缩的重要举措这一层，实属难能可贵。对于近代社会来说，公债几乎成了国家财政运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财政政策。举办公债的另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少借外债，减少对外国的依赖。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当时行政者重视的方针政策，可惜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明了其巨大作用，也就难免流于覆亡的地步了。

## 第八章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 一、武装立宪保皇室来去匆匆情何堪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了起义。这就完全打乱了梁启超进行宫廷政变的计划。这时湖南、陕西、江西、江苏等省相继独立，响应武昌起义，清政府匆忙停止秋操，调集各省新军开赴湖北进行镇压，并且敦促袁世凯出山。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梁启超坐立不安，忧心如焚，他认为必须立即行动才能避免更大的动荡。经过审慎的考虑，他决定放弃原来的宫廷政变计划，制定了“利用北洋军队，挟制政府立即召开国会，以便抚绥革命党”的计划。就在这时山西也独立了，同时驻扎在直隶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协统蓝天蔚联名发表通电，要求清政府改组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滦州兵谏”。滦州兵谏就是梁启超武装立宪的结果。据当时的记载，张绍曾等是“遵照任公的意思行事的。”梁启超也决定赶紧回国整顿残局。

就在梁启超决定回国定乱之前，梁启超预先派潘若海先行回国联络驻扎保定的北洋六镇统制吴禄贞，晓以大义，希望他支持梁启超的计划。吴禄贞向来与立宪派的关系很密切，因此一口答应，决定约合张绍曾和山西的新军组成“燕晋联军”率军北上，进逼北京，实现武装立宪的

计划。面对瞬息万变的国内局势，梁启超于 11 月 6 日乘船回国。

11 月 9 日，梁启超到达大连，转道奉天的日本租界居住。奉梁启超命先行回国进行活动的立宪党人，都到大连迎接。从熊希龄的口中梁启超才得知，就在他乘船的两日间，局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1 月 6 日张绍曾被解除了兵权，7 日吴禄贞也在石家庄被暗杀。面对不利的局势，梁启超没有放弃，他决定先暂留奉天，以观局势的变化，随时可以去北京。这时袁世凯还没有入都，新的内阁还没有建立，梁启超认为北洋新军中还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因此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入都后若豕骨（指袁世凯）还有人心，当与公戮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去留全看我的意思。”但是，梁启超和蓝天蔚策划的奉天起事又告失败。梁启超倚重的两支军队先后瓦解，武装立宪已经显露了失败的端倪。

11 月 13 日，袁世凯带兵进入北京，完全控制了北京的局势。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梁启超，处境也越来越危险，熊希龄不得已多次电催他赶快离开奉天。无奈，梁启超只得匆匆离开奉天，经大连返回日本。此次回国仅仅在国内呆了 4 天，情何以堪哪？

## 二、倡导虚君共和不改立宪初衷

梁启超的短暂回国，并没有消却他心头燃烧的热情。回到日本后，梁启超利用很短的时间就写出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文章的主旨就是梁启超想利用回国的立宪党人，谋求“虚君共和”，希望能够保留皇统，实行君主立宪。

该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单一国体与联邦国体之问题”，下篇是“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之问题”。在上篇论述中梁启超鲜明地反对联邦制，他认为“我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建立一个强固统一的中央政府”，因此中国实行单一国体是必然的事情。下篇中梁启超论述了多种共和的方式，他再次提出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才是最适合中国的制度。就在这时，袁世凯组成新的内阁，在他的内阁名单中，梁启超被任为司法副大臣，并致电梁启超：“公抱天下之大才，维系着全国的希望，全国听说任命您以后，欢欣鼓舞。希望您体念神州的兴衰，解人民倒悬之灾，即日赴京接任，以孚众望。”并且写信给梁启超说：“您奔走海外十几年了，含忠吐谏，心忧社稷，爱国之情何其殷切，用心何其良苦，每次读到您的文章，都会热泪盈眶……值此国事颠危，民生涂炭的时刻，您必不忍独善其身，置身事外，不思同舟之急难，坐视大厦之将倾……急盼驾临，共商国家大计。”《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563 - 564 页。

而梁启超却以“时机未到，以在野为好”，予以回绝。因为他此时的重心在于“虚君共和”，所以还无暇考虑和袁世凯的合作问题。

为了贯彻他的虚君共和的主张，梁启超分遣党人奔赴国内，进行多方面的联络，一方面他派人去运动地方的督抚和一些已经独立的都督。同时他又派遣蓝公武等人到北京和袁世凯联络。

11月蓝公武等人到达了北京，向袁世凯传达了梁启超的意图，然而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并没有表态，而是虚与委蛇，略颌首而已。因为当时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人的谈判刚刚开始，他另有打算，所以并不支持梁启超的计划。

梁启超还派遣党人到上海双方的谈判现场，力图影响南北双方。派去联络黄兴的人都没有能见到面，好不容易找到了章太炎，他又托词不见。北方谈判代表唐绍仪和梁士诒等人也都是表面应付而已，都没有下文。1912年1月底2月初南北和谈达成协议，袁世凯利用手中强大的武力做后盾，逼迫清帝退位，当上了临时大总统，梁启超的“虚君共和”也告彻底失败。

### 三、海归宪政功臣与袁握手言和

“虚君共和”计划破产以后，梁启超的政治前途一片渺茫。而此时，袁世凯的势力却如日中天，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最为耀眼的政治明星。环顾宇内，梁启超看到，只有联合袁世凯才能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救国大计。方针既定，梁启超不再迟疑，他先致电袁世凯祝贺他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即回信给袁世凯，加以颂扬：“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死回生，救国家于危难，功在社稷，名在天壤，众望所归……”。在信中梁启超还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财政上，梁启超建议袁世凯举借外债，改善国内的经济财政状况；政治上，梁启超建议袁世凯利用各派的矛盾，居中调度，以实现国家政权的顺利过渡。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的政坛分为三股势力，旧官僚、立宪派和革命党，他建议袁世凯利用旧官僚为行政中坚，利用立宪党人和一部分革命党人组成政党。提醒袁世凯重视舆论的巨大作用：“既然以共和为政体，您就应该重视舆论的作用。善于执政的人，一定是能够暗中操纵舆论，而表面上又是舆论的奴仆，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成就。”此后两人通信频繁，最后梁启超决定返回国内，开展自己的计划，他在给袁世凯的信中说：“现在感情用事的时代已经过去，建设国家的大业刚刚开始，对您的攻击自然也不会很多。自认为还能为您效劳，为国家出力。计划封港之前，一整扫鞭，回国尽效绵薄……”。

1912年11月中旬，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涯，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船靠天津的大沽港，站在寒风中，面对祖国河山，梁启超感慨万端，14年前，也是在这里，他急匆匆地离开了自己为之奋斗的故土。时光荏苒，岁月如斯，真是世事难料啊！但是梁启超此时最为高兴的是，他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这颗殷殷的爱国之情，使得他早已忘记了以前所有的坎坷和艰辛，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回国后，他先住在天津的租界之中，受到了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三天来没有一刻断过宾客，光在门房登记的就已经有200多人了。各省欢迎的电报，也是络绎不绝，这样的情形还真出乎我的意料。”《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51-653页。

除了国内的立宪党人以外，前内阁总理唐绍仪、直隶总督张锡奎、日本驻天津领事，以及

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都派代表到天津拜谒，就连张謇和黄兴也在天津等候了3天，由于事务问题和梁启超失之交臂。

11月28日，梁启超离开天津前往北京。梁启超还没有到北京，袁世凯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下榻的宾馆，由于梁启超怕给别人批评的口实，没有住在袁世凯为他准备的宾馆，而另外找了一家行馆暂住。在北京他同样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梁启超记述这时的情景时说：“都中人士对我甚是欢迎，几乎达到了举国若狂的地步。每日所赴的集会，平均3处，来访之客，每天也在百人左右。……. 国务员自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旧官吏如徐世昌、陆征祥、孙宝琦等皆已至。”“在北京的12天中，我一身实在是北京的中心，所有的人都环绕在我的身边，如众星捧月。”

梁启超接受各商会、团体、党派的欢迎会达19次之多。除了参加各阶层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以外，梁启超在北京和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官僚广泛接触，握手言欢。袁世凯在总统府为梁启超开了欢迎会，内阁国务员全体出席作陪，10余省都督也致电祝贺，可以说礼仪完备之极，眷隆之盛，无出其右者；应酬之余他还为立宪党人鼓劲打气，制定各项详细的章程，对日后的行动做出指导。梁启超之所以在北京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一是因为北京是立宪派多年经营的地方，尤其是南北议和以后，南方成为革命党势力范围，立宪党人就重点发展北方的势力，因而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再就是袁世凯在上台过程中，立宪党人给了巨大的支持，为了表示感谢和进一步拉拢立宪党人，袁世凯也不得不做出姿态，拉近双方的关系，为将来的合作创造条件。

梁启超回到天津不久，就发生了外蒙独立的事情，一时间政府要人，各界领袖又都聚集到梁启超的家中，咨询商讨对策，赵尔巽、孙宝琦、周自齐等前清要人纷纷造访。北洋军的重要将领冯国璋甚至一天就拜访了两次。梁启超坚决反对外蒙独立，在梁启超的支持下，民国初年成立的主要政党—共和、民主两党，联名上书弹劾政府十大罪状，掀起了民初第一次政治风潮。

但总体上，梁启超还是支持袁世凯的新政府的。1912年除夕，梁启超写了《宪法之三大精神》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国权”的概念，开始有抑制民权的倾向。在梁启超看来“国权”重于“民权”，“民权”必须服从“国权”，为了维护国权，就要一定程度地抑制乃至牺牲“民权”。梁启超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思想，和他在这个时期所崇尚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分不开的。为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梁启超明显地提高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全体利益的地位，这样就会相应削弱民权和个体的利益。袁世凯就加以利用，开始了加强其专制的步伐。

## 四、进步党党魁谴责宋案元凶

辛亥革命胜利后，由于议会政治政体的确立，一时间成立了很多政党，真可以说是政团林立，政纲林林总总，各式各样，并且党派势力盘根错节，令人眼花缭乱。到1913年，建立的党

派竟然有 600 多个，政团 300 多个。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民社、中华民国联合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公会、国民党、自由党、社会党等。1912 年，临时参议院由南京迁往北京，为了争夺在议会中的席位，各党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并且不断地进行错综复杂的分化、组合。基本上形成了 4 个比较有影响、有实力的大党，即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共和党在 1912 年 5 月由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组成，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程德全为理事。在临时参议院中，共和党以“国权主义相号召”同以“民权主义”相号召的同盟会抗衡。

同年宋教仁改组了组织涣散的同盟会，修改了党章，联合了大批的中小党派，包括什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组成国民党，还吸收了大批旧官僚、政客和立宪党人，在临时参议院中一跃成为第一大党。这一年冬天，在宋教仁的奔波与努力下，又取得了一大批官僚的支持，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为了平衡各党派的力量，组建与国民党相抗衡的大党，梁启超加入了共和党，开始积极活动。

早在归国前梁启超就设想联合几个党派成立新政党。这次梁启超归国后，声望日隆，在政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梁启超也因此产生了调和党派组建第一大党的计划。并且为了抗衡国民党，袁世凯也同意如果梁启超组建新的政党，平衡议会势力，他就会支付 20 万元的活动经费。1913 年在梁启超等人的策划组织下，共和、民主、统一三党组建进步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汤化龙、蒲殿俊等都为理事，还有名誉理事冯国璋、熊希龄、阎锡山等各界名流。从以上名单，就可以看出进步党阵容的强大。实际控制进步党的是梁启超和张謇等人。整个进步党的成员都是民初政党中保守和稳健派势力，并且进步党的宗旨就是取“国权主义”，这是梁启超的重要思想之一，同时梁启超还写了《共和党之态度与地位》一文，对共和党此后应持的态度、政治策略和所需要注意的各项事情，都做了详尽的论述，受到该党成员的普遍欢迎，梁启超的领导地位，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在国会中也就产生了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对立。

1913 年初，国会选举结果揭晓，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应该由宋教仁来组阁，成立新的政府。宋教仁也雄心勃勃想要组成新的政府，施展自己的政纲。但是



1913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国会开会时合影

袁世凯是不能忍受别人分权的。1913年3月20日袁氏指使赵秉钧，秘密派人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沪宁车站。事发之后，袁世凯还故作姿态，命令江苏地方官“通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

开始的时候，有人以为，这一暗杀行动，可能是和国民党竞争的、以梁启超为首的共和党人干的，梁氏便被怀疑是幕后的指使者。1913年3月25日，梁启超在给女儿思顺的信中谈到自己受到冤枉的情况时说：“我多日来为政界恶现象所刺激，心里非常不舒服，然每得汝书，及作书与汝，总算一乐事也。宋氏之死，敌党总疑是政敌之所为，声言必报复，其所指目之人第一为袁世凯，第二个就是我。这里加派了警察，保护的很周到，……不用担心我。”梁启超：《与嫫儿书》，1913年3月25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4页。

3月27日，梁启超又给了女儿思顺一信，信中也谈到宋案之事：“你们不用为我担忧。此间都督及巡警已经加派了人手，我入京时，车中一切已布置严密，入京后则派宪兵数人护从，一定没有危险。宋氏之亡，也使我加紧了防范。……”

后来，“穷究”的结果，证实谋杀的“主名”竟是大总统袁世凯和内阁总理赵秉钧。于是舆论大哗，袁氏的丑恶面目便暴露无遗，国人同声谴责袁氏的杀人罪行。

梁启超是一贯反对暗杀的，据日本高野山大学副教授竹内弘行先生报导，1909年10月26日，日本明治政府著名领导人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暗杀了。当时梁启超住在日本神户，认为这种暗杀没有甚么好处。他对暗杀者的评价是：“其勇可爱，其愚可怜。”这次对于宋教仁的被暗杀，梁启超在4月初于此案尚未水落石出的情况下，发表了《暗杀之罪

恶》一文，谴责这种暗杀恶行，同时也有洗刷别人怀疑此案与他有关之意。梁启超认为宋教仁是中国现代第一流的政治家，认为“暗杀了这样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实在是国家不可估量的损失。”梁启超：《暗杀之罪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

他斥责这种暗杀行为“如驯狐如鬼蜮，乘人不备而逞其凶，凡是大丈夫都不齿为之。故暗杀为天下最大的罪恶，且为最可羞耻的罪恶”。他分析暗杀的对象约有二种：一为恶人，二为名士。暗杀的动机有二种：一为沽名，二为雪恨。暗杀的目的也有二种：一为公愤，二为私仇。暗杀的方法也有二种：一为躬亲，二为雇佣。不论是哪一种都是有罪的。即使为了雪公愤而暗杀坏蛋也是不应该的，因为有国家、有法律，自有法庭执其罚。至于暗杀名士，那就罪行更重，因为名士是国家的人才，是很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出现一个，他担任重要职务，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暗杀了他，会给国家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这种暗杀罪，比别的罪还要重千万倍，梁启超认为宋教仁就是这样的名士。

“宋案”发生以后南方各省一片声讨之声，提出要求国会弹劾袁世凯，责令袁世凯和赵秉钧辞职，孙中山号召各省都督以武力讨袁，维护宪法和共和。然而，由于梁启超坚持国家主义至上，进步党人不同意南方革命党人的做法，他则主张用法律的方法解决。梁启超担心战端一开，就会失去统一安定的局面，影响国家的发展。可是这种做法却助长了袁世凯的嚣张气焰。他为了彻底肃清革命党的势力，为自己的独裁专制扫清道路，已经开始准备镇压南方革命党了。

袁世凯为了镇压革命党人，在财政上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取得了2500万元的支持，同时也出卖了大量的国家权益。这样袁世凯就开始动手了，他首先免掉了反应最为激烈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妄图将革命党的势力消弭于无形。在这种情况下，李烈钧首先在江西举起了义旗，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二次革命”。但是由于革命党内部意见不统一，基本上是各自为战，面对北洋军的优势兵力，大多不堪一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二次革命”就告失败，孙中山等人不得已再次流亡海外。

## 五、一流内阁人才济济

“二次革命”过程中，国民党失去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有的议员逃往南方，有的议员投入到其他党派，势力大为削弱。而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则乘机扩大势力，在两院中的席位骤增，大有控制国会之势。袁世凯这时也明了要取得正式大总统的职位，还要依靠进步党，同时还要利用进步党美化自己的统治。因此袁世凯开始筹划由进步党人组阁。但是作为进步党首领的梁启超，袁世凯还是有几分忌惮，尽管在“二次革命”中，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帮了他的忙，他还是不敢让梁启超来组阁，因为梁启超的名气太大，社会影响力有可能妨碍他将来专权。故而袁世凯选择了当时任热河都统的熊希龄来担任总理。



“第一流人才内阁” 总理熊希龄

熊希龄自认为能力不够，提出恳辞。尽管在地位和名望上，梁启超都胜熊希龄一筹，而梁启超并未嫉贤妒能，他认为，这是进步党施展政纲的大好时机，力促熊希龄赴京组阁，显示了一个政治家不计个人得失的宽广胸怀。在梁启超的热情支持下，熊希龄最终同意组阁。但是这时袁世凯已经将内阁的名单拟好了，财政、外交、陆军等要害部门都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只留下农商、司法、教育三个部门交由熊希龄安排。熊希龄无奈，只得将梁启超委以教育总长的职位。面对袁世凯的专擅行为，梁启超大为不满，拒绝入阁，导致了一场小小的入阁风潮。

熊希龄到达北京以后多次造访梁启超，劝说梁启超捐弃前嫌，参加内阁，调和梁启超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反复斡旋，多次周折，加上袁世凯做出了让步，决定由熊希龄兼任财政总长的职位。出于进步党的前途考虑，梁启超最终同意了熊希龄的要求，同意入阁，这次风潮才得以平息。在这个新内阁中，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由汪大燮担任，农商总长由张謇担任。当时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都是名震一时的社会名流，张謇是全国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因此这个内阁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因此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



出任司法总长时期的梁启超

梁启超可以说是这个内阁的灵魂人物。内阁成立后，由梁启超为新内阁撰写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成为熊内阁施政的重要纲领，在文中梁启超指出，目前熊内阁应该以救亡为大政方针，他认为革命之初的任务就是救亡，所谓救亡就是指要彻底确立资本主义的制度，防止封建势力复辟将国家制度拉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这在当时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文章对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各项大政也都有论及。政治上梁启超强调贯彻资本主义的法治精神，建设法治国家。在经济上，他提出了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提倡奖励实业，整顿财政，刺激经济的增长等措施。外交上追求平等和睦为原则。

应该说梁启超等人提出的这个政纲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表明了进步党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强烈愿望。但是就在梁启超等人，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袁世凯也在利用国会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权力。打败国民党以后，袁世凯清除了实行专制的最大障碍。他急于成为正式大总统，攫取更大的权力。9月18日，在熊希龄内阁成立没有几天，袁世凯就指使他的亲信梁士诒拼凑了一个“公民党”，收揽了大批的北洋政客和官僚，气势颇为强大，几乎形成了与国民党、进步党三足鼎立的局面。袁世凯就以公民党为喉舌，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选举

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熊内阁在这种情势下也不得不退让，改变了原来坚持的，先定宪法，后选总统的主张。10月4日，国会宣布了《大总统选举法》。

对于国民党和进步党，袁世凯是一不做，二不休。10月6日，袁世凯以数千名军警和大批的地痞流氓，组成所谓的“公民团”，将会场团团包围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然后认为国会不再有用，决定铲除帝制复辟道路上的这个拦路虎，攻击国会为暴民专制。不顾《天坛宪草》的合法性，下令修改宪法。《天坛宪草》是在国会成立后修订的宪法草章，尽管有诸多不足，还对袁世凯进行了让步，但该宪法的主要精神仍然是实行内阁责任制，建设强有力的政府，这是袁世凯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因此袁世凯决定取消国会。

11月4日袁世凯以查获国民党议员曾经与李烈钧“勾结谋乱”的证据为口实，宣布国民党为“乱党”，下令解散国民党，凡属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均被撤销，两天内被剥夺议员资格的人竟达430多人，这样国会就不能达到法定的开会人数，从而国会未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实。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令解散国会，宣布停止参众两院议员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了国会，进步党也失去了活动的根基，政令无法通过议决，熊希龄的国务总理当然也做不下去了。梁启超亲自手定的军民分制、废省改道、地方自治、司法独立等等当时极待实行的良方，也就无由成为正式的公文法律加以施行。熊希龄兼任的财政总长职务也由梁士诒取代，熊内阁已经名存实亡，便于2月12日倒台，国务院总理由孙宝琦代理。梁启超也同样辞去司法总长职务。进步党的“人才内阁”只上台5个月便不得不下台，可以说是一个短命的内阁。

袁世凯为了笼络梁启超这位“舆论界的骄子”和进步党的头面人物，便于1914年2月19日改派梁启超担任币制局总裁，梁启超为了贯彻自己改革币制、整顿财政的宿愿接受了这项任命。当时，梁启超想在任何可能的范围内施展自己的才能，拟定了一个改革币制的庞大计划，还写了许多文章，如《币制条例理由书》、《整理滥发纸币与利用公债》、《银行制度之建设》、《拟发行国币汇兑券说帖》等。后来，他在文章中也写道：“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潜心研究中国图强的策略，始终认为中国救亡图强的第一要义，就是整理货币、流通金融。这是财政的枢纽，最为切要。维系着国民的生计命脉。”但是，袁世凯的封建独裁统治，根本不会支持梁启超的货币改革方案。当时阻力太大，各种计划均成为空想，梁氏深感自己无所作为。所以，5个月以后，梁氏不断请辞，态度变得甚为消极，一直拖到1914年年底，才辞去这个币制局总裁的职务。从此梁启超随着袁世凯帝制复辟步伐的加快，开始坚定地走上了反袁的道路。

# 第九章力挽乾坤反袁护国

## 一、帝制闹剧丧家国冷眼旁观洞时事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帝制，但是封建主义的流毒不是一时能够清除净尽的，还存在帝制复辟和滋生的深厚土壤。踢开第一流人才内阁以后，袁世凯便立即着手自己的专制独裁计划，为实行帝制做准备。

国会和《临时约法》是保证民主共和制的法律基础，也是袁世凯独裁专制的最大障碍。国会既然已经取消了，那么《临时约法》自然也难逃劫难。1914年3月，在袁世凯的精心策划下，以改造《临时约法》为目的的约法会议召开了。袁世凯直截了当地向约法会议提出了自己的权力要求，即将外交权、财政权、官吏任免权、宪法制定权等统归总统行使，这几乎已经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了，其厚颜无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于约法会议的成员都是袁世凯亲自圈定，自然对袁世凯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以最快的速度，为袁世凯量身订做了一部《新约法》。它规定总统总揽统治权，只对国民全体负责，而不对任何民意机关负责，这就等于说是总统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皇帝。

紧接着袁世凯废除了国务院，成立政事堂，任命自己的亲信死党徐世昌为国务卿，各部的总长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所有国家大政都要交由政事堂核阅，然后由袁世凯最后定夺。这简直就是清朝的军机处，国务卿就是首席军机大臣。为了在帝制复辟过程中如鱼得水，袁世凯深知军权的重要，因此在这年的5月又成立了“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掌管了全国的军事大权，削弱了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权力，他逐步把段祺瑞在陆军中形成的强大势力排挤出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袁世凯和段祺瑞等人的矛盾。

袁世凯除了大肆夺权以外，还处处模仿封建专制时期的种种制度，例如将官员的等级分为九等十八品，将总统秘书处改为秘书监，颇有一点明朝司礼监秉笔太监的味道；省一级长官中，将民政长改为巡按使，明显就是明清总督、巡抚制的翻版而已。袁世凯的复辟步伐越来越快，5月26日袁世凯下令成立了参议院，代行了立法院的职权，任命黎元洪为院长。参议院中的参政都是由袁世凯指定，不是前清遗老就是袁世凯的心腹，参议院为袁世凯上的一份贺礼就是《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该修正案赋予了袁世凯终身总统的合法性，并且规定总统也可以世袭，这就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创造了最为有力的条件。

袁世凯还利用美国人古德诺为他鼓吹，古德诺发表了一篇《共和君主论》，认为中国人品

性卑污，公民素质低下，不适合共和制，应该实行君主制；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了一篇《共和宪法持久论》，也为袁世凯大造舆论。日本人之所以支持袁世凯称帝，是想从中捞取更多的好处，加大侵华力度。

与这些人相配合，袁世凯的党羽杨度等人还组建了“筹安会”，网罗了一大批社会名流，包括严复、刘师培等都参与其间，号称“筹安会六君子”，为帝制大唱赞歌。袁世凯本人也于本年9月率领百官到孔庙祭祀孔子，从礼节到服饰，无不模仿封建帝制时代，他的服装和礼节完全就是皇帝，帝制闹剧一浪高过一浪。

这时梁启超，早已辞去司法总长的职位，避居清华园，杜门谢客，埋头著述，然而他却并没有放松对时局的观察，冷眼旁观。就在这时袁世凯为了实现称帝的美梦，竟然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把中国政府和广大人民完全置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境地，祖国有旦夕累卵之危，对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梁启超再也不能忍受了。

## 二、雄文一篇烁古今魑魅魍魉胆魂惊

1915年初的一天，避居清华园的梁启超接到了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的邀请，梁启超此时对于袁世凯的复辟阴谋已经察觉，也想在这次宴会上进一步了解有关的情况，因此接受了邀请。在宴会上，袁克定与杨度诋毁共和制度，历数共和制度的缺点，隐约透露想变更国体的想法，并故意征求梁启超的意见，问梁启超是否赞同他们的观点。梁启超当场陈述了内部及外交上的危险。梁启超与袁克定、杨度的观点格格不入。他感到帝制复辟之祸将要来临，便把家居迁移到天津租界地区。1915年4月，梁启超经上海返广东探亲，并回新会家乡为父亲庆祝七十大寿。在返粤前，梁氏特别写了一封《上总统书》，劝袁世凯悬崖勒马，取消复辟帝制的念头。他在信中说：“国体问题已经骑虎难下，启超本不愿意再涉政局，招人嫌怨。然而静观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栗。天下之信仰自此堕落，而国本即自此动摇。”梁启超：《上总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

但是被权力欲冲昏了头脑的袁世凯又怎么能听进去呢？就在梁启超回乡的过程中，袁世凯也加紧了帝制的复辟。

6月初，梁启超从广东返至上海，又到杭州西湖和南京等地游玩。由于国体问题的讨论，以及帝制阴影的逼进，梁启超再也没有闲情逸致游览湖光山色。他便开始联络袁世凯的心腹爱将江苏将军冯国璋，商谈劝阻袁世凯复辟帝制一事，冯国璋向来比较敬重梁启超，也反对袁世凯的称帝，因此二人决定一同进京。

6月底，梁启超与冯国璋一起来到北京，探询袁氏是否真的想当皇帝，并准备亲自规劝袁世凯取消实行帝制的念头。冯国璋在未去见袁世凯之前，先对梁启超说：“我的辩说能力远远不

如您，而您的实力则不如我，必须由我与您一起同往。你可反复说明我的想法，开导袁世凯，我则暗示愿以实力作你的后盾，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或许可以挽救危机。”梁启超接受了冯国璋的建议，并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草拟了谏说纲要数十条，绞尽了脑汁，把凡可成为理由的，都一一列上，想给袁世凯打上最后一支挽救针。

梁冯两人一同前往北京新华宫。袁世凯听说他们来拜访，非常高兴，并设宴款待。在筵席上，梁正想站起来说话，袁立即笑着说道：“你们两人这次来访，我知道你们的用意，是想劝谏我不做皇帝而已。我问你们两位，我袁某欲做皇帝者，究思作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作万代皇帝而无穷乎？”当时，梁冯二人感到愕然，还未来得及回答其所问，袁又笑着说：“我并不傻，并不想当万代一系的天子。”接着，袁叹息道：“我有犬子二十余人，让他们都过来，请二位帮我挑一挑。任公，您最善于鉴别，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可以不败我的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任公，待君选出之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者可称帝二代。”梁冯二人听完之后，相对无言，虽怀揣万言书，竟一字也说不出。袁世凯振振有词，假称自己不愿当皇帝，甚至还说什么，如果百姓强把黄袍加在他的身上，他在英国伦敦已买好了房子，非远走不可。

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和袁世凯的合作也就再也没有可能。梁启超曾经对袁世凯充满了幻想，虽然也曾察觉他的野心，但是没曾想真的成为了事实。梁启超尽管曾经极力主张君主立宪，但是由于共和立宪的确立，梁启超在从政过程中，也看到了共和较之君宪更加先进，故而早已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成为了坚定的共和卫士。面对甚嚣尘上的帝制复辟言论，梁启超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懑与激动，决定拿起如椽大笔发文反击，梁启超说：“我再也不能坐视这种局面糜烂下去了，除非上天剥夺了我写作的权利，否则我一定要痛加责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721 页。

就在筹安会出现不久，梁启超连夜写就了一篇震烁古今、脍炙人口、令人拍案叫绝的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该文刚刚写出还没有发表，其内容就被袁世凯获悉，立时体如筛糠，汗流浹背。由此可见袁世凯也是在严密监视梁启超的一举一动。袁世凯立即派人带着 20 万巨款前去收买梁启超，要求梁启超放弃发表。梁启超严词拒绝，并且带有示威性地抄录一份转交袁世凯。袁世凯紧接着威胁梁启超说：“你曾经在海外流亡了十多年，这个滋味不好受吧？你还想再尝吗？”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 143 页。

面对豺狼一样的声音，梁启超并没有退缩，谈笑自若：“亡命海外对于我来说可是家常便饭，经验丰富。我宁愿如此，也不愿意生活在这个污浊不堪的社会。”各种匿名的恐吓信更是如雪片一样飞向了梁启超，面对如此的压力，梁启超毅然决然地将该文发表在了《京报》上。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是一篇反袁檄文。它的内容，主要是反对袁世凯称帝。梁

启超在文章中指出：“公等(指“筹安会”等一班人)主张君主国体，那将来的君主是谁呢？不能不求公等明言，是想在现在的大总统之外再找一个吗？”“如果是现在的大总统，那就麻烦了，今大总统即位宣誓之语，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则中外众生，尊重共和，倡行民权，仍然在耳畔回响。”他决不能违背誓言。今大总统在位将近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朝令夕改，使国民彷徨迷惑，不知所从，政府威信，扫地以尽。”今大总统如若“仍行专制，我恐怕天下人都不能原谅他了。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专制之实，这是前清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希望大总统以前清之灭亡为借鉴。若大总统不听人们的劝告，一意孤行，则会面临“朝局扰乱，混淆视听，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这是四万万人都应当共同诛锄的。”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

梁启超在他的这篇文章中，又针对杨度所写的《君宪救国论》加以驳斥，利用无可争辩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分析，将杨度为鼓吹帝制而作的这篇谬论，驳斥的体无完肤，显示了梁启超无与伦比的雄辩能力和超人才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标志着梁启超完成了从拥袁到反袁的转变。

在《京报》上发表以后，报纸当日全部售完，茶馆、酒肆无处不在传诵议论，买不到的人只得到处借阅，甚至有的人到报馆要求重新印刷再版。报纸的价格也是直线上升，一时大有洛阳纸贵之势，很多人都以买不到报纸而遗憾。第二天《国民公报》转载，依然抢购一空，但总算缓解了人们阅读此文的压力，报纸销售之旺达到空前的程度。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空前的，袁世凯称帝的底层基础已经被掏空了。当时人记载说：“举国正气消亡，没有一个人敢发表反对的言论。梁公此文一出，表达了人人所欲言，而未敢言之事，深为振奋人心。”梁启超率先吹响了反袁的号角。

### 三、密谋讨袁详细策划

梁启超义无反顾地走上反袁道路以后，加紧了护国的步伐。当时筹安会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早已脱掉了研究学术的外衣，通电各省军政长官派代表到北京，讨论“国体”问题，又凑成“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议院投递请愿书，要求改变国体。袁世凯的爪牙亲信也是不甘落后，大肆活动，为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大造舆论。尤其是梁士诒，筹集了巨款，组织各种各样的“请愿团”支持帝制，一时间什么“妓女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乌烟瘴气，不堪入目，为了达到各自卑污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

这时蔡锷秘密来到天津。蔡锷，字松坡，湖南宝庆人，与梁启超有深厚的师生之谊。早在

湖南长沙时务学堂时，蔡锷出众的才华和成绩，就博得了梁启超的器重和赏识，蔡锷也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后来蔡锷到日本求学，毕业于日本的士官学校，他与同班的蒋百里、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生三杰”。回国后，担任编练新军的重任，年纪轻轻就博得了很高的声誉。辛亥革命爆发后，蔡锷被推举为云南都督。在民国三年，蔡锷辞去了都督一职，一方面是为了养病，更重要的是他担心军人担任地方要职过长，会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因此毅然退职。蔡锷离滇，袁世凯正求之不得，他对这么一个优秀的年轻将领早已存有戒心。因此对蔡锷优礼有加，答应调蔡锷入京，给予昭威将军的上将头衔。实际上袁世凯此举是“囚龙困虎之计”，以功名富贵为筹码削去了蔡锷的军权，实际上将蔡锷软禁了起来。

蔡锷此番来津主要是和梁启超商量如何应对袁世凯的复辟。当时参加讨论的还有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等人，几个人商定，由蔡锷秘密联络在云南和贵州的旧部，准备讨袁，而梁启超则先发表文章，制造舆论，表明态度，这也是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时由于蔡锷和梁启超的频繁交往，也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他从来就没有放松对蔡锷的监视。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有一天，蔡公家里出了盗案了，有四、五个衣服很整齐的人，带着手枪来抢劫。但是奇怪，什么东西都没有抢去，只是翻箱倒篋像要搜查什么书籍纸片之类，结果搜不出什么，空手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是袁世凯派来要偷蔡公的电报密码本子。可惜他脑筋发动得迟慢，蔡公早已防备到这一着，在一个礼拜前已经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放在我的卧房里头了。袁世凯一面发气，一面恐怕露马脚，过几天便把那几个钦派强盗枪毙灭口了。”可以想见袁世凯对蔡锷监视的严密程度。

袁世凯的猜忌使蔡锷更加小心地隐蔽自己。为了避开袁世凯的耳目，迷惑袁世凯和他的党羽，蔡锷整日混迹于茶馆酒肆，妓院戏馆，逍遥享乐，并且和杨度等人打的火热，这一招果然奏效，袁世凯放松了对蔡锷的监视。蔡锷一方面与袁世凯周旋，一方面则想方设法取得与云贵旧部的联系，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顺利进行。10月，戴戡、王伯群等来到天津，戴戡曾任贵州巡抚使，是云贵军政界中颇有影响的人物，早年曾是蔡锷的部下，深受教诲；而王伯群是现任贵州巡抚使的外甥，是同盟会会员，坚定支持蔡锷的护国行动。几个人在梁启超的寓所商定了周密的讨袁计划。决定只要袁世凯一宣布帝制，云南就立即起义，而后贵州就会响应，广西也会在两个月后响应，然后以两广和四川为基地，挥师北进，保护共和政体，推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并且派王伯群先行回到云南、广西，联络云南的唐继尧和陆荣廷预先准备。

这时袁世凯的帝制也进入尾声，全国各地开始推举国民代表，3天后在袁世凯及其党羽强大军队的威逼下，各省代表选举皆告结束，都同意更改国体，并推定参议院为国民代表大会的总代表。12月11日，参政会开会，以总代表的名义投票推戴袁世凯当中华帝国的皇帝，并且肉麻地吹捧袁世凯所谓的“功绩”，说什么顺天应人，请他“速正大位”。袁世凯也假惺惺地谦让

一番，然后就只好“顺应民意”而开始了他 83 天的皇帝梦。

梁启超在批判袁世凯这次帝制闹剧时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国体问题的人，就是袁氏自己在讨论；所谓赞成者，就是袁氏自己在赞成；所谓请愿者，就是袁氏自己在请愿；所谓表决者，就是袁氏自己在表决；所谓推戴者，都是袁氏自己在推戴。如果实行帝制是民意，何必还要由袁世凯的爪牙发动呢？何必由各省长官指派代表呢？……何必由北京代拟推戴书呢？这是政府在从中操纵啊，连五岁的小孩都能知道，还骗谁呢？”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电书后》，《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 四、护国军师精心筹划

1915 年 11 月底，蔡锷摆脱袁世凯的监视，秘密脱身来到天津，驻进了日本的同仁医院。关于蔡锷是如何逃出袁世凯的监视，有很多传说，其中最多的就是说蔡锷是借助北京名妓小凤仙，逃出虎口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当时北京政界狎妓成风，蔡锷为了掩人耳目也是随波逐流，混迹妓馆，当时蔡锷经常和小凤仙来往，也博得了“风流将军”的美名。借着一次和小凤仙出游的机会，在小凤仙的掩护下，蔡锷逃出北京。袁世凯听说蔡锷离京，立即派人到天津医院跟踪，等到袁世凯派来探病的人拿了医生的诊断书回去，蔡锷趁机赶到梁启超家里，马上化装，秘密搭船去日本长崎，会见他派去云南、又从云南再出迎他的一位亲信。而梁启超却一直在天津不动，这不仅因为办事的秘密机关设在他家，他不能走开，而且因为他一走动，就可能会使袁世凯更加防范蔡锷，蔡锷就到不了云南。梁启超说：他们那几个月是时刻当心的，一直到 12 月 2 日蔡锷离开天津前往日本为止。他们约好日子，算准时间，当蔡锷到达云南的时候，梁启超便前往上海。他们在分手的时候，约定两句话：“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

从这两句话里，我们虽然可以看到，梁启超和蔡锷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愿意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即使成功，也功成身退，不要个人名誉地位的可贵



精神。

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发动护国战争，这是珍贵的蔡锷全家合影

蔡锷到达日本后乘船经台湾到香港，转道越南海防，乘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唐继尧的弟弟唐继虞到车站迎接并护送蔡锷于1915年12月19日到达昆明。梁启超也于12月18日到达上海。蔡锷没有到达云南以前，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就已经在蔡锷的命令下开始了布置反袁工作。蔡锷入滇后，和唐继尧一起主持军事会议，进行更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护国起义如箭在弦。

梁启超到上海后，受到袁世凯派来密探的严密监视，生活相当艰险。他在1915年12月19日在他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就谈到：“此间的危险程度，比天津更加严重。大约惟有一步不出，概不见客才能安全。”“身边事无人料理，深觉不便。”

梁启超：《与娴儿书》，1915年12月19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6页但是他对外面的消息仍是很灵通，因为有人会主动上门与他联络，为他通风报信。他仍然可以和蔡锷、唐继尧等进行函电的交往，不断地把北京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情况，及时向云南通报，同时还对护国军的军事教育、政治思想、财政、外交等各方面，进行精心的策划和指导。

梁启超在上海期间，又花了不少时间和南京的冯国璋联系，想运动冯国璋赞助云南起义。当时，在冯国璋的部属中，胡晴初、潘若海两人为反对袁世凯称帝最有力的人。因此，梁氏曾先后三次托黄溯初去南京，通过胡晴初的带领，面见冯国璋，面述云南起义军的情况，并面交梁给冯的信件。12月22日，梁启超获悉，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的支持派人到日本去以馈赠为名准备出卖更大的国家权益。为了阻止袁世凯的卖国行为，梁启超请冯代发电报给在云南的蔡锷。12月24日蔡锷收到电报，以为梁启超已到了南京，又以为冯国璋已同情云南起义而可以响应了，于是决定立即起义。

云南军界在唐继尧和蔡锷的主持下，歃血为盟，以“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

国贼。”相号召，并于12月23日致电袁世凯痛斥袁世凯的种种叛逆之罪，要把袁世凯这些帝制祸首“明正典刑”。措词极为激烈。12月27日发出讨袁通电，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卖国、专制的袁记政府。反袁的护国战争正式开始。

云南独立的消息，传入北京，袁世凯自然很惊慌，但是他并没有就此罢休。凭借强大的北洋军为后盾，他根本不把云南放在眼里，相反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云南军政府发出了由梁启超起草的《云贵檄告全国文》，历数袁世凯的19大罪状，占领了舆论的先机，也博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云南将士士气大震，于1月14日在蔡锷的指挥下分兵三路正式挥师北上。

远在上海的梁启超，时刻关注着起义的进行，从多个方面对起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指导。其一，筹措财政。云南向来比较贫瘠，承担巨额的起义军费比较艰难。为此他指示蔡锷等人一要提高盐税的税额，掌握这第一财源，二就是要劝募富商支持护国，他还派人到海外筹集资金支持蔡锷。其二，对蔡锷在西南一带的军事行动有所指导。1916年1月8日在给蔡锷的信中就谈到：“补充兵力的及时训练和编制，是当为滇政府目前的第一大业。……以我看来，则不能只专注于练，而尤当注重教育。所教者，不能专注于技术，而尤当注重精神。应该考虑到我军正处在孤军作战的危险时刻，而滇、黔又为极贫瘠之地，将来经略四方，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决对不能避免，粮饷不能及时供给当是自然。我们凭什么和敌人决胜负呢？只有靠军心的团结。团结军心，以爱国观念为根本，这是最主要的，然抽象的爱国观念，要让兵士体会深刻，谈何容易。”后来，蔡锷所领导的护国军，在西南进行反袁斗争，士兵们能吃苦耐劳，斗志昂扬，视死如归，以少胜多，除蔡锷本人深入士兵群众、以身作则外，看来与梁启超的军事指导、注重于精神训练，是有关系的。其三，梁启超还运动冯国璋赞助云南起义，冯国璋与梁启超也是暗通声气。虽然冯国璋没有立即表示倒袁，但是表示不会与护国军为敌。并且联合江西都督李纯等人致电袁世凯请求取消帝制，对袁世凯打击颇大。其四，梁启超重视舆论的作用。他指导蔡锷等人将袁世凯复辟帝制以来的种种罪行，汇编成册，取名为《民意征实录》，广为散发，有力地揭露了袁世凯的丑恶嘴脸。一系列的指导无疑都对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堪称护国运动的军师。

## 五、入桂从军再造共和

蔡锷的护国军在四川取得了重大胜利，势如破竹。使得袁世凯大为震惊，急忙向四川派遣重兵。陆续集结到四川的北洋军竟达十万之众，是蔡锷护国军十多倍的兵力。北洋军借助给养充足、装备先进的优势轮番进攻。尽管广大护国军将士浴血奋战，还是由于相差悬殊，伤亡较多，不得已蔡锷下令军队退守泸州。

面对护国军的挫折，梁启超忧心如焚。在蔡锷孤军作战的时候，答应独立的许多省份都处

于观望的阶段，要壮大护国军的力量，只有促成广西的独立，使云贵等西南连成一片。因此蔡锷电致梁启超希望他能促成广西独立。于是梁启超在年初给陆荣廷写了一封长达三千言的信，对陆荣廷晓以大义，分析利弊。这封信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陆荣廷收到信后派军官唐伯珊，带着他的亲笔信来找梁启超，说是欢迎梁氏到广西去。只有梁氏到广西去，他才宣布独立。梁启超后来回忆说：“得到这个消息，真是喜从天降。我一点不迟疑答道：我立刻就去。”

3月4日，梁启超在日本驻华武官青木中将的帮助下，协同黄溯初、汤觉顿、唐绍慧等一行7人，乘日本的轮船南下。在轮船中，梁启超并没有闲下来，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就广西独立、劝退袁世凯、军务院的设置等，起草了大量的通牒、宣言、电文等文件。文件到达香港以后，几经周折，才得以保住，险些就被香港巡捕搜走。为了梁启超的安全，他被安排在舱底，生活很是艰苦。在这里他们兵分两路，汤觉顿等人由香港经广西梧州先行赴南宁准备独立，并带走了梁启超起草的电文；梁启超则由黄溯初陪同坐船到达越南，这段路程相当艰辛，真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黄溯初在后来也称赞梁启超说：“只身孤行，奔走万里，任公之大勇，由此可见矣。”《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62页。

就在梁启超赴桂途中，汤觉顿等人已经先行到达南宁。陆荣廷信守诺言，在梁启超未到之前就发出了广西独立的通电，接着发出了由梁启超起草的《广西致北京最后通牒电》，提出“恶贼不锄，国难难平”，希望各省速举义旗，共同铲除民贼。同时，陆荣廷将他的柳州行营改为“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部”，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

广西的独立对护国战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极大地鼓舞了四川护国军的士气。3月17日，蔡锷下令全线反击，经过七天七夜的激战，大获全胜，经此打击北洋军再也没有反击的能力，扭转了战局，奠定了护国战争胜利的基础。

这时袁世凯的处境，已经开始变得不利，从出卖国家权益到谋求帝制，他都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然而此时，各国都发出了警告，要袁世凯暂缓改变国体。广西独立后，陆荣廷立即进入湖南，滇桂黔三省连为一体，声势大震。这时直隶巡按使朱家宝送来了冯国璋及江西督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等人的电报，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帝制元凶，并请袁世凯自行辞职。4月12日，浙江也宣布独立，接着四川、湖南跟着宣布独立，而湖北、江苏、江西、上海、山东等地的国民党人也纷纷起义。连袁世凯的亲信、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芑铭都发出通电，劝袁世凯退位。为此，袁世凯气得要死，发病卧床。袁世凯军事失利、外交失败、北洋集团内讧，无奈只得取消帝制，短短的皇帝梦就这样破灭了。

## 六、军务院抚军非去袁不可

梁启超在天津秘密讨袁时就有成立军务院的计划。并且计划两广独立以后，就成立一个临

时政府，推举黎元洪为大总统。在香港停留期间，他又和革命党人李根源商量军务院一事。广西独立以后，出兵东下广东，迫使广东都督龙济光宣布独立，并成立了两广都司令部，总揽两广军务。紧接着军务院成立于广东肇庆。军务院是护国军的最高机关，是作为与袁世凯的国务院相对立的临时政府的姿态出现的。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兼抚军，陆荣廷、蔡锷、李烈钧、刘显世、陈炳、龙济光等为抚军。由于袁世凯叛国，失去大总统资格，依约法当由黎元洪继任。所以军务院宣称直隶大总统，统筹全国军机，对内对外皆以军务院名义进行。



护国战争时期梁启超与岑春煊合影

护国军政府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它连续发表的五次宣言中。第一号宣言是宣布袁世凯的叛国罪行，并进行讨伐，将来捕获，交法庭审判。第二号宣言是依照约法，袁世凯叛国失去大总统资格，黎元洪为合法的继任者。第三号宣言是以军务院代替国务院，筹办善后政务。第四号宣言是颁布军务院的组织条例、职权范围。并声明，等到国务院正式成立，军务院便撤销。第五号宣言是宣布军务院的所在地暂定广东，并公布军务院的人事安排。总的来看，这五次宣言，指出了袁氏政府的非法性，从根本上否定了袁的独裁统治。

这些宣言，都是由梁启超一手拟定的。梁氏在此强调袁世凯的非法与自己的合法，并依照约法承认黎元洪为大总统的合法继承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国内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否则，即使军事上胜利了，最后还是会受到人们的反对而陷于失败。军务院的成立，把护国战争推向更高潮。

但是军务院仅仅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梁启超为了推动护国运动向前发展，不至功亏一篑，竭力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苦心支撑着军务院。因为此时，袁世凯仍然厚颜无耻地把持着大总

统的职位，他甚至假惺惺地希望停战议和，组建新的内阁，笼络蔡锷等护国将领，妄图分化瓦解护国力量。经过多次的较量与接触，袁世凯的嘴脸再也不能迷惑反袁斗士了，在与护国军政府抚军的众多来往函电中多次说道：“诸君定要协力进取，勿稍松动。”在这种情形下，护国诸贤坚持不懈力争非去袁不可。

军务院成立一周后，梁启超离开广东，前往上海与冯国璋联络迫袁退位问题，正当他为反袁问题奔走的时候，惊悉父亲病逝，悲痛万分，要求辞去本兼各职，为父收丧，并敦促各抚军一定完成反袁大业。

## 七、再造共和功臣痛悼蔡松坡

梁启超到上海后 20 多天，袁世凯就因忧惧生病而于 6 月 6 日死去，黎元洪依照约法继任大总统，同时恢复约法和国会，南方的军务院也跟着于 7 月 25 日撤销，护国战争当然也就宣告达到目的而胜利结束。

但是袁世凯死后，国内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北洋军阀分裂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西南各省军阀也由于护国战争而逐渐做大，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这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仍然倡导将护国战争，进一步推进，以求扫除北洋余孽。面对这样复杂的局势，梁启超的指导思想就是结束南北对峙的状态，统一全国，稳定局势，继续建设资本主义的立宪政治。6 月 8 日，梁启超致电黎元洪，希望他委任段祺瑞为内阁总理，组建新的内阁，统一南北。继梁启超以后，云南、广西等省表示支持段祺瑞组建内阁。但是，南北双方就恢复何种约法的问题，一直争执不下。南方各省主张恢复《临时约法》和民国国会，而段祺瑞则想恢复袁世凯时期制定的《新约法》。梁启超和各省都督反对段祺瑞的做法。不仅南方各省反对段祺瑞，连北洋集团内部的冯国璋也和他唱对台戏。面对各方的反对，经过梁启超和段祺瑞几番交涉，段祺瑞不得不同意恢复《临时约法》。

6 月 29 日，段祺瑞宣誓就职内阁总理，组建新的内阁，从内阁的人员来看，是各派力量的大拼凑。新内阁成立后，实行了一系列的肃清帝制影响的政策，解除报禁，废除将军、巡按等旧称。7 月 15 日在梁启超的主持下，军务院宣告解散，民国国会恢复，黎元洪的总统被确认，并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护国战争结束，南北终于恢复了表面的统一。

作为护国战争的军师和力促南北统一的功臣，梁启超受到了北京政府的极度礼遇。黎元洪亲自致电梁启超称赞他的丰功伟绩和才德，希望梁启超出任他的总统府秘书长，希望他能够入京襄赞一切。然而此时梁启超想修身静养一段时间，没有接受他的邀请。

就在梁启超准备弃政从教的时候，他的得意门生，护国战争的主要军事领导人，讨袁名将蔡锷逝世。在历时半年多的护国战争中，蔡锷一直是重病缠身。但他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毫不

畏惧，豪情横溢，指挥若定，艰苦奋斗，英勇杀敌，为最终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捍卫共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彪炳史册。战争结束后，蔡锷为了实践“成功不争地位”的约言，便辞去四川督军兼省长的职务。政府以其有功民国，擢其军衔为陆军上将，并多次敦劝他继续留任，蔡锷都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不再做官。

在军中的那几个月，由于吃不好，睡得更少，劳累过度，使病情日益加重。他本来急着要去医治，但由于自己的军队需要收束，而四川的社会秩序也需要维持，他仍是抱病亲自到成都去住了 20 多天，把各方面的事情都安排妥当才离开岗位。当时，政府不许他辞职，四川的老百姓烧着香、拦着路不让他走，他还是毅然地走了。

等到他来到上海的时候，梁启超会见他，几乎认不出他来。因为他瘦得不成人样，喉咙也沙哑到一点声音也没有。北京政府派人欢迎他北上，他也不去。在上海住了几天就前往日本治病，才发现他患有喉癌。但蔡锷已病入膏肓，医生无法妙手回春，于 11 月 8 日病逝于日本。

1916 年 12 月 5 日，蔡锷的遗体由日本运回上海，准备返湖南故乡安葬，在上海的各界人士，执紼号恸者数以万计。梁启超更是率领弟弟启勋及女儿梁思顺、儿子梁思成等，前往蔡锷灵奠祭。他在《祭蔡松坡文》中说：“自从你跟随我学习以来，转眼就是二十年了。长沙课室外的提问，东京住所交谈的笑声，至今仍历历在目。尔后书信往来，魂梦相依。去年秋冬间，为护国而秘密策划，以及分手时的相约决心，一字一句，永远刻在我的心上。你在发愤治军以后，已决定为祖国献身。但辛亥革命起义时你没有死，护国战争中你也没有死，现在为国家大事而死，是死得其所。”梁启超送给蔡锷的挽联是这样写的：“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梁启超称蔡锷为“再造民国之伟大人物。”

## 第十章再战复辟逆流出任段阁财长

### 一、组成研究系力战商榷系

护国战争结束后，尽管梁启超曾经想以“在野政治家”自居，但是他看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必须参加到政府中去。为了实现自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他决定再次与统治阶级合作，为了在即将开始的国会选举中获胜，梁启超决定组建新的政党。

在梁启超的号召下，在京的进步党人成立“宪法案研究会”，与此同时另一部分进步党人则组成了“宪法研究同志会”。两会名称虽有差别，但是宗旨是相同的，都把精研宪法作为自己的

组党目标。因此这年9月，宪法研究会与宪法研究同志会在梁启超的敦促下又宣布二者合并，取名为“宪法研究会”，以和在此之前成立的国民党议员政团“宪法商榷会”相抗衡。宪法研究会的宗旨仍然是研究宪法，因此人们称之为“研究系”。研究系在组织和政策倾向上都是进步党的继续，都以拥护现行政府为职志。

在国会内是研究系和商榷系的斗争，在国会之外则是以张勋为首的北洋地方军阀组成的“督军团”肆无忌惮地攻击、干涉国会、内阁和政府，在北洋军阀内部则是直系和皖系的斗争，政府内部则是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段祺瑞之间权力的争夺，这时的政治局面真是错综复杂，扑朔迷离。

研究系和商榷系的矛盾表现在宪法问题上，在省制是否入宪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商榷系认为，中国既然实行共和制，就应该省长民选，给予地方自治的权力，自然也应该在宪法中得以体现。研究系则持反对态度。很显然商榷系的目的在于加强地方自治的权力，限制北洋军阀的权力，为南方的国民党开拓更大的空间；而梁启超向来持国家主义的方针，主张建立强势的中央政府，而缩小地方的权限，这无疑帮了段祺瑞的大忙。但是激烈的争执不利于宪法的顺利通过，于是1917年，黎元洪召集两派的头面人物进行协商，经过讨价还价，双方都作了退让，修宪之争才告一段落。

## 二、调和府院对德宣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和美国都趁欧洲各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之机，扩大在华利益，因此两国也产生了严重的矛盾。1917年初，美国宣布和德国断交，并准备对德宣战，并且运动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起行动，以借机加强在华的影响。于是2月9日，北京政府就德国无限制潜艇问题提出了抗议。日本原来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在获悉美国的企图后，立即改变了态度，也积极支持中国参战，并表示如果中国参战，日本会提供大笔的贷款。日本的意图是想抢在美国之前，敦促中国参战，以便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纳入自己的囊中。美国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于是也改变了初衷，希望中国不要对德宣战，以绝交为底限。

这时黎元洪担心亲日派的段祺瑞会以参战为名，扩大自己的权力，进一步操纵国会，因此不同意参战；而段祺瑞则想通过参战获得日本的贷款，进一步扩大皖系的力量。双方争执不下，段祺瑞还一度以辞职相威胁，不得已国会通过了对德绝交案。

梁启超尽管在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周旋，力图维持政府的稳定，化解二人的矛盾，但是梁启超还是带领他的研究系支持段祺瑞的对德参战政策。梁启超之所以支持段祺瑞的参战政策，他认为一方面德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打败德国，可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收回被德国等帝国主义掠夺走的一些国家权益；第二是因为梁启超认为中国历来生存在国际的“均势”之中，他认

为德国退出中国以后，中国只有依靠在各国之间周旋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主张一视同仁，因此必须和大多数协约国家看齐；第三是梁启超想利用段祺瑞的支持，击败对手商榷系。

尽管有梁启超的全力支持，段祺瑞的对德宣战案还是不能通过，因为国会中第一大党商榷系支持黎元洪。并且在争论中，国会对内阁提出了不信任案，在京的北洋督军希望黎元洪解散国会，重新选举。而黎元洪却罢免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不甘示弱，立即通电煽动督军团反对黎元洪，甚至有八省督军宣布独立，研究系的议员纷纷辞职，国会陷于瘫痪。不得已，黎元洪向张勋发出了调和的邀请。张勋进京，导演了一幕复辟丑剧。

### 三、反对张勋复辟再次捍卫共和

张勋，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兵痞出身，曾参与了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在清朝官至提督和江防大臣，在辛亥革命中曾疯狂屠杀革命军队，失败后退守徐州。民国初年，所部改为武卫前军，驻扎兖州。此时他仍然以清朝的遗老自居，脑后还依然垂着一条大辫子，他所率领的军队也不许剪发，人称“辫子军”，他被成为“辫帅”，并且为了复辟，在徐州一带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督军团就是在他的倡议下成立的。黎元洪的邀请为他的复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立即率兵北上。

他先在天津逼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紧接着进入北京。第二天，就换上前清的朝服，到故宫参拜溥仪。前清的遗老遗少、王公贵族和保皇分子都闻风而至。7月1日，他宣布恢复大清帝国。他因为拥戴有功，被封为内阁议政大臣，就连康有为也被封为“弼德院大臣”，其他喽罗各有封赏。张勋复辟立即引起了国内的普遍反对，保皇派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也给段祺瑞提供了重返政治舞台的契机。

梁启超也不例外，立即带领研究系成员全身心地投入到反复辟的斗争中。张勋复辟的第二天，他就帮助段祺瑞在天津组织武力讨逆。段祺瑞召开了军事会议，组成了“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梁启超则作了司令部的聘任参赞，成为段祺瑞的高级幕僚。这一时期，讨逆军的通电文告，都出自梁启超的手笔。

马厂誓师以后，讨逆军立即开始了讨伐复辟的军事行动。辫子军失道寡助，很快就失败了。复辟势力很快就树倒猢狲散，张勋和康有为都借外国领事馆暂避通缉。在这场运动中，梁启超为反复辟斗争又立新功。

## 四、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

梁启超从 18 岁开始，便拜康有为做老师。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以及后来逃亡到日本的初期，梁启超对康有为老师都十分仰慕，十分尊敬，康老师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真正到了一唱一和、言听计从的地步，成为康氏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当时的人，都以“康梁”并称。

以前虽然也有矛盾，但是两个人的立场还是基本一致，但是，康梁师徒真正分手、各奔前程，是在复辟与反复辟之后。1915 年 12 月，梁启超从天津南下讨伐袁世凯，康有为听了之后，大发雷霆，提出了他的复辟主张，并且说：“若不相从，我们就断绝师徒关系”。可是，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意志已很坚定，不会因为受到康有为的斥责，而改变自己从军前往广西的安排。梁氏一如既往，继续进行反袁斗争。此事加深了康梁师徒在政治上的矛盾。

1916 年 4 月 4 日，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抛出了《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一文，主张扶持清朝皇帝溥仪复位。此时，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下令撤销洪宪帝制，但仍霸住大总统的职位不放。梁启超在广西军中读了康有为的文章后，写了《辟复辟论》一文，对康有为的复辟言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评。

梁启超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在军中已经一个多月，对外界的事物因消息不灵通而了解得不多，但听说，上海有一二位旧时的老人，有着扶持清帝复辟的论调。我原以为，时至今日，哪里还会有如此恶劣的言论出现，便付诸一笑。可是，后来进一步了解到，不仅有倡言人，而且有附和者，于是，我再也不能不说话了。”这里的老人就是指康有为。

在复辟问题上，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深。在这次讨逆运动中，梁启超又义无反顾地站到了老师的对立面。据说康有为在美国公使馆避难期间，写了不少诗，有一首诗后还附有一注说：“此次讨逆军发难于梁贼启超”。由此可见，康有为对梁启超也恨透了，不仅骂他是“贼”，而且指责他违背了伦理道德，如同禽兽。这说明康梁的师徒关系进一步破裂，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自此以后，梁启超虽然与康有为在政治思想上是决裂了，但梁对康的师徒情谊仍然存在。1927 年 3 月 8 日(农历二月五日)是康有为的七十寿辰，梁启超和其他当年的同窗，亲自前往上海为康老师祝寿，并执笔撰写了寿文一篇、寿联一对。其寿联写的是：“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1124 页。

这表现了梁启超对老师的虔诚祝福和由衷的赞扬。他在《南海先生七十寿言》的寿文中，字里行间也充满了学生对老师的仰慕之情。

20 多天后的 3 月 31 日，康有为突然在青岛病逝，身后甚为萧条。梁启超知道这个消息后，

马上电汇了几百块钱去，以帮助安排丧葬。4月17日，梁启超还在北京和康门弟子一起，于畿辅先哲祠为康有为举行公祭。为此，他又写了祭文一篇和挽联一副，并在公祭仪式上宣读了他的祭文。在祭文中，对康有为生前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

## 五、再度入阁掌理财权

张勋复辟失败以后，梁启超随同段祺瑞一同回到北京，真可谓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在此之前，冯国璋已经在南京就任了大总统，并且任命以“三造共和”的英雄自居的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授命他组阁。7月，段祺瑞组成了他的新内阁，内阁成员是段派官僚、研究系和交通系组成，又是一个融合各派力量的混合内阁，但却把国民党的力量排除在外，并且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

在段祺瑞的新内阁的九名阁员中，研究系的成员占到了6人，梁启超被授以财政总长的职务。这是梁启超多年以来的一个心愿，想通过自己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实际的财政工作，扭转中国财政经济衰败的状况，也可以学有所用。因此对于段祺瑞的这一任命甚是欣慰，决定和他一起携手共进，大展鸿图。

上台以后，梁启超马上任命弟子张君勱推荐的王克敏担任财政次长。为什么要任命王克敏呢？因为梁启超深知在北洋政府做官，不擅长交际，左右逢源是不可能的，因为军阀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必须八面玲珑，和各方面都搞好关系，才能保证政策的顺利实行。而王克敏不仅和各派军阀都很熟悉，还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各国银行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于改革财政，是最好的人选。在这位得力助手的帮助下，梁启超确立了“改革币制，整顿金融”八字方针。

北洋政府这时已经是债台高筑，要想改革财政，只有获得充裕的财政支持，才有可能。因而一方面，梁启超支持段政府马上宣布了对德宣战案，这一招果然灵验，博得了协约国的好感。各国决定将中国每年偿付他们的庚子赔款，暂缓五年执行。庚子赔款每年达到1 300多万元，这样一来，实际上变相为段政府提供了2 600万的财政支持。而且梁启超还通过王克敏和日本人积极交涉，签订了一笔借款合同，第一期就达到1 000万日元。在举借外债的同时，梁启超贯彻了自己的财政理念，那就是发行国债5 000万元。这样一来，梁启超上任伊始，就为政府筹集了充足的资金进行财政改革，因此马上宣布了《整理币制办法大纲》，派考察团到日本进行考察，决定学习日本的货币体制，统一币制。

然而，梁启超想的还是太幼稚了。当时段祺瑞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实现他消灭各派势力的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微薄的国家财政收入已经不敷使用，段祺瑞竟然挪用了梁启超辛辛苦苦筹集来的日本借款1 300万，这无异于釜底抽薪。并且，这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由于反对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的行为，以两广为根据地，联合纷纷南下的国民党议员，

组成“非常国会”，开始了护法运动。段祺瑞仰仗自己有强大的武力，又有日本的借款作军费，决心发动“南北战争”。在段祺瑞的武装统一计划面前，梁启超的财政改革计划彻底失败。尽管如此，梁启超没有放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实现中央政府的收支平衡。就在梁启超刚刚发布自己竭尽心血编制好的财政收支计划的时候，各支军阀却以要求报销在讨逆战争中的军费为由，向梁启超伸出了罪恶的黑手，要求中央政府支付军费。这笔庞大的开支，梁启超再也无法筹集。加之，由于军阀割据，自己委任的财政官员，迟迟得不到各地军阀的认可，官员不能上任，还谈什么改革财政？不得已梁启超向冯国璋提出了“辞呈”。

后来由于冯国璋的极力慰留，加上当时南北矛盾越来越激化，北洋军阀内部的直皖矛盾也日益公开，政府岌岌可危，考虑到国家前途，梁启超没有立即辞职。就在段祺瑞积极主战的时候，冯国璋为了排挤段祺瑞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政策，主张和南方谈判解决争端，段祺瑞派往四川等地的军队也初战不利，所有直系将领纷纷通电和解，不得已段祺瑞被迫辞职。梁启超这次也紧跟着再次提出辞呈，尽管冯国璋再次慰留，梁启超决意告别政坛，去意已决，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下，梁启超避居天津，开始了他十年的学术生涯。

## 六、爱国至诚终不改巴黎和会显神通

梁启超告别政坛以后，就想到欧洲去游历、考察，以便增进中西方的学术交流，开阔自己的眼界。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了解决战后问题，协约国决定在巴黎召开和会，商讨战后瓜分利益。中国派出了以陆征祥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和会，议决中国的山东问题。中国上下欢呼雀跃，都认为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终于有扬眉吐气的时候了。这时正值梁启超有游欧计划，尽管他已经退出了政坛，但是他在国内外的影响仍然是举足轻重，因此国内舆论希望梁启超此行，不要单纯以学术为目的，化私为公，为中国的利益进一份力。梁启超面对国内的期望，决定暂时放弃手头的学术研究，带领弟子赴欧一游。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措，梁启超筹得了10万元的经费，挑选了当时最为有名的一些学者，作为随员，包括丁文江、张君勱、蒋百里、刘崇杰等人，这些人都奉梁启超为老师，极为敬重。他们准备由天津动身到上海，从上海转赴欧洲。

1919年2月，经过45天的艰难航行，他们到达欧洲第一站——伦敦。在伦敦他们看到的已经不是昔日繁华的经济之都，而是被战争破坏的一派荒凉景象。但是梁启超并没有因为物质的匮乏而灰心失望，而是积极考察英国的政治和学术状况。在英国上下两院旁听时，让梁启超感慨万端，对于英国议会制度之完备，议员素质之高，态度之文明，风格之高尚，辩论问题之精细，都让梁启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后来说：“我想一个国民若是未经养成这种精神，讲什么立宪共和，岂不是南辕北辙。”《欧游心影录·伦敦初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

抵达伦敦一周后，梁启超率队赶到巴黎。立即开始了在会内会外的活动。早在游历欧洲之前，梁启超曾经会见了日本公使芳泽探询日本对于山东的态度，梁启超表示：“我们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应该废止，日本在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没有根据。”而芳泽却狡猾地说：“我们日本人却不是这样解释。”梁启超当时就勃然大怒，激愤地说：“中日亲善，你们天天挂在嘴边，难道你们就是这样中日亲善的吗？”《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

他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法等国代表，请求他们支持中国争回山东的权利。威尔逊等人也是虚与应付，令梁启超大失所望。

本来在和会上，中国就是弱小的国家之一，任人宰割，争取权利已经非常不易，然而北洋政府却事先与日本订立了密约，同意日本占领山东的要求，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国代表团无所作为。当时国内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个密约，梁启超到达巴黎后才得知。因此，他马上将这个信息通知了国内，国内以熊希龄、林长民等人为首的爱国人士接到电报异常愤激，立时组成了“国民外交协进会”，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并委托梁启超为协进会代表，向巴黎请愿，争回山东主权。

英法等国，由于和日本串通一气，最终背着中国在和会上同意将中国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况，梁启超忍无可忍，立即通知国内，建议发起拒绝签字运动。接到电报，林长民立即发表了《山东亡矣》的文章，如实介绍和会情况，激起了国内的反对浪潮，“五·四”运动爆发了。巴黎和会代表面对国内发来的不计其数的警告电，在签字问题上犹豫不定，而北洋政府却一意孤行，强迫代表签字。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日子，梁启超发动中国留法的工人和学生包围了中国代表驻地，声言谁要出门就杀了谁，在中国各阶层的极力反对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应该说在拒签和约和间接推动“五·四”运动方面，梁启超都功不可没。

此次游历，梁启超等人的足迹，遍布欧洲大部分国家，但大部分时间留在法国。他广泛接触法国的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和他们切磋交流，贪婪地吸收着先进的文化。梁启超出色的才华也使他赢得了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各界的尊重。他和很多法国著名的学者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第十一章卓越的学者慈爱的父亲

### 一、筹办教育培德育才

欧游的经历和自己多年的政治实践使梁启超看到，要改变中国政治的状况，只有从教育入

手，培养新民，提高民众素质，他把变革中国的希望由上层转移到了中下层。于是他产生了筹办教育的想法。

1920年，欧游回国后，梁启超应上海中国公学的邀请，前往该校演讲。中国公学位于上海吴淞，建立于清末，现任校长王敬芳，是学校的主要出资人之一，该校是一所中学。此次王敬芳的本意就是想让梁启超接替自己的职务。尽管梁启超有办教育的计划，他并没有接受这个职位，主要考虑的还是学校资金问题，毕竟王敬芳是主要股东之一，对于筹款，比自己更有优势。因此梁启超推荐自己的学生张君勱担任该校的教务长，代王敬芳处理学校事务。梁启超也为该校积极奔走，为了筹措款项他同政府和华侨广泛联络，推动了学校的发展，也提高了该校的知名度。尽管如此，学校的财政支出仍然经常入不敷出，为了支持学校的发展，梁启超曾经一次就拿出自己《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书稿费4000元垫支学校的费用。

接办公学的第二件事就是改变学制，即将公学改为大学，添办高中。改办大学后，张东荪、蒋百里、张君勱、舒新城等人都参加了学校的教学和管理的工作。梁启超还网罗了一大批声誉卓著的学术名人到该校任教，如文学家朱自清、叶圣陶，数学家吴有训等人。

在接办中国公学以后，学校曾经两次发生学生风潮，以致张东荪和舒新城等人都很灰心失望，一度想离开公学。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梁启超通过努力都和平地解决了风潮。一方面多次致电张东荪等人，一定要坚持下去，为他们鼓劲加油，才使得学校一直维持到1927年。由于经费问题，学校最终还是停办，梁启超在总结这些年的办学成绩时说：“公学办理近十年，毕业生数千人，或留学欧美，或服务社会，成绩很优异。”《吴淞公学改办大学募捐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

在办学的同时梁启超还到处讲学，积极从事教育工作。在承办中国公学的时候，梁启超还把教育的目光投向了南开大学和清华学校。1921年，梁启超受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邀请，到南开主讲中国文化史，受到张伯苓的积极推崇。张伯苓想让梁启超主持整个南开大学的文科各系，梁启超也很高兴。他希望以南开为基地，建设中国先进的教育，培养高素质的国民，贯彻自己的教育理念。但是梁启超的上述计划没有付诸实施，因为梁启超后来将活动的重点转移到了清华学校。

清华学校是一所利用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学校，经费充足，实力雄厚。出于长远的考虑，梁启超决定将发展的重点转移到清华园，梁启超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清华建设成为和南开、北大、中央大学并列的知名大学。1925年秋，梁启超担任了清华学校的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的讲学也是极为认真，他的每篇讲稿都是认真准备，而且力求新颖，决不重复。在南开他讲的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而到了清华以后，他讲的却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他在讲学过程中充满感情颇具声色。在文学家梁实秋的回亿中，梁启超的大师风范，呼之欲出。他回亿在清华聆听梁启超的演讲时说：“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

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有的学生回忆说：“先生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的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桃花扇》，悲从中来，涕泗横流；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又是爽朗的大笑。”也因此他的课是清华学生最喜欢听的，当时他与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三人被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而就影响和地位来说，梁启超显然是位居榜首的。

1914年，清华刚刚建校3年时，他来清华演讲，引用《易经》里的话来勉励清华学生要做君子，树立“完整人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这次演讲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清华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

在南开、清华讲课期间，梁启超还在全国各地作巡回演说，次数之多、地域之广、题材之博、听众之多、影响之大，都是史无前例。这时梁启超已经有重病在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任何艰辛，仍然辛勤地工作，令年轻人都汗颜惭愧。

自己在讲学的同时，他还设立共学社和讲学社，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参加，促进学术的交流与切磋。梁启超欧游归国后，就着手组织了共学社，由梁启超、王敬芳、张东荪、赵元任等发起并负责，梁启超亲自拟定社规。共学社的宗旨就是“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共学社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编译新书，并且规定编译的新书以浅显易懂为主，可以看出梁启超致力编译的目的，是教育普通民众，发展国民基础教育。“共学社”编译了许多新书，推动了新文化的发展。“共学社”是一个松散的学术团体，以北京和上海两地为基础，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梁启超等人发出号召全国的学者就国民关注的问题——新文化运动广泛发言，积极参与，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1920年5月，梁启超和王敬芳等人用中国公学的名义对英国著名学者罗素发出了邀请，希望他来华演讲，罗素接受了邀请。为了接待罗素来华讲学，梁启超等又组织了“讲学社”，梁启超为讲学社拟定社规和董事的名单。由于这段时间，梁启超忙于写作《清代学术概论》，无暇分身，接待罗素的工作就交给了蒋百里和张东荪。罗素在中国的讲学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表示，将资助讲学社15000元，分三年付清，支持讲学社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讲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应邀来华讲学的人还有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印度文学家泰戈尔，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等人。讲学社在这三年里为中外学者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学术水平，这和梁启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 二、潜心著述成就非凡

在梁启超的这十年学术生涯中，纵论古今中外，探索社会人生和救国方针，育才方策，广博丰硕，新论迭出，自成风格，为人称道，堪称一代学术大师。但是他学术的重心在历史学，因此他在历史学界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最大的，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尊称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的学术研究涉及到哲学、文学、佛学、教育学，还有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新闻学、图书文献学。这种广博的知识对于梁启超融合中西的治学方法，取得很高的成就，都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梁启超曾经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就是要写几部通史著作，然后是断代史和专门史。由于精力和身体的原因没有完成，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写作。1918年梁启超告别政坛以后，开始着手写作中国通史，由于多年养成的写作习惯常常彻夜不眠，一气呵成。辛勤写作的结果，在这年的夏秋间，通史的先秦部分就已经基本完成。但却在这时，梁启超积劳成疾，得了肋膜炎，咳血竟达半碗，身体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在好友，著名中医唐天如的精心护理下，才转危为安。梁启超感叹地说：“我以后再也不敢轻视中医了。”中国通史的写作也不得不停顿下来，此后《中国通史》一直没有再写下去，实在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遗憾。

梁启超对史学的贡献还不仅仅是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很早就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写出了一大批史学理论著作。他在南开讲学时的讲稿《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在清华的讲稿《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他这一时期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这两部著作，虽然只有二十几万字，但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他在史学思想、史料学、编纂学等方面都有很新的创见。他主要是以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主，吸收了中国传统史学研究和著作的精华，构筑了自己的史学理论框架，大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百花园地，也成为这一时期最为耀眼的史学明星。

梁启超在学术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是《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0年，从欧洲回来以后，蒋百里写了《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就为他写了序文，这就是《清代学术概论》的由来。由于梁启超才思敏捷和学术造诣广博精深，一个序言洋洋洒洒写了五六万字，然而泛泛一论竟成一驰名中外的学术专著。字数虽不是甚多，却清晰地勾勒出了有清一代的学术脉络，全面而有系统，至今仍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学术经典。继《清代学术概论》之后，就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在编写体例和材料组织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研究的对象都是清代的学术发展史，又各具特色。前者高屋建瓴，气势磅礴，论点犀利，给人一种畅快淋漓之感；后者则侃侃而谈，和风细雨，循循善诱，给人一种如沐春风之感。

除了史学的研究之外，梁启超还在哲学、文学、佛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律学等方面都

有精深独到的研究。其治学路数之广，写作数量之大在近代中国，乃至以后都是空前的，可以说开创了近代中国学术的先声，在很多领域都是开创性的，因此在这些领域他被尊称为开山鼻祖。这当然和梁启超的过人天才分不开，另一方面，与他个人的勤奋好学，从不自满有很大的关系。支撑梁启超一如既往，拼搏向上的精神支柱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近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被奴役、被宰割的地位，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三、言传身教抚育栋梁

梁启超的儿女较多，除了未养育成人的不计外，已养成人的是5男4女共9个。这9个儿女中，由李夫人蕙仙所生的有3个，他们是梁思顺、梁思成和梁思庄；由王夫人桂荃所生的有6个，他们是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和梁思礼。

关于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很少。就目前所了解的简单情况是：王夫人出生在农村，是李夫人回老家探亲时，将她带出来的，后来将她带到日本，1902年成为梁氏的第二位夫人。这是李夫人有意为丈夫挑选的。有人认为李夫人为丈夫纳妾，是在梁氏发生“夏威夷之恋”的刺激因素下进行的。这种因素也可能存在，但看来不是主要原因。1901年，梁启超的长子，也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梁思成诞生。苦盼6年的梁启超后继有人，自然非常高兴，但望着孩子单薄的身体，他和李蕙仙都有些担心。于是为了香火旺盛，1903年，梁启超在李蕙仙的准许下纳李蕙仙的侍婢王桂荃为妾，王桂荃后来一连给梁启超又生下了6个子女。在李蕙仙生前，梁启超很少公开提到王桂荃，可能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定下的“一夫一妻制”的原因。他要求孩子们叫王桂荃“王姑娘”或者是“王姨”，但是几乎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一直都很忙碌，儿女们的穿衣吃饭等琐事，他当然很少过问，但思想和学习，他是非常关心而且严格要求的。当然，梁启超对儿女的教育，除言传身教外，他的大量著作，都对儿女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儿女们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爱国思想。

梁启超的一生，在政治观点方面可以说是多次变化，但是他的爱国思想是一贯的，他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祖国的繁荣富强。爱国思想就像一条红线，贯串在他的思想和活动之中。他不愧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者。这种爱国思想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儿女们。

人们都知道，梁启超的9个儿女，其中有7个是出国留过学的，但他们学成之后，全部回

到国内，为祖国服务。有人曾经问过宇航专家、现担任国际宇航联副主席的梁思礼先生：你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得很干脆：“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这一句话，支撑了我一生的追求。”他的回答，实际上也代表他的8个哥哥姐姐说的。他们9个兄弟姐妹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表现出来最一致的地方就是爱国。

其次，梁启超是一位教育家，他既重视学校教育，又重视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他总是教导儿女们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做一行，爱一行。在梁启超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儿女们都努力学习，知识广博，并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家里一共出了三个院士，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因而梁氏家族被称为“院士之家”。

梁思顺—在日本长大和学习，曾做过父亲的“秘书”和翻译。后来从事外交活动，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晚年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仍然是兢兢业业，事业出众。

梁思成—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办人，著有《中国建筑史》，是中国建筑史上的经典著作。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建筑大师。新中国成立后，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还参加了新中国的管理工作，也是一个多面手。

梁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与人类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首先确定仰韶、龙山和商文化之间的相对年代。著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殷代陶器》等书。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9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是著名的考古学家。

梁思忠—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回国后任第19路军炮兵校官。1932年因病去世时，年仅25岁。

梁思庄—获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文学学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士学位。曾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是国内著名的图书编目专家。

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和经济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编写了很多经济方面的著作。

梁思懿—开始在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来美国攻读历史学。回国后，先在山东医学院工作，后来做过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曾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

梁思宁—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1940年参加新四军，在腥风血雨的革命过程中为新中国的建立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年华，现在也是儿孙满堂的老革命家。

梁思礼—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取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的长远规划。担任过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是我国远程液体火箭及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是我国火箭、导弹控制系统专家。1987年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在儿女面前，并不是整天摆出一副“严父”的面孔，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向儿女们死板地说教。他对儿女的态度极为和蔼，并把儿女看成为同志和朋友，有说有笑。他在给儿女的信中，什么都谈，包括自己的工作情况、思想状态、存在疑难，都具体地告诉儿女。对儿女若有要求和建议，并不是生硬地强加于儿女身上，而是与儿女商量，征求儿女的意见。若认为儿女有不够的地方，则反复讲道理，最后让儿女们自己去考虑，尊重儿女的选择和决定。这种民主和平等的做法，从他给儿女的大量书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例如梁启超曾经希望梁思庄学习生物，因为梁思庄缺乏兴趣而最终放弃。梁启超反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梁思庄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正是由于梁氏能够体贴个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梁启超和孩子们并没有因为代沟而疏远了感情，而是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 四、斯人已乘黄鹤去却留美名在人间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离开了他深深爱着，并为之奔波奋斗了一生的祖国，年仅57岁。梁启超一生颇负才名，他卓越的天才，使他成为人人景仰的对象，而他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性格又为他平添了无上的魅力，崇高的爱国情操，更使他本人可亲、可敬、可爱。也因此梁启超的壮年病逝让无数世人扼腕叹息，实在是中国的一大损失。

究其原因，是因为梁启超拼命地工作，孜孜进取，从不知疲倦，因而积劳成疾，终致即使华佗再世，也不能妙手回春。梁启超向来以自己的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自负，因此从不知疲倦，简直就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在政治的漩涡中沉浮了那么多年，已经对他的身体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告别政坛后，他又进入了一生中讲学和著述最为繁忙的时期。他以每天万余言的速度在创作和研究，《清代学术概论》竟是他在一周内写出的学术著作，让人难以相信。他多年养成的写作习惯，就是日夜不停，一气呵成。文章自然汪洋恣肆，动人心魄。而他的身体也越来越不能承受这样的负载。有一次，他不顾重病的危险，去参加一个集会，发表演讲，身体相当羸弱，张君劭无奈，硬将他从讲坛上拉下来，痛哭流涕希望恩师保重身体，其精神实在让人敬佩。

1924年春，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病逝。李蕙仙向来被梁启超称为“闺中爱侣”，夫妻二人感情特别的好，她的逝世让梁启超悲痛欲绝。就在爱妻患病期间，梁启超衣不解带，侍奉于病榻之侧，昼夜看护，也因此身染重病。本来就已经虚弱的身躯怎么能经得起这样的打击啊！梁启超开始出现便血的症状。梁启超向来以乐观旷达自居，然而夫人去世以后，自感“了无生趣”，悲呼：“天佑不终，夺我良伴，何其速也，何其酷也！”梁启超：《悼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

他只有用拼命地写作来排遣心中的悲苦。身体状况终于急剧恶化。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病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协和的医生诊断后，误以为他的右肾生瘤，于是便做了割去右肾的手术，但右肾取出后，发现并无肿瘤。对于这一手术，当时社会上和梁启超的家人多有责言，但梁启超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却十分通情达理，并不苛责。他写信向孩子们劝解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并没有丝毫吃亏，只算费几百块钱，挨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

对于当时报刊上对协和的攻击，梁启超惟恐因此损害协和的名声，影响其他人对医学和其他科学出不良的反应，他在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经过，替协和辩解，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至于该不该割去右肾的问题，梁启超提出责任不在协和。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我国著名医史学家程之范先生指出：“梁启超对协和医院误诊的态度，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这时对协和大加鞭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这种时刻不忘祖国，心忧大众的精神多么难能可贵啊！

出院后，梁启超的病情仍然不稳定，时有反复，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不能安心养病，仍然在清华和燕京大学讲学，实践着他的“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的诺言。1927年6月，好友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对梁启超打击甚大，身体渐渐不支。不得已再次于1928年11月住进协和医院。这时他仍没有放弃著述，《辛稼轩年谱》即将杀青。但已是风烛残年，多年的劳累，已经再也不能扭转病情急剧恶化，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梁启超逝世的消息一传出，举国哀恸。2月17日上午，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在广惠寺和静安寺为梁启超举行公祭。公祭大会上，挽联如海，哀幅如云，高搭牌楼，白马素车，为一代政治先驱、学术巨子送行。蔡元培、张东荪、高梦旦、熊希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杨树达、陈衡哲等各界名流纷纷到会祭奠，没有到会远在外地的各界要人也都派人送了花圈和

挽联、挽诗，冯玉祥、阎锡山、王士珍、孙宝琦等都送了挽联。蔡元培在挽联中写道：

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

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

王文濡的挽联则是这样写的：

大声疾呼，壮岁文章，盛名满天下；

盖棺定论，后来志事，伟业侔中山。

阎锡山送的挽联是：

著作等身，试问当代英年，有几多私淑弟子；

澄清揽辔，深慨同时群彦，更谁是继起人才。

社会各界都对梁启超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的一生是波澜壮阔，气势不凡的一首咏叹调：任公逝矣，综论一生，以不世出的龙腾虎跃之才，建震天动地之大业；不拘泥于成见流俗，天马行空，而权衡在心，随大势而转移变化，以尽其义务，发挥其才能，而求成功。故其始也，因变法而蒙难，任维新之先觉，振聋发聩；其继也，倒袁讨张，成革命之元勋，指挥若定，丰功伟业。大功不居，退隐津门，杜门著述，雅怀高致，虽蛇蝎之军阀不得而污之。文学虽其余事，而整理国故，抚大雅之伦，扬抑古今，秉阳秋之巨笔，横扫千军，气吞万里。《饮冰》一出，万口传诵，上至庙堂，下引江湖，无不捧读，雅俗共赏，得您余荫，受您教诲，而张名文坛者，比比皆是也。此驾鹤一去，如大厦之崩塌，举世震惶，痛斯人之难再，万众哀之！